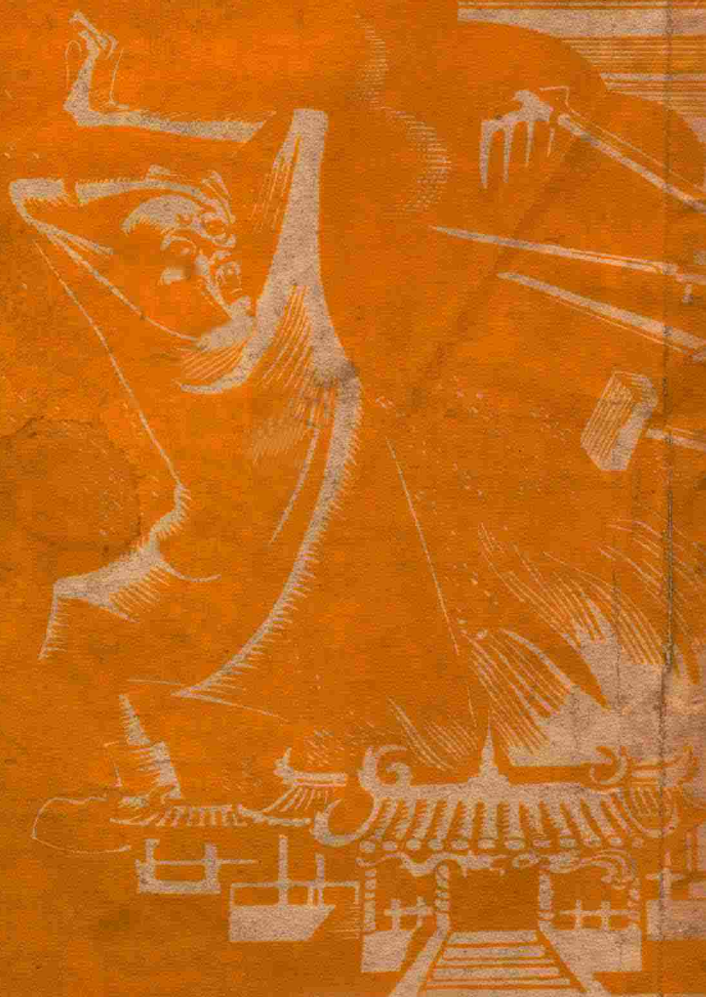


中國暴風雨



美·白修德買安娜著
以沛端納譯

(上册)

海洋書屋印行

中國暴風雨

美·白·修·德·安·娜著

以·沛·端·納譯

上册

海 洋 書 屋

1949

中國暴風雨

著者 美·白修德

賈安娜

譯者 以沛 端納

出版者 海洋書屋

香港堅道一三五號地下

營業部：香港荷李活道七十號A

印刷者 民生印務局

工場：香港中環卑利街六十七號A

總經售 上海大眾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七月式版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美國於戰時及戰後在許多國家中的採取干涉政策的真實意義，是我們大多數人所未能完全了解的，這裡面充滿着許多似是而非的理論與事實，足以使未來的歷史家感到驚訝，感到迷惑。在我們對外宣佈的目的與真正的實踐之間，在事實與幻想之間，在真理與謊言之間的許多矛盾都是些供人深思的材料，並且將帶給我們更多的眼淚，更少的笑。

「現狀」維持得了嗎？

假如我們的目的不僅是想擊敗法西斯主義，並且想進一步解放一切國家與人民，那麼，我們必須承認，在客觀的後果中，我們的力量已時常被用來恢復舊時的秩序。除了在三個軸心國家中以外，美國在任何小國內的干涉總是把全部的力量放在維持現狀上，或是設法使局勢迅速地回到原樣。

譬如說，西南亞洲獨立運動之成功就決不是我們這些「愛自由」的強國所賜，而大部份應該歸之於日本侵略與佔領所造成的局勢的後果。緬甸人、安南人與印度尼西亞人之所以能獲得他們今日所主張的自治，是因為他們有日本軍隊遺下的武器，而並不是因為他們得到了些甚麼美國的幫助。在另一方面，美國的援助，祇是美國的援助加上了對日的勝利，才使歐洲的列強能够恢復它們對東方殖民地中的五萬萬褐色人種的廣泛的統治，對於這些人種，四大自由並不會適用到。

在我們想維持原狀，想維持一個顯然地已經成爲「活着的化石」的社會秩序的企圖中，最最顯著的例子要算是作爲一個盟國的美國對於中國內政的橫加干涉了。在中國，我們以全力來支持一個與我們這次戰爭的軍事政治

的目的毫不相符的政權——一個完全獨裁的政權；在它二十年的歷史中，人民連選擇一個地方上的官吏的權利都被剝奪；而這個政權，我們知道，在軍事上無能，在政治上腐敗，在道德上無從辯護。我們以武器、以金錢、以裝備來重新扶持起那些掌權的家族，而對於由非共產黨或是共產黨所組成的人民團體則從不給與絲毫具體的援助。我們必須知道，這些團體，曾經要求過對這次戰爭的勝利有重大貢獻的許多改革。可是在中國，正如在亞洲的其他各地一樣，一些反對份子，利用鬥爭本身所造成的環境，建立起一個獨立自主的力量，這完全是我們無法實東得到的事，他們從日本軍隊中奪獲大宗武器，得以組織起廣大的群眾。而這一次，假如沒有美國的干涉，在中國的現狀也是絕對逃不過歷史的偉大的試練的。

一部精湛的報告文學

這些就是「中國暴風雨」這本書所洩露出來的與一般報導迥然不同的事態真相；這本書是一部精湛的報告文學，也可以說是一部東亞戰爭史畧。白修德和賈安娜是有能力的觀察者，且有超過他們年齡的成熟的政治修養；他們曾經目擊好多事件的發展，而以亞洲革命為廣闊而複雜的背景，把這許多事件歸納，並列在一個焦點加以透視。他們的這本書不僅是一本評述戰爭的書；在他們的眼中，美國之擊敗日本不過是瀾漫在一塊整個的大陸上的正在繼續中的求解放戰爭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在這塊大陸上，人類「依然在想從他們的飢饉與受難的過去中掙脫出來。」

日本給我們的教訓

珍珠港事件的起源，可以回溯到日本反革命的勝利，作者認為那反革命的對象也就是那目前瀾漫在亞洲的裏

求改變的同一的勢力。因爲民主的動力在那裏受到了鎮壓，日本的古老的封建勢力便得以動員一切新的生產工具來作侵略的戰爭。同樣的革命與反革命的勢力目前存在於中國，「而我們自己將來的安全則與我們對這些勢力的認識與理解有密切的關係。」美國在中國的許多統帥之中，祇有史迪威將軍懂得「要爭取勝利與和平唯有採取有效的手段來使人民的力量從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這一點，他認爲是亞洲戰爭的比較重要的意旨。

蔣介石悲劇的故事

蔣介石，視史迪威與中國共產黨爲比日本軍閥更危險的敵人，不能理解那創造出他自己的革命。在他的眼中，革命祇是一個必須予以粉碎的可怕與可怖的事物。因此，中國戰爭的故事遂變成了「蔣介石悲劇底故事。」

「他所領導的人民本能地感覺到這次對日戰爭即是對那年代悠久的苦難底整個腐朽了的組織的戰爭。當蔣介石一方面想打日本，另一方面却又想保存那古舊的組織，他不僅無法打敗日本，甚至沒有力量來保持自己的權位。他的歷史性的仇人，共產黨，從八萬五千人的軍隊增長爲百萬人的軍隊，從一百五十萬農民的統治者轉變成九千萬人民的主人。共產黨並不會使用什麼魔術；他們祇不過知道人們所渴望的改變，而他們擁護這些改變。」

理解中國的道路

書中雖然也有如上的率直的判斷，但並沒有說教的條文，它提供給我們的是逐步增長的真理，與由許多不可吹破的事實鋪積起來的理解中國的道路。利用許多剴切的經濟、社會、政治與軍事的事實，兩位作者告訴了我們珍珠港事件前後的中日戰爭，以及那戰爭是怎樣地在打，怎樣地不打；告訴我們農民們怎樣地組成軍隊，供養軍隊，以及怎樣地成千成萬的死亡（他們大多數是死於飢饉與疏忽，而不是死於戰場）；告訴我們關於蔣介石以

及掌握統治大權的宋氏、孔氏、陳氏三大家族和他們的黨羽們；告訴我們一些好人與壞人，以及我們在這兩種人羣中的影響；告訴我們爲什麼美國最後終於在不安定的平衡之下，幫助保存那邪惡的榨取與人類墮落的壞制度，對於這個制度，中國人民以全力反抗正如他們反抗日本壓迫的重力。

拆穿了美國陰謀

對於許多讀者，「中國暴風雨」將描寫出關於史迪威事件與違反史迪威政策的赫爾利底悲喜劇的第一幅明晰與緊湊完整的畫面。在這本書中，同時也描述到，解釋到那一般人不大明瞭的時期，當赫爾利干涉中國東部的游擊隊，恢復蔣介石在那地區內的實際勢力，因此「使美國的陸軍與國民黨發生直接的連繫來共同對付共產黨，」這種局勢一直到今天，我們的海軍陸戰隊還極力地加以維護。關於這個決斷，兩位作者非常正確地特意提出那鐵的事實，「在千百萬中國人民的眼中，中國目前的內戰是由美國所造成的，」以及馬歇爾將軍的工作的「無可比喻的複雜性」，馬歇爾將軍之被派往中國是想清理那被不幸的赫爾利棄於破產的境地中的我們的對華政策。

根據他們自己的看法，白修德與賈安娜的結論是：假如我們不改正領我們走入今日窮途中的錯誤，馬歇爾的使命是無法完成的。簡畧地，他們主張：（一）我們與蘇聯會商並且議定一個撤兵中國的共同政策；（二）放棄單獨調解的政策，擴大我們的努力使蘇聯也與我們合作，根據莫斯科會議宣言，要求中國成立一個容納各黨派的，代表人民的，改組的政府；（三）在蔣介石停止軍事攻勢與採取結束他的獨裁政權的具體步驟以前，停止一切對蔣援助；（四）在代表人民的政府一旦替代了目前的政權以後，毫無吝惜地給中國以經濟上的援助。

我舉雙手推荐這本書

每月新書俱樂部之介紹這本「中國暴風雨」給它的百萬會員，實在可以說是做了一件值得誇揚的服務大眾的

工作。這本書不僅在事實上是又正確、又可靠、依正當的次序與輕重比例來處理各個事件的一本歷史，並且是一本最值得一讀的戰爭書籍。兩位作者以成熟精練的技巧來處理這個故事，並且以如此老練、簡潔、平易而流利的文體來敘述它，以致讀來毫不費力，好像看一部電影一樣。雖然兩位作者在實習時期中曾經作過「時代」與「生活」雜誌的特派員，但是他們却終于懂得了怎樣好好地寫作。

由於作者具有優秀的洞察力，懂得怎麼樣去選擇重要的材料，這本書因之便具備了真正的寬度與深度，並且有一種不同尋常的廣闊的範圍。沒有一個字是浪費了的，現實與歷史的完整性，性格與因果的協調，事故對企圖的撞擊，以及內在的與外在的相互作用，都在熟練的組織觀念之下完成了。這是一本新型的戰時記者的書，有詳盡的歷史背景，正確的細節；尤其使讀者有清新之感的，便是作者在這空前顛覆的社會動力之前，自動地磨鍊了作者自己。

致讀者

本書是兩個人的產品，書中各章，差不多都是作者兩人最密切的合作的結果。有的時候，書中事件只有我們之中一個人在場觀察，在這種情形之下，有幾章裏的少數第一人稱，是指白修德。

對於協助我們校讀，編訂和準備原稿出版事宜的許多人，我們謹致謝意。其中幫忙最多的，是J·倍爾頓，R·瑪科爾，M·寶丁·N·萍恩，C·懷德穆爾，G·懷德等諸君，他們在剔除本書的錯誤方面，出力甚大。自然，本書中依然容有錯誤之處，以及這裏發表的結論和意見，就都是作者的責任了。

我們又願對時代雜誌公司致謝，因為該公司答應我們摘引一部份材料和電訊，這些材料和電訊，是我們過去以該雜誌記者身份寄給他們的。當然，本書的意見和結論，是本書作者二人的意見和結論，並不反映着時代雜誌公司的政策或意見。合眾社允許我們引用其宣佈珍珠港事件爆發的第一號電訊，我們也表示感謝。

白修德，賈安娜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

序言

這次大戰結束時，並沒有所謂最後的一槍，沒有背城的一戰，也沒有和戰之間分水嶺似的最後一天。散佈在地球之上的六個無線電台滴答作聲，把電力的火花，從首都傳到首都，傳入億萬個粗樸的家庭裏；和平是從空氣中走出來的，一霎那遍佈全球。東京灣內軍艦米蘇里號上的大典，是一個洩氣的頂點，是一個爲了尚未到來的和平以及尚未結束的戰爭，表演原始儀節的陳腐典禮。

在黑暗而無生氣的層雲籠罩之下，世界上最大的艦隊躺在世界上最大的廢墟中間。米蘇里號的一邊是美國兵艦「愛奧華」號，另一邊是美國兵艦「南達科他」號。一面破碎的旗子，上有三十一顆星，掛在米蘇里號的一個砲塔上——這是將近一百年以前，海軍司令潘萊帶到同一海灣內的美國國旗。在主桅之上，飄動着美國今日的戰旗。甲板上擠集着美國天才的使徒——技術專家們。這裡面有重轟炸的專家，有戰術轟炸的專家，有兩棲登陸戰的專家，有空運部隊的專家。這些人是殺人業中的藝術家，他們的技術已給四年的戰爭訓練得盡善盡美。這戰艦本身，從前桅樓上的雷達網起，到底下許多灰色的厚甲，許多仔細合組起來的秘密和神秘的合金止，都是美國一切技術的登峯造極的傑作。這是一幕美國的戲。有一個蘇聯人，帽上圍着紅帶子，還有一個塔斯社的新聞電影攝影員，努力在主要角色之間簡陋來往，攝取他的鏡頭；有一個加拿大將軍演糊塗了，簽字簽錯了地方；有一個衣服裁剪得很考究的中國將軍，他是在重慶消磨戰時的歲月的，他在重慶的一張大陸地圖上，調遣過疲倦的師旅。這些人也是技術專家，但由於穿美國卡嘰和白制服的人密密層層，他們被沉沒在人羣裡了。太平洋上的勝利是一個嚴重的技術勝利，而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偉大的技術專家，威勢壓倒了其他各國。

日本人表顯了一點人情味。六個日本人，在鼓樂聲中走上米蘇里的舷側，但是爲了造作歷史以及便於人們記

憶，只有兩個人出頭——梅津將軍和政治家重光葵。梅津穿着檢閱時的戎裝，所有的綬帶閃閃發光，他的眼睛黯然失色，但你可以看到他臉上的疤痕一會兒鼓起來，一會兒耷下去，顯得感情激動。重光葵頭戴絲質高帽，身穿正式晨裝，彷彿在參加婚禮或葬禮。他有一只木脚，他在甲板上跛行着；當他開始攀登上那簽訂和平的高甲板時，他緊握住繩子，以無限的痛苦和不安奮力向上。每一個人都以殘忍的滿足，注視着重光葵竭力走上扶梯；美國人誰都沒有伸出手來援助這殘廢的老人。

人們把重光葵和梅津領到前面，而在麥克阿瑟將軍很漂亮地說了幾個仔細選擇過的字眼以後，他們就把自己的名字簽上一個文件，這文件宣告了日本帝國的結束。於是，重光葵和梅津就都成為技術人員了；如果誰要問他們爲什麼失敗，問他們爲什麼被迫簽字承認他們的世界的幻滅，他們就會提出一二十個十分有力的理由，而且列舉船隻，五金，槍砲，師團，盟友的數字，以及不合時機的決定等等來加以證明。他們所有的理由，專家們聽起來也許是入耳的。重光葵和梅津大約從來也沒有想到過他們會失敗，因爲他們所盤算的是那樣可怕的惡毒，而這惡果本身招來了失敗。他們簽了字之後，其他各國陸海軍大將們一一在文件上簽名，而和平，假如那是和平的話，就此到來了。

這個勝利是美國的勝利。勝利之得來，是由於絕對優勢的五金和槍砲的重量，以及高超的技術，把日本完全破壞。可是，不論在米蘇里號上勝利之時也好，在勝利之前的挫敗中也好，在勝利以後日見起色的日子裏也好，並沒有任何徵象能夠說美國了解它在太平洋上作戰的意義。我們曾因東方黑暗的威脅而退出東方；我們曾經認識這威脅是惡毒到難以形容，而且我們已經造好了一架滾路機，把這威脅軋得無影無踪。但是我們從沒有明白這威脅是從甚麼地方產生出來的。

美國的戰爭，已經盲目地切斷了人類史上最大的革命——亞洲革命——的行程。我們暫時在許多漲痛的頭中

之一個頭上扎了一針，放了大量的血，解除了一點漲痛。可是基本的痛苦和內部的緊張依然存在，而且正在發展成爲新的危機。和平並沒有隨着勝利來到。在整個亞洲，人們繼續互相砍殺；他們今天繼續這樣做，而且將在今後很長時期內繼續這樣做。

亞洲有十萬萬人以上，疲倦於現有的世界；他們生活在太可怕的極括之中，他們除了鑄錢之外，再沒有甚麼東西可以損失。他們被鉗制在這樣的無知和窮困之中，如果把他們的日常生活描寫下來，美國的讀者不會相信這是真的。在印度，人的平均最高壽命是二十七歲。中國有一半的人不到三十歲就死。亞洲每個地方的生活，都浸染着一些驚人的必然遭遇——飢餓，屈辱，和暴力。不論戰時或平時，荒年或豐年，公路上或城市的街道上橫陳着人的屍體是太普通的事情。在上海，早晨在工廠門口收拾童工的屍首成爲例行公事。亞洲的鄉民被官吏和憲警毆打、鞭撻、虐待、侮辱，那是政府權威的實質的一部份。這些人生活得十分勞苦；他們是距最原始的方法，用筋肉和氣力，爬掘瘠瘦的田土，來維持生計的。如果天氣和他們作對，那就誰也無法把他們從餓死的境地裏救出來。不到一千年以前，歐洲也是這樣生活的；當時歐洲以一連串的血腥的戰爭，起來反抗舊制度，使舊制度一代一代地昇化成爲如今我們的所謂文明。亞洲人現在也經歷着同樣的過程。

史書往往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成功的革命上。當巨大的人民羣衆從貧困之中迸裂出來，以流血和暴力來改善自己生活的時候，當代史家通常以驚惶和詈罵來迎接這事實。只有時間，才能使這種起義受到尊敬。在起義失敗，而表面上的穩定重新被建立起來的時候，人們把這種穩定當作良好而值得辯道的東西。然而，在這穩定的下面，繼續着貧困、緊張、壓迫和對於革命流血的恐懼，而且在內部孕育着悲慘性質的暴力。人民的被壓抑的熱情，受到虛假的口號和辭句的誘騙，他們很容易地被引導入狂妄的冒險之中，來反對整個世界的和平。日本過去就是這樣的。

我們的對日戰爭，是對抗一個失敗了的革命之後果的戰爭。一百年以前，西方對中國和日本的衝擊，發動了革命的輪軸。幾代以來，一般通常認為日本已順利地轉入現代世界，而中國並沒有；那是錯誤的看法。在潘萊懿隊開入東京灣之後的十五年內，日本的革命失敗了。這革命被日本中世紀的封建的、頭腦反動的領袖們壓在手裡，革命的動力，則被扭曲而納入一九四一年時我們所看到的日本帝國的結構之中。這樣的帝國，是除了侵略世界之外，無法解決自己內部問題的，是註定侵略的。日本的領袖們利用農村的隱秘的悲慘以及工人的組織性，把災禍帶給每一個人。而一百年以來中國一直具有的混亂狀態却証明了：中國人民反抗自己古老的痛苦的革命浪潮是任何集團都無力加以控制和歪曲的。

日本對我們的戰爭，是一個一開頭就已經失敗的戰爭。他們的領導者，是一些對於政治只有十分粗鄙的了解的軍事專家；打敗他們的人，是一些比較高明的軍事專家，也不懂政治，但擁有日本無法比擬的鋼鐵和科學的寶藏。然而，打敗了日本，我們却並沒有締造和平。和在日本走入歧途的同一革命力量，仍在活動於亞洲別的地方。整個亞洲大陸上，人們依然在設法從他們過去的飢餓和痛苦之中把自己解放出來。

在整個亞洲大陸上，中國的求變之力，要比其他各國動作得更危險而具有爆炸性。亞洲的和平以及我們自己將來的安全，要看我們是否了解這些求變之力有多大，誰造成的，以及誰抑制了它。除了史迪威將軍之外，盟國將領們似乎誰都不明白這是東方戰爭的基本問題。史迪威沒有理論——可是他懂得，我們在這次大戰中作戰，同時也就是在規劃和平。他懂得，勝利與和平都有賴於把人民的力量如何從封建束縛中解放出來。他的道理，全是實地經驗，在戰場上親身體味了中國的生活而得來的；美國政府並不支持他的意見，他被解除了指揮權；但是他的去職是一個標誌，這標誌要比他在戰場上打的一切勝仗都來得光榮。

這本書是中國戰爭的一部份的歷史；只有中國人能為自己的人民寫作真正的歷史。中國戰爭的故事，是蔣介

石的悲劇的故事，他對於這次戰爭的誤解之深，和日本或盟國技術專家對勝利的誤解一樣。蔣是革命的產兒，但是他現在除了把革命當作必須加以粉碎的可怕的東西而外，他不能了解什麼是革命。他曾經擁有一切讚許和光榮——強大的盟國的支持，正義的象徵，以及抗戰初期全國人民全心全力的熟誠的擁護。他所領導的人民，本能地覺得這次抗日戰爭是一個對抗久遠的痛苦之源的整個腐敗制度的戰爭。當蔣氏設法一面對日本打，一面保持舊制度的時候，他就不僅沒有能夠打敗日本，而且無力維持自己的權威了。共產黨人，他從來的死對頭，却從一支八萬五千人的部隊生長成爲百萬大軍，從一百五十萬農民的治理者變成九千萬人的主人。中共並沒有施用魔術；他們明白人民所需要的變化，他們發動了這些變化。兩黨都說謊、欺詐，而且破壞協議；但共產黨有人民在一起，而且因爲和人民一起，他們形成了自己的新的正義。在戰爭的最後一年間，縱然美國的技術力量移來支持蔣介石了，美國成了他的後盾，也並不能使蔣氏重新獲得他在光輝的抗戰初年所曾經擁有過的權力。

目錄

史諾序

致讀者

序言

一 重慶——風雲際會的焦點……………(一)

二 百分之八十的農民……………(一六)

三 國民黨的抬頭……………(二七)

四 日本動手太遲了……………(三九)

五 外戰中的內戰……………(五四)

六 珍珠港事件以後……………(六六)

- 七 如此「訓政」政府……………(七九)
- 八 人民擁護蔣介石嗎？……………(九六)
- 九 注定遭殃的中國兵……………(一〇八)
- 十 史迪威的戰爭……………(一一九)

第一章 重慶——風雲際會的焦點

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在各種地圖上都沒有特別標記註明的。重慶的地方，是一座昏沉沉的山城，棲息在黑暗的崖石上，這崖石是在揚子江上的霧中升起來，直指天空；只要揚子江的水一天流入太平洋，這個江上的城就會存留一天。歷史上的重慶，是一個風雲際會之點，是一個具有誇張的地理意義的臨時宿營地，像慕尼黑和凡爾賽一樣。重慶是一個成千成萬人分享過的插曲，這些人，由於相信中國的偉大，由於具有守住國土對抗日本的巨大的熱情，曾經聚在重慶城邊。大人物和小人物，高尚者和貪污者，勇敢的人和胆小的人，都曾在重慶聚會過一小下；他們現在都回了家。倫敦，巴黎，莫斯科和華盛頓依然是大都市，依然是號令和決策的中心；同樣的名字響亮的人依然住在裡面，同樣的朋友們依然在舊而熟悉的場所會面。可是重慶只是戰時之物，是一個風雲際會之點；重慶是死了，而它曾經照耀着全中國的偉大的希望和崇高的諾言，也隨之而死了。

歷史使重慶成爲戰時中國的首都，是因為由於傳統、邏輯以及迫切的需要，找不到其他的地方。幾百年來，重慶之所以出名，由於它是內地最重要的省份中的最重要的城市。劃分華中和內地的狹窄的峽谷，幾乎把長江扼分爲二；重慶是這山峽以上的第一個大城堡，睨視着企圖溯江西進的人們。在商業上和政治上，它稱霸於四川，而四川省則是華西的霸主。四川是一塊巨大的三角形的地方，其面積和人口，大過法國或英國。在中國歷史上，該省一向因四週高山的屏障，自成天地。該省冬天潮濕而寒冷，夏天則酷熱而鬱悶。中國一部份最豐富的礦藏和最肥沃的土地，是在該省的山中。糖、麥、稻、橘子、杜鵑花、罌粟、蔬菜等等，四川都能種，而且長得很好。中國有句俗語說：四川是天府之國。

四川的僻遠和自足，使自己遠離國內事件的主流。在故事和歷史之中，它是一塊遠不可接的神秘的地方，實

際上，四川倒是以它的落後性盡了它最重要的作用；在中國歷史上，四川人通常是最後歸順新朝代的人，是北京最難管轄的人，是反抗外族統治的暴動的力量蓄積之處，是抵抗大災難的錨石。舉個例，一九一一年爆發的反滿共和革命，就是從四川開頭而延至華中的。這革命引起了世界的注意，釀成了大變化，而現代中國，就是在這大變化中生長出來的。然而這之後，四川在人們不知不覺時，走着自己的路走了二十五年；該省並未追求革命，却陷入無政府狀態中。在那裡，軍閥們的部隊，把疾病和恐怖從一個山谷帶到另一個山谷，使全省成爲荒蕪之地。當舊的政府制度衰亡的時候，軍閥們完全操縱了農民的生命，並且以史無先例的滑稽和野蠻，互相戰爭不休。這些軍閥是有聲有色的人物；他們和許多小老婆一起住在高大的邸宅裡，作鴉片買賣來養胖自己，逼毒大批田產，並且從農民那裡勒索稅款，有時農民須預繳租稅五十年之多。用這種方法，他們變成了大田莊的貴族，充塞着財富和驕傲。

至一九三〇年中，有一個名叫劉湘的大軍閥，用蔣介石統一中國其餘部份的類似的辦法，以詭計和武力混合起來，使其他的軍閥們臣服於他。日本於一九三七年進攻的時候，四川是由劉湘將軍穩穩地控制着的一些半封建的聯盟結合起來的。在這個軍閥聯盟之中，長江兩岸的秘密會社生長得十分興旺；城市裏蒸騰着鴉片氣息；霍亂，痢疾，梅毒和砂眼，腐蝕着人民的健康。工業是幾乎不存在的，教育是原始的；該省五千萬人中，只有兩間所謂大學以及一所第一流的教會學校。中國西部的農民耕田的方法，像他們的父親或曾祖父一樣；他們的世界，至遠只到鄰近的市鎮爲止。日本進攻中國時，四川的軍閥們完全歸依蔣介石，但在他們的想法之中，這與其說是他們把自己的獨立性併入和臣服於別人的號令之下，不如說僅僅是他們自己和蔣氏之間結成抗日聯盟而已。在日軍進入內地之際，該省接納新的難民，把他們看成流亡者，而把重慶的新國都當作客人的政府。

中央政府把重慶接收下來作爲流亡之家，那地方甚至在中國人看來，也是天下少有的不愉快的地方。一年中

有六個月，霧和雨籠罩着重慶，大街小巷都是爛泥漿。重慶是一片舌頭似的地方，伸展在長江和嘉陵江會合之處；江水在雨季高至六十至九十尺，每年都把江邊上密密層層的草屋一掃而光。重慶長大起來，對數千個農村的經濟有用處；它從鄉村裡購買米、肉和絲，以棉紗、布和煤油供給鄉村。它是一個農村性的都市，它的聲音和氣息，像一個巨大的封建時代的鄉村。古重慶的城牆從河流匯合之處起至山頂止，圍繞着這個半島，城市則從野草叢生的山脊伸展出去。據本地人說，城牆是在五百年以前建築起來的；城牆到今天還存在，九個城門，依然是交通要道。一九三九年重慶開始被炸的時候，有一個城門依然每夜有守夜人關柵。九個城門中，八個站在山崖上俯瞰大江，但有一個可以在平地上進去，那就是通遠門。皇帝時代的古驛道，從通遠門出重慶，經山道而至成都，再上北方的高山到西安，再繼續迂迴曲折，到達北京。到華西的主要汽車路，如今在離通遠門一百碼之處刺破了城牆，但是乞丐依然聚集在饑饉的古舊的拱門旁邊，小販們則在老朽的石階旁賣鞋帶和橘子。

戰前重慶的一切，差不多都在城牆以內。二十萬人擠在這個窄小的區域內。社會上的少數有錢人，軍閥，大銀行家和富裕的地主，則在市外數哩擁有私人的宮殿似的豪宅。城牆彌漫着渾渾噩噩，不知時間的空氣。二十世紀之侵入，只不過抗戰以前十年來的事情。第一輛黃包車在一九二七年才出現，那在當時是一個奇蹟；兩條汽車路也是如此，電話於一九三一年來到，自來水是一九三二年，日夜供電制是一九三五年。第一艘輪船於本世紀之初溯長江而達重慶；這之後，跟着溯江而上的輪船只有很少幾艘。

重慶有千把條小巷子，從兩條大路上順着山坡放射出去；這些小巷曲折上下，都得靠數百年來草鞋腳踏得光溜溜的石級。四川本地人住在這些小巷子裡，已經住了幾百年；他們對於長江下游汲汲於世事的中國人，採取超然態度，而且加以懷疑。這些巷子小得厲害，有着黑暗的傾斜的險影，在有霧的日子，就像灰濛濛之中的地道；有幾條巷子是這樣地狹窄，以致走路的人，可以用雨傘承受兩傍屋簷上滴下的水珠。苦力們担着水桶，踉踉蹌蹌

走上泥濘的石級，把水担到自來水管到不了的小巷裡。傾倒污水和垃圾之處，也就是取用食水之處。夜裡，各家點燃着洋燈或蠟燭；人們病了，有些人利用三家教會醫院，但更多的人請中醫，這些草藥醫生醫病用祖傳的方子，方子裡從麝香塊起至小孩的尿止，什麼都有。人們避免疾病的傳染，是把一只雄雞綁在死人的胸上，這樣來辟除惡鬼的。人們頭上纏着灰布的手巾，形狀像是回教徒的，其發源，是在紀念一個一千六百年以前死了的本地的英雄，但來源已不可考。女人們就在當街和隣居聊天的時候，給嬰孩喂奶；她們往往抱了孩子，讓孩子大小便在陽溝裏。

舊的街道上充滿着漂亮的古老的聲音——豬的悲鳴，孩子的啼哭，雞的尖叫，婦女的絮語，男人的吶喊，以及苦力從河邊貨船上把貨物搬上城腳時千古不滅的唱歌似的杭育杭育之聲。賣布客人担着貨物，一面走，一面有韻律地敲着一塊木頭，作為廣告。雜貨担販把貨物裝在一只小方簍子裡，背著走，大聲一件一件唸着他的貨物的名稱。晚上挑糞的人也自己有一套唱法。賣銅傢伙的也有一套——小鈴子，小刀，剔牙杖，挖耳器，統統掛在一根長杆子上搖來擺去。整條為新的開胎店裡，工人們敲打着一根顫動的弦子，彷彿是低音提琴的伴奏，這弦子一會兒深入棉花中發出鼻音，一會兒響亮起來，一會兒又埋在棉花裡發出嗡嗡的解聲。

一九三九年，這個古城之旁，生長了新的戰時首都。蔣介石之把重慶選為首都，因為在地理上，這地方對贛代征服者至關重要。華西所有的交通線，是以重慶為中心而匯聚起來的。重慶有公路通東南、雲南、成都及北方。許流多河流在湧入峽谷之前，都在重慶匯合。比起蔣所剩下的其他城市來，蔣可以利用重慶在較短的時間內運送較多的軍需品和援軍到前線去。不僅如此，重慶還有別的優點——它的有名的多霧把城市包裹起來，一年六個月內可使日本的轟炸機難於轟炸，它的山崖，可以挖成世界上最堅固的防空洞。

從一九三八年秋到一九三九年春，被日本人趕跑的政府人員，有的衣衫襤褸，有的是烏合之衆，有的貴族化，紛紛來到重慶。政府機關大批的搬來。他們有的坐公共汽車或小轎車，有的坐卡車或黃包車，有的坐船，有的步行。小販，店老板，小政客，都在長途跋涉之後定居該城。該城二十萬人口在幾個月之內長了一倍多；在一九三八年秋武漢陷落之後的六個月內，該城人口就接近一百萬人。舊城擠得快擠破了。大街小巷充滿着糊裡糊塗的欣喜氣象。這就好比美國肯脫基州山地的一個縣城，突然要招待全部最顯赫活躍的紐約人，德克薩斯人和加利福尼亞人一樣。

新的建築物像菌子一樣散佈開來。四川沒有鋼，因此把竹頭當成樑柱；釘子很少，竹條就用來綁住樑柱；木頭很少，就把竹頭劈開，編成牆壁。這之後，這東倒西歪的匣子似的東西，四壁塗上泥，上面把茅草或瓦片一蓋，就是房子了。在這些旱屋裡，住着『自由中國』的信仰者。這些公務員們是可以回去和敵人合作，找到舒服的，但他們住在重慶，因為國家需要他們。城裡滿是新店舖和新招牌。每家店舖都標明其發源地：南京帽莊，漢口洗染公司，蘇州糖果店和上海修車廠等等，都有幾十家。難民口味各別，四川的飯館無法滿足，因此各種飯館，各家都標明了自己的特色，從海岸地區跟隨難民到內地來，在飢餓的、草草築成的棚屋內，你可以買得到福建味的魚羹，廣東點心，湖南辣子雞，北京烤鴨。在戰爭的當中幾年，在重慶奢侈的人多起來了，有的店裡可以吃到山珍海味，和皇帝時代一樣好——只要你出得起錢。中國各地的方言在重慶混合起來，變成一種奇怪而快樂的叫囂，喉音，潑洋洋，不連貫和粗魯的聲音。外國人以不入腔的中國國語問路，很可能問到一個廣東人，他的國語甚至比外國人更不行。政府機關的官員們發現，和有些同事筆談要比口談方便，四川的聽差很難懂得他們所說的話。

重慶沸騰了，漲大了。它溢出城牆，到達市郊以外，吞沒了稻田和荒野。政府給街道定下新的名字——民族

路，民生路，中一中二中三路等——所有這些好聽的名字，出現在官方文件和請客帖子上。但黃包車夫不知道這些名字，你接到一個請客帖子時，立刻就譯成舊的四川話，使黃包車夫能够明白你是要到觀音巖，七星崗呢，還是陝西街白象街口。

難民和流亡者幾乎立刻認定重慶是一個可惡的地方，而他們認為最壞的東西之一，是重慶人。和政府一起到長江上游的下江人，把四川人當作特別種類的次等脚色。重慶有錢的銀行家楊氏兄弟，是屬於使中國的財富成爲一家所有的有錢的貴族階層，那是真的。可是一般的四川人，頭纏骯髒的白布，說話是圓滑如啼聲，唱歌似的，態度是沒精打采，甚至和沿海最落後的人比起來，都似乎落後些，沿海的人至少是見過電車的。而另一方面，本地人却把下江人當作闖入者和外國人，應該加以處罰，揀取和譏笑；外江人來得多，物價高漲，這激怒了他們。重慶過去受西方影響很少；它留戀着舊習慣；結婚依然是由父母作主的，丈夫第一次遇見妻子，是在結婚的那一天。重慶不贊成下江女孩子唇上的口紅；它不喜歡髮髻；青年男女在街上飯館裡一起吃飯，使它大爲震驚。

新到的人也許會發現天氣比人更爲惡劣。重慶只有兩個季節，而兩季都壞。從初秋起至暮春止，霧和雨滴滴答答，籠罩全城；潮濕和寒冷統治着每一個家庭。大街上的泥有好幾寸厚，人們把滑溜溜的泥從寢室帶到辦公所裡，又帶回去。只有訪問極少數生着煤爐的現代化人家，才能逃掉潮濕的寒冷。一般擠擁不堪的逃難人家，縮在偷工減料的茅屋裡，只能在很費錢的炭火上煖煖自己的手指，要不然就早點上床。在夏天以前；各人都發抖；夏天一到，熱氣就來了，而太陽照得人發昏。全城覆蓋着塵土，塵土之厚，像冬天的爛泥一樣。空氣中依然留有濕氣，周身流汗，針刺似的熱，傷害着皮膚。走一點點路好像遠征一次，走長路則簡直是苦刑。成羣結隊的臭虫出來了，綠色的小虫在飲用的水裡游泳，四寸開闊的蜘蛛，在牆上爬行。有名的重慶蚊子也來了，美國人說，這些蚊子是三只一批地工作着的，兩只揭開帳子，第三只就嗡嗡進去咬人。肉腐爛了；水永遠是不够的；痢疾流行，

躲也躲不掉。

在濃霧之下以及酷熱之中，這戰爭的六年間展開了幾乎是荒唐的各種生活樣式。中國社會的所有各階層，在各個發展階段，都混雜在一個城市裡，這個城市的主要性格，是由誇張、瘋狂和妖媚三者以三個等份湊合起來的。政府宣佈燙頭髮是非法的，上海和香港女人們却偷偷的違禁燙髮；政府宣佈抽鴉片是非法的，本地船夫和脚夫却偷偷的違禁抽鴉片。富人的幾輛汽車在大街上狂叫着走，閃閃成羣的豬和破爛不堪的黃包車。天旱時節，許多人頭上插了綠葉，排成行列向神道求雨；古式的婚禮行列，領頭的是飾有紅布的花轎，很愉快地在號召人們紀念航空節的牌樓和標語橫幅之下走過。重慶城總是充滿着一些漂浮的氣息，香的臭的都有。栗子攪在砂石裏放在炭火上炒，風一吹，帶來了草藥店裏微微的甜味。在夏天，陽溝裏的人的屎尿惡臭，和油裡煎着而加上香料的使人沉醉的食物香味混在一起。

外國人，流亡者和四川人有一樣東西是共有的，那就是陌生之感。海邊來的流亡者對時間和空間都感到陌生。他們在中國的土地上撤退，每後退一步，他們就和不久以前剛脫離的民族古老傳統接近一步；他們到達重慶時，就進入了封建時代。重慶本地人對於時代是有陌生之感的；新的世界走到他們身上，他們不能了解。

重慶第一次遭大轟炸之夜，四川恰巧遇到月蝕。據中國的民間傳說，月蝕是由於天狗吞月。只有敲打銅鑼，才能把天狗嚇走，使它不致把月吞掉。五月三日空襲至五月四日空襲之間的夜裡，救月的銅鑼通宵在敲打，鑼聲響徹城中，和火聲及許多受難者的哀痛之聲混成一片。

使重慶成爲偉大，而把各種各樣參差不齊的男女鑄合成爲一個社會的是大轟炸。重慶是一個不設防城市。它的高射砲幾乎是無用的；在日本開始對該城大轟炸的時候，砲銃的來復線因爲用得久，磨光了。該城沒有雷達，

也沒有任何值得稱爲空軍的東西。該城的居民擁擠得可怕；房屋是引火的，救火器具和水源少得等於沒有。該城對付日本飛機的只有三件東西：城內崖石之間的大山洞，中國人的聰明很快地掌握住的近乎拼命的防空制度，以及人民的不屈不撓的意志。

轟炸是在一九三九年五月開始的。在一九三八年秋漢口陷落之後，日本人等了幾個月。他們向蔣介石提出了讓和的奴隸條件，蔣拒絕了。所有的大城市都在侵略者手中，七零八落的中國軍隊，無助地散佈在蒙古至廣東一綫的山嶺上。日本人覺得，中國的抵抗力已經破碎了，剩下的事，只是以火焰來懲罰依然頑強的中國政府，使它認識到失敗。這個任務，日本人交給空軍來做。當冬天的霧於四月底在重慶周圍退消的時候，日本飛機來了。新的時期以兩次空襲開始，第一次空襲剛過去，第二次接踵就來。第一次空襲發生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破壞很少，炸彈多半落在長江的水裡。第二天的第二次空襲才是一個大災難。轟炸機從北面的尋常之中飛出來，泰然自若地排着整齊的隊伍，翅膀接着翅膀，穿過舊城的市中心區。沒有效力的高射砲彈在殷紅的天上找尋彈道，爆成粉紅色，但永遠打不到，永遠打在轟炸機隊的後面。

炸彈所能引起的一切恐怖襲擊了重慶。看得見的東西，如屍首，血淋淋的人，以及數十萬擠不進防空洞的人們，引起了恐怖。看不見的東西——迷信觀念，引起了更大的恐怖，對於隆隆而來的新式飛機所發生的迷信觀念，是無法解釋，而且無藥可醫的。日本的燃燒彈引起了十幾處小火頭，在一兩個鐘頭之內，延展成許多火堆，永遠吞滅了那些古老的街巷。在後街，小巷以及轉灣抹角的衙堂裏，數千男女被火烤死，沒有辦法救。許多風格特殊的古廟，被火海一映，夜裡尤其顯得別緻。大火的一切混雜聲音，由於古城的沒落，更來得強烈——木頭在折裂、嘶叫，人在呼喊，木板和竹子搭成的陋屋在猛火之中熔化的時候，竹節斷斷續續地發出爆裂之聲。

潮水一樣的人，從那條由舊城通到郊外的主要街道上湧出去。恐怖的傳佈，是由於一種羣衆的無言的現象。

——由於牛胡半暗中緊張的臉，由於身體的擠軋，由於嬰孩的啼哭，由於婦人的悲泣，由於男人們坐在土堆和石塊上搖搖擺擺，而一聲不響。飛機是走了；人們在一個現代世界的玩意兒之前逃出來了，這是他們所能了解的最為可怕的東西。他們在驚慌的一霎那間，帶着奇奇怪怪的東西；有的人帶着活的雞，有的人帶着家用物品、褥子、茶壺、或親戚的屍體。這一大隊人很快地走入田野的黑暗中，雜亂的脚步在塵土之中翻滾，連綿不斷。有時轎子、黃包車、軍用卡車或漂亮的小轎車擠入人羣，人們就讓它們過去，讓完路，人的行列又合攏來，拖着疲憊的步子急速向前走。

開始的時候，重慶對炸彈並無答覆。拜神求雨的人們，雕塑矮胖的彌勒佛以及各種家神，而把神佛和日用必需品等量齊觀的人們，對於配有引擎的怪物從天上丟下死亡這樣的觀念，感到無法適應。如果日軍緊接着再來幾次同樣野蠻的空襲，重慶可能就此塌台。政府有幾天打算再向後撤，退到四川的內地去。一星期之內，街上不大有人；馬路上散佈着瓦礫堆。可是日機竟沒有來。由於一些迄今尚未為人所知的理由，日機過了差不多一個月才恢復空襲，這時重慶已經喘過氣來了，雖然這之後的數星期內，還接連不斷地發生驚慌現象。街上蕩着的一個人如果虛驚一下，聽見了他幻想之中的空襲警報聲而奔跑起來，別的人就跟着跑，直至幾千人在恐怖之中爭入防空洞，其實數百哩之內並無敵機。到仲夏時，甚至這種虛驚也過去了，重慶這就安於忍耐，忍受了三個夏季的轟炸。人們懂得並且信託了兩樣東西，一樣是龐大的空襲警報制度，另一樣是防空洞。

警報制度是中國人的智力的紀念碑似的工作，這制度會由陳納德貢獻了幾點意見而稍加整飭，陳納德是美國的航空專家，在戰爭中一直是中國政府的高級航空顧問。警報制度的作用，是要把飛機何時來到，是偵察機還是轟炸機，以及可能到達重慶的時刻通知重慶。日軍的主要轟炸基地是在漢口。中國間諜在漢口注視着日機的出

發，一看到，就打電話通知藏在市內的中國電台。這些電台就從漢口急電報告中國前線的電台，差不多在敵機還沒有達到飛行高度的時候，重慶就知道敵機在途中了。中國沒有雷達來從空中測知來襲敵機的高度、方向和數目，但他們在自由中國的所有邊緣上，駐有兩人一組的觀察哨達數千個。

開始的時候，重慶施行一次警報制度，在敵機溯江越過四川省界時，發放一次警報；後來改良了很多。政府在市內山頂及山腰各處，設立絞架一樣的柱子。第一次警報響，柱子上升起一個巨大的紙燈籠；這意思是說敵機來襲，還有一小時路程；掛起兩個燈籠，就是說敵機近了；兩個燈籠突然降落，那就是說『進洞吧，敵機到了』。綠色的長燈籠是警報解除的記號。夜裏，燈籠裡點上火。人們並不浪費時間來施用半滅、暗、及全滅的燈火管制，日機如在五十哩之內，電力廠的總機關就關了，全城就像死了一樣——電燈，無線電，電話，機器，什麼都不動了。憲兵在空襲時如果看到窗戶裡有光，香烟頭的火，及手電筒閃爍，他就乾脆開槍。

警報網的設計是以重慶的防空洞制度為基礎的。重慶城是建築在峻峭的山巖上面的。他們把崖石鑿開，挖成大小道路以及各種洞窟，有的山洞長達一哩半，挖防空洞變成了重慶城基本的行當之一。整個冬天，石工們有韻律地揮槌鑿山，唱鶯歌；黑炸藥爆炸山石之聲，是市內經常的音響之一。鑿掘出來的石頭，用來鋪築新的道路。每個政府機關，都有一個近便的防空洞，各機關爭着要建造最大和最乾燥的防空洞。各機關每人都有一張入洞證，憑証才可以攜帶他的太太、小孩、母親、父親以及其他親戚們入洞。人們都信任自己的防空洞。在數年轟炸期間，掘得深的山洞至多只有兩三個塌掉，而由於掛燈及警報制度，在危險迫近之前入洞安居的時間，總是够的。

在這個制度之下，重慶做成了一種新的生活。比起過去任何時期來，你更必須在你工作的地方居住，突然的空襲使行動成爲不可能。各機關造起了宿舍；宿舍裡住大部份的職員以及職工家屬。訪客一進中央廣播電台的轟然的大門以後，就得弓了背在晾着的濕漉漉的衣服之間走過。堂皇的行政機關的門階上，孩子們在咕咕咕玩耍

。一切東西，從機關的檔案起，至職員的衣服止，平日都包紮好好的，以便警報一响，飛速搬進防空洞。日常辦事以天氣為準。需要走得遠的事情，留到陰天辦理；似乎要出太陽的時候，人們在天亮之前就起身準備長征，以免空襲來時，趕不到防空洞。重慶官員們和公民們的羣衆反應是特別的；他們乾脆承認一個事實：在夏季的任何出太陽的日子，他們都可能給炸死。誰都口渴，誰都睡不好，誰都在塵灰中走路，誰都蹲在山洞里。他們開始自傲了，他們也就開始稱讚在他們左右同受痛苦的考驗的人們；在這種情況下，穿西裝的中國人和穿藍布衫的中國人感覺彼此是同胞了。

政府的唯一資源就是它的人民，在沒有外界援助的孤立的時期，政府明白了要依靠人民，並且領導他們。由於這樣，在重慶開初英勇的時期，領導方面和被領導方面是一樣地具有高尚理想及自我犧牲的。當時重慶市長叫作吳國楨，是一個胖胖的受過美國訓練的知識份子。他在重慶轟炸時指導該城的生活，十分漂亮。他在空襲時在露天衝來衝去，以最高的個人勇氣指導直接的救火。他是委員長的親信之一，他的個人的榜樣，激勵了所有的人。敵機轟毀了一大片地方之後，他接着就弄出乾淨的新的街道來。吳國楨的名聲後來漸漸低落，因為他，甚至比別人更厲害地，屈服於戰爭將結束時統治了重慶的厭世和投機主義的空氣。

從五月初到九月底，當炎熱像鐵塊一樣壓在重慶頭上的時候，日機不費氣力地隨便磨折重慶。一九三九年它們專用夜襲，一九四〇年他們通常在白天來，一九四一年它們常常變花樣，日夜都來，使人們一小時又一小時，始終縮在污臭而潮濕的洞里。水管炸斷了，電力系統破壞了，可是沒有材料來修理，店里差不多甚麼東西都買不着：農民不願意把食物運進這個死城。

重慶的傷疤彷彿是它榮譽的徽章，炸毀了的店舖，燒平了的大片土地，新房子的竹和泥的龕龕，都是戰爭的

傷痕，而新開重慶的客人，常被人帶去看這些東西，作爲它英勇的證據。苦力挑水，要挑到離河邊數里之遠的地方。市內最好的旅館給客人洗澡，洗澡水是一寸泥，一寸水，而這還是最大的奢侈呢。有的屋子裏裝有帶點現代化的廁所，廁所裡有盛水的木桶，可以把泥水沖掉辦東西。通常一個人一天的水量是一錫盆。你在早上捉了一下臭蟲之後，可以從頭到腳揩一揩身，而上午和晚上，你用的是同一盆水；最後，你把盥口水吐在盆內，然後在門口倒掉，有一種輕快之感。人們因爲缺乏洗澡，滿身發出山羊氣，但誰都不介意；他們好幾星期穿着舊衣服不換，衣服上滿是泥漬或汗漬，就得看季節如何了。電話系統還剩餘的東西，是馬路上成堆的亂電線。有時好幾天沒有電燈，因爲電線炸斷了修，修了又炸斷了。攔壩滿堆在陽溝里發臭；炸彈坑里的停滯的水孕育蚊蟲，瘧疾因此流行，痢疾越來越厲害；霍亂，麻疹以及一種討厭的腸胃寄生蟲亦然。最小的傷口都會腐爛而生根。在東倒西歪的房子里居住的老鼠，依賴廢墟之中所能找到的東西生活，長得越來越肥而且討厭；有時，當你在晚上躡步的時候，老鼠勇敢得可以磨擦在你的腳邊。據報載，老鼠咬死過小床上的嬰孩。

從沿海一直跟隨政府來的人，發現自己陷入轟炸和通貨膨脹兩層夾板之中。他們對於食物、衣服、溫暖，無一不十分缺乏。一家人如果在陋屋之中找到一間房子，就已經是運氣了。未婚的低級公務員擠塞在政府宿舍里，一小間起碼四個人；他們拿一條薄被當作褥子，這薄被只能使床上的鐵絲彈簧顯得軟一點而已。大部份的家庭和辦公廳是不生火的；公務員們白天穿着大衣抖索，晚上把大衣當被蓋。物價是每天每天的漲，薪金越來越跟不上物價。政府有鑒於此，每月發給公務員幾包米，並以平價發售最低限度需用的粗布、油、鹽和柴。這些基本的東西保障了生活；一月復一月，薪金的鈔票價值越來越低，直至整個月的薪水可以在一個晚上請客請掉。政客們有時公宴，就成爲人們愉快的機會了——可以多吃一點。

一九三八或一九三九年來到重慶的人，誰都不打算在重慶逗留一兩年以上。時光流轉，這羣人就變成中國歷

史上各省風光的最大的雜燴。把太太留在上海和廣州的男人們，或則娶妾，或則讓太太通過封鎖線來聚會。孩子生出來了，父母們當掉帶來的最後的東西，購買奶粉和維他命丸子。從前把孩子們送到沿海較好的學校的家庭，如今眼看他們的孩子在寒冷的、過份擁擠的鬼園似的地方受教育。孩子長大，說着圓滑如啼聲的四川方言，使父母的耳朵發漲。鐵路和電車變成了山海經里的東西。和政府一起西遷的青年們，在通常情形下，應該是在沿海自己的圈子里找到自己的對象，或者由父母安排門當戶對的婚姻；現在自然奪去了一切。北平籍的男孩子與四川女孩子結婚了，上海家庭里的女兒嫁給了廣東人。這是很奇怪的姻緣。戰爭結束時，有一個可愛的廣東女郎，丈夫是上海人，丈夫暫時留渝，她則由政府機關送到上海，她說：『我丈夫給我一封給他母親的介紹信。我聽說她是舊式的人；我們彼此說話都不會懂的——我不會說她的方言。』

跟隨政府來到內地的千千萬萬人，要是留在沿海，吃日本人的飯，是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的。日本人及其傀儡政府給的薪水，要比重慶政府高兩三倍，家庭的舒適一應俱全；但是在轟炸期間，在中國獨力站着沒有盟國的時候，小公務員之中從沒有逃走之類的談論。意志薄弱的人和傀儡頭子汪精衛一起，在轟炸開始之前就逃掉了；其餘的人是打算留到底的。在內閣里，以及高級將領和上官之中，有些人有時和日本的和平試探眉來眼去，但低級公務員的虔誠、紀律和希望的基本信念，是堅如磐石的。

政府常常派員坐夜班飛機到英國的屬島香港公幹。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在夜裡飛越日本佔領地，拂曉到達香港。你在傍晚時分離開航機艙艱難的重慶，過六個鐘頭，就可以在空俯瞰香港，閃閃發光，好像黑暗之中的聖誕樹，它的柏油馬路和路燈，彷彿金光閃閃的緞帶，一直延伸到山頂上。到早上，你就安住在一家旅館里，有乾淨的毛巾，流不盡的水，電話一打，就有種種舒服的侍候。重慶所缺少的東西香港都有——輪船從香港通到上海和天津，通到留在故士的家庭。但甚至在勝利似乎是神話，中國孤獨地站着的時候，飛到香港去的人們，總是回來

和政府一起担负起抗战的担子。

回顧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許多年間的重慶，現在用這樣熱烈的字眼，似乎是奇怪的。在戰爭將近結束時，重慶變成了一個毫無忌憚的悲觀厭世的城，骨髓里都是貪污腐化的。可是早期的重慶，在轟炸之中的重慶，外國記者把它寫成爲比神話還奇妙的東西，告訴給全世界。這些和中國人居過一時的外國人給當地的精神感動而迷惑了。由於他們，偉大而動人的中國的幻影，散佈到世界的另一頭，而在太平洋戰爭加緊了新聞檢查和限制的時候，這幅圖畫是完全確定下來了；要說明此後的變化已使這幅圖畫成爲虛妄，是很困難的。戰爭快結束時，新聞檢查取銷，華國人民開始看到了對中國政治比較真實的報導，而這些事實，和重慶初期的嚴重考驗時所產生出來的幻影大不相同，因此使外界不免覺得所謂重慶的精神一直是，連初期的重慶在內也是，宣傳家的謊話。但是，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之間，重慶的脈搏里，跳動着戰時全民族的力量。因此，匆促的旅客很容易造成一個錯誤，認爲重慶城本身是强有力的，力量是從它那兒產生而流注到鄉下。實情恰恰相反。中國的力量是在於農村，在於千百萬農民的精氣；農民的意志才使重慶感染了力量，光是重慶是沒有什麼的。對戰爭的真正的答覆，是在於遍佈在大陸上的星星似的鄉村。重慶過去的精神僅止於轟炸完結時，止於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危險過去，這精神就死了。

這精神曾回來過一次，在重慶雜亂的山谷間飄忽了一下。那是對日勝利日之後，該城捲舖蓋的時候。人們紛紛包裝行李和家用物件；千千萬萬人準備車船在勝利以後回家，沿看六年前流亡旅行同樣的路。

重慶最高的山的頂上，有一塊草地，可以眺望嘉陵江壯觀的山谷。你在山頂上可以看到河道的迂迴曲折，以及夜間盤繞重慶諸山的螺旋形的燈光。勝利以後幾天，天上照耀着滿月。如果你在月光明亮的期間爬上山頂，你

會看到悲哀而動人的場面。山頂上到處散佈着三兩成羣的人，靜靜地坐着。他們一聲不響，俯視着注滿月光的山坳以及銀色的河流；他們是來向戰爭、向重慶、向這個風雲際會的焦點告別的。

第二章 百份之八十的農民

在這次戰爭中作戰的中國人，是生於中古時代，而死於二十世紀的農民。

重慶和它的政府的力量，來自鄉村。在鄉村裡，農民生活在古式的生活方式之中——西洋人在四五百年以前，在一個和目前差不多同樣可怕的暴力時代，就已經解除這種生活方式了。在我們民間的記憶之中，我們把當時回憶成爲浪漫時代；至於支撐封建時代光輝燦爛的野蠻東西，我們早已忘得乾乾淨淨了。

我們過去的文明，和中國目前的文明一樣，建築在對於平民的有效的奴役上面。平民給鎖在土地上，陷入一套社會的習俗之中，成爲迷信和疫癘的犧牲品，俯伏求取主人的憐憫。他在冬天發抖，荒年挨餓，並且常常在發賣以前，由於日常生活的單純的辛苦而死去。在這個基礎之上，安坐着極其少數的有閑階層，他們從農民的勞力中取錢，而且把遠古相傳的知識和禮貌，保存給兒孫。這階層的人，從來沒有使自己的想像力稍稍擴大一點，把他們底下的辛勤的動物，當作和他們自己一樣地有着人類的尊嚴和感覺的人。西方世界曾經暴動起來反抗過這樣的制度，他們用許多殘忍的戰爭來反抗，這些戰爭的頂點就是法國大革命。我們崇拜法國大革命，但我們却把我們當時的起義，看成可怕而可厭的。雖然如此，全亞洲快要溶化的暴怒，正在沸騰着這樣的革命。而大變動的中心，就在中國的農村裡。

中國四萬萬餘人中，住在農村裡的有百分之八十。這百份之八十的人，差不多全靠田裡工作活命。關於中國的最重要的唯一事實，就是，中國是一個農民之國，是一個日曬夜露的勞苦男女之國，這些人每天從清早到夜晚在田裡工作，缺少土地而熱愛土地，其生命的一切意義，無不與土地有關。中國的大城市——由現代化的交通網互相聯系，並和西方聯系的——只在最近才因二十世紀的壓迫而茁長起來，是一種贅疣。大城市的文化對中國是

陌生的；城市里的居民是鄉下來的。他們的思想，依然受着摩天樓和工廠陰影下的鄉村的支配。

鄉村是一堆磚屋和茅棚。村子大的話，全村有一個泥和碎石的牆壁圍繞；小村落則包括十間或十幾間房子，擠在一堆，以資互相保護。在富足的村莊裡，磚屋的牆壁塗成白色，大家宅傍綠樹成蔭。至於貧窮的村莊——大多數村莊是貧窮的——就是一團東西斜斜的，風雨侵蝕了的黃色和棕色的屋子。沒有天花板，只有椽子做成的屋頂；沒有地板，只有敲結實了的泥地；窗是用紙紙做的，容納光線極微，以致屋子的內進永遠黑黝黝的，農民把穀子藏在家裡，把畜牲也在晚上放在家裡，把祖宗的神堂也供奉在家裡。白天，街上是沒有男人的——豬在打滾，雞在咕咕叫，孩子裸着下身在太陽裡奔跑，母親們則在門口袒露棕色的胸乳喂哺嬰孩，暮色蒼茫時，男人們從田裡回來，全中國各鄉村在同一時間內繞繞着藍色的烟霧，那是在煮晚飯。同時，在日落時分，那烟霧從各人家裡吹向天際。大一點的村子裡，在比較舒服而買得起燈油的人家，門口透出幾小時的黃光；但較小的村子，則當炊烟潛隱在暗中，而夜色到來的時候，村子就睡了，一點光都沒有。

生孩子、耕地和下種時，村中男女聚在一起。男人、村莊和田地的統一，是絕對而嚴謹的。所有的工作，從春天播種起，至晚春在水田裡插秧，秋天用鐮刀收割止，都是用手來做的。和美國比起來，中國的農人並不在務農，而在作園藝。他，他的妻子和孩子們用手來一顆一顆地摘除雜草。他一年十二個月都囤積全家的尿糞；到春天，他用杓子從坑裡把臭氣觸鼻的綠黑色的糞汁一勺勺地舀出來，於是非常仔細地，一點也不浪費地，把這種臭氣澆在他的蔬菜和田畝上。收割期到來時，全家都出動到田裡去割稻。家裡的人替他打穀，或則用打禾棒單調地敲打，或則監督畜牲拖一塊巨大的滾石，在打穀場上一圈又一圈地轉。所有的生命都是和土地聯系的；農民在土地上工作，靠土地吃飯，把自己的一切排洩物回給土地，最後自己也歸入土地。

中國農人和美國農人之間，存在着若干基本的不同點。中國農民的耕地是手帕似的小得一塊一塊的。中國農家，包括人口稀少的西北在內，平均每戶只有四英畝（一英畝約合六華畝）還不到的耕地；在華南和華西一些人口稠密的省份內，平均每戶只有一英畝至一英畝半。甚至這樣微渺的小塊，位置也不得當，因為這是這邊一小條，那邊一小點的，農人耕地，必須東走一下，西走一下。一般的農民牲口很少。他不能省出寶貴的糧食來養豬和食用牛，也無法省出寶貴的草地來養乳牛。他可能有一兩頭豬，可是這一豬，和雞一樣，是用廚房裡剩下的食屑來餵養的。假使他還過得去，他可能有一頭黃牛或水牛來拉犁，可是大部份的農民家產之少，連一頭牛都買不起。

農民本人沒有受過教育。他不識字，而且充滿着迷信和古老的習慣，很難用白紙黑字來說動他。他眼界有限。在主要公路以外的地方，交通像一千年以前一樣不方便。他所接觸的以及和他談話的人，都住在離他的出生地一天的步行距離之內，那些人的思想也和他差不多。他的技術是原始的。他不大懂得選擇適當的種子，直至最近，他的政府在改良選種方面也沒有做過什麼事。他不懂如何和植物害虫鬥爭。他的鐮刀、粗陋的犁、打禾棒、以及碾穀石，都和他的祖先用過的東西相同。節儉支配着他的一切行動。他採取每一小層的草，團起來當柴燒。他在劃分田地的狹小田塍上種豆或種蔬菜，以免損失每一方尺的可以生長東西的土地。他用稻草編織帽子、籃子和草鞋。他把豬的膀胱吹成氣球，給小孩玩。他節省着每一小條繩線，每一小塊紙，每一小片破布。

最後而最重要的，是他脊骨都幹得斷的勞動所生產出來的東西，竟是少得可憐。每畝生產量雖然還不壞——抵得上美國同樣大小土地生產量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但如果算起人工來，算起工作時間來，算起食口及人數來，就少得十分可憐了。如果說美國一個農人用機器、牲口、好種籽和闊農田所耕的地能生產十五磅穀子，則中國一個農人只能生產一磅。這就是說中國的農人經常在和飢餓作戰；他和他的家屬生活在飢餓的陰影裡。

人的規範是家庭。除了若干稀有的例子之外，我們再也不會懂得了：家庭是唯一的人格。家庭的共同力量，支撐着個人渡過不幸；家庭食而無厭的要求，使一個人無法具有最微小的獨立性。

中國婦女經常在生孩子，可是嬰孩的死亡和疾病，削減着活人的數目。中國人愛自己的孩子；他們能力够得到，就對孩子拚命的縱容和姑息。最窮的農民都設法把嬰孩包裹在紅布之中，用父母的小心和愛情悶死他。一部份，這出之於所有一般父母的柔愛，一部份，這也是社會壓力的結果，因為在中國，孩子是老年保險的唯一形式。父母靠勞動來生活，直至筋肉耗竭時；他們一老，要沒有家屬照顧，就一定要餓死。沒有孩子是任何人的最大的悲劇。和一般人的設想相反，中國農民的家庭是不大的。家長制的家庭，一家之內住着祖父、祖母以及結了婚的子女，與其說是定規如此，不如說是少數現象；大多數的農家不够大，住不下這麼一群人的。平均的家庭只有五個人。如果一個農人的田地，只够養活他自己和他的家屬，他就只養得起一個兒子。他要有兩個孩子的話，他的田地就必須分而為二，兩個兒子都不够吃。兒子有優先分得土地之權。只有兒子有繼承權；女兒從父親那裡分不到田地，必須嫁出去分她的丈夫的。因此農人把化在女兒身上的錢以及她吃掉的東西當作一種浪費，一種收穫極少的暫時的投資。

各地結婚時的快樂和禮節，大致相同，大部份也由田地決定的。嚴格的社會制度規定着男家要出多少多少禮，女家要出多少多少嫁粧。這些禮或則需用田地出產的東西來買，或則就是田地本身，於是不寬裕的家庭攀親極難。結婚是由父母，而不是由愛人安排的，婚姻把男女兩家結成並不太近但是有用的親戚，所以聯姻之際，得考慮兩家每一個人的情況。結婚給各個人以喜悅，但新娘在外。新娘的父親必須給點嫁粧，但他這就去掉了『賠錢貨』，而且也許能在將來得到一點好處。新郎得到了一點傢具以及家庭之中某種程度的獨立性。婆婆呢，得到了一個女傭人，可以訓練她，指揮她，利用她，而且她會有一天替她生一個孫子。只有新娘是沒有什麼尊嚴和地位

的。她在養出一個兒子來以前，不能算作家庭的一員；假如她的丈夫顯示愛情，就會給家裡斥為荒謬，直至他對她保持適當距離為止。

喪事引起悲感和長期的尊重，各地一樣。辦理父親的喪事，是兒子的最高責任。他必須把漂亮的喪服和酒席供應親友。喪事也和土地有密切關係。收獲不好的年成死人，喪事可能緩辦；有時得押掉或賣掉田地來辦喪事。如果兩個兒子爭奪承繼權，那麼出得起辦喪事的錢的兒子就佔上風。死人並沒有離開土地；土地是他的長眠之所，是他靈魂的住宅。墳地除救急之外，不能出賣，因為祖宗和子孫都有一份的。

中國農民的文化，以西方人所知的而言，極少為人所知。農民具有一些共同的迷信，如看風水，蓋房子的時候一定要風水先生來看一看，以便地方恰當，而且碰着好運道。誰都崇拜祖先，相信土地城隍之類，在他們的廟前燒香。全國各地都找得到看相卜卦的人，各地的婦女都和他們商量事情。大節日各地慶祝的情形不同，但其中最大者如新年，則各省過得都彷彿。新年是陰歷新年，好像我們的復活節，並不每年（譯按——這指的是陽歷年）在同一天。中國的新年是一個快活的節日；各項帳目都在新年以前算清，各家都休息不做工，妻子們回到娘家去作客，大家都穿上新衣服，腦壳刮得精光雪亮。這是一個完全休息和歡宴的季節。鄉民不大知道中央政府曾下過命令，說是元旦應該是陽曆一月一日，而中國一向當作新年的日子，應該很古雅地叫作春節。

除了這些全國性的特點以外，每個地方都自傲於鄉土的特點——關於神聖的人，古怪的洞及河流湖泊等等的特別的迷信。編織在民族傳統之中的地方風習使各省都有特點，而使任何外地人，不論中國人或西洋人，走在鄉村的路上時，都成為外國人。

使所有這些人聯結在一起的，與其說是他們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語言或共同的傳統，不如說是他們對貧困和

愚昧的屈服，這種貧困和愚昧，在西洋是找不出例證的。這是骯髒的茅屋裡的生活，是泥地上人口擁擠的房子，是污穢和營養不良所生出來的疾病，是冬天的寒冷，是單調的食物。由於這種火滾油煎似的匱乏，由於僵僵抽抽而屈折了的背脊，由於接連生養孩子而破碎了的腰骨，所有的中國人都在拚命爭取生活，爬抓足夠的東西來在悲慘線以上求得生存。你可以在中國任何鄉村的街上看到整個悲劇。你可以看到將近結婚的成熟的女郎——雙頰如花朶，黑頭髮閃耀着健康，結實的身體充滿着生命力；你也可以看到比她們大十歲至十二歲的姊姊們，她們的眼睛疲倦了，她們的身體僵化了，她們的胸脯和肚皮由于疲勞和生產小孩而鬆弛了——她們已經老了，因為中國的生活已經耗竭了她們。

瀟灑着鄉村之間的悲哀，浸染着外國人覺得神妙莫測的美麗的兩個特色。其一是滲透在中國民族性裡面的近乎惡作劇的幽默感。任何奇事，不管多麼微小，都是開玩笑的機會。人們在街上或鄉村茶館裡的聚會，總是蕩漾着嬉笑。他們具有廣泛而實際的開玩笑才能，使自誇者的故作謙虛，西裝的式樣，複雜的辭句玩弄，都成為滑稽。甚至鄉村裡有些最實際的習慣，也被人們鄭重其事以幽默的說法來解釋——有個故事說，農民趕一群鴨子上市場的時候，有權讓鴨子在田岸上拾吃掉在地上的穀粒，因為鴨子撒糞能肥田，鴨糞是報酬。第二個特點是閒談，閒言閑語從這家茅屋走到那家茅屋，從低聲的舌頭走入傾聽的耳朵，如水銀瀉地。誰的吵架都不是私事，因為全村一定加以辯論和評判；父親的兇暴，兒子的不孝，當地主新娶的小老婆，都是全村大事。而該死啊，假如比較開通的良善的主婦或閨女聽人勸告，做下一點不大慎重的事情，整個村子的閒言閑語簡直是滾水一樣地沸騰了。閒談包括人類的一切事情——從收穫和捐稅起，到對於戰爭、和平和世界大事的最落後歪曲的說法止。

這種生活本質，是在於情感的飢餓。大部份農民不識字，不能享用書籍和報紙。他們沒有電影，沒有無線電。他們的生活依靠謠言，幾乎隨便什麼東西，都可以用來填充他們的無聊所產生的巨大的真空。鄉村的市集是經

濟組織，也是社會組織；在農閒時節，人們聚在貨攤旁邊閒談、看變戲法、聽說書人講故事。有時有江湖戲班過埠表演古典戲；人們儘管對古式的台詞以及象徵性的動作一無所知，表演過後，總要談論批評好幾天。一發現任何稍稍異樣的人和事，農民一定盪集而來。汽車夫在鄉村裡修整機件，總是看客一大堆。帶了照像机的外國人，一定很快就會被愉快的擁擠的人羣包圍起來看，使他無法拍攝任何照片。

中國的鄉村生活不能完全用陰鬱的顏色來描畫，因為自有它的非常美麗的方面。極目四望，漂亮的峯頂、山脊和斜坡間滿是銀色的月亮似的一彎彎的稻田，美麗的草場上，有金黃的油菜花，掛着紅柿子的樹林，以及黃而高的麥田。大一點的鄉村裡，中國古的文采集中在富人家裡。建築形式之中，再沒有比中國的庭園更可愛的了。半門形的橋邊鴛在小池之上，金魚則在池中游泳；星形的房屋由一套一套的月洞門隔開來，把安詳的內部世界分成許多寧靜的小島。這種人家保存着世界讚歎的古畫、繡花綢緞、漆器和瓷器、圖畫和雕刻。他們田地上的農民從沒有見過這些漂亮東西，偶一見之，也難於像用農民的血汗來享受這些東西的人們那樣地加以欣賞。

愚昧和勞動，還不過是中國農民肩上的重担的一部份；另一部份重担，是和他的思想及迷信一樣地古老的社會制度。農民和土地的關係，是由控制土地的人來決定的。這個問題是中國最大的問題，但竟完全沒有足夠的統計材料，這是中國目前社會情況奇突的一例。有些人估計——很粗的估計——中國農民之中有百分之三十是半佃半自耕農，百分之三十是佃農和無地的雇農，百分之四十是自耕農。這個分析是非常驚人的。這裏加在佃農和小自耕農身上的壓迫，和美國農村中的壓迫大不相同。中國地主把佃租提高到無可再高的程度。好一點的田地，他們收取收穫物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在某些地區，如重慶，他們收取百分之八十之多。在地權十分集中的縣份裏，大地主好像中古歐洲的貴族一樣，自己有武裝的家臣，有無情的收租管事，有農奴——即佃農。

小自耕農常常並不比佃農好過日子。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抽稅，並且通常在抽着，他必須負擔政府的勒索，各種本地官軍的零星竊盜，以及駐在他的縣裏的軍官們的需求。路過他的地方的小兵們，都覺得可以隨便問他要豬要肉要吃的。有時農民需要貸款，而貸款在中國，可以把名義上擁有土地的農民降而為替債主耕種的雇農。一筆借款——買種籽，買耕具或家庭急用的借款——就可以使農民陷入高利貸的天羅地網之中。不管政府如何設法在鄉村中打破這個制度，貸款權依然在鄉村小押當和重利盤剝者手裏，而重利盤剝者，通常就是大地主兼做的。利率高至年利百分之三十至六十以上。一個人一給高利貸者掌權以後，就很少脫身的機會。小農通常吃虧之處，還有市場。他在收穫季節低價出售米穀，青黃不接的時候也從市場上買回來的米，却必須出高價錢。交通是這樣困難，道路是這樣稀少，以致每一地區都差不多與世隔絕。並沒有全國市場來規定價格，也沒有鐵路來使各地互通有無。

在任何鄉村裏，地主、高利貸者和商人，往往就是同一個人。通常大鎮市上總有「小康」之家組成的一個嚴緊的社會圈子。他們的田地產業給他們以威嚴的氣概和文明的外表。當傳統主義者說起中國鄉村民主的時候，他們總提到「父老」，大家的事情是由父老決定的。父老差不多總是有錢有地的人，或有錢有地之家的商業上的同盟者。中國少數的「博學之士」，即出得起錢受教育的人，也是這些人家出身；中國各級政府的人員，是受教育的人之中挑出來的。這些人由於對自己階層的忠實感，由於對自己所出身的有教養及有錢家庭的忠實感，從根起就有官僚主義。在鄉村裏，富有田地的人家和地方政府的統一性顯而易見。政府指派保長和甲長負責收稅、帶兵和維持公共秩序，這些保甲長一定差不多全是有錢人。

這些人家的所謂富有，絕對無法和美國作比。中國本部最大的地主所有的田，通常至多不過數百英畝。大市鎮上一個商人的總資本，很少超過美金五萬元的。可是在貧困和野蠻的鄉村背景下，這樣的財富是洋洋大觀了。

所有的人都在和貧窮搏鬥，而中國的各種問題，都由他們的這種搏鬥產生的——因為窮人和自然搏鬥時，往往以自相搏鬥收場。只有接近農民的中國人，才能了解他可以用多少小量的米，收買另一個中國人，才能了解他利用同胞的忍耐力，可以到多大的程度。只有目睹作工的困苦萬狀的人才能欣賞隨性的甜蜜性，所以市集上肥頭大耳的商人和高利貸者特別喜歡自己的滾滾而豐盛的看饌，因為能够享有的人太少了。

農民要控訴統治他的寡頭政權，是毫無效果的。他要控訴不法的捐稅、奇重的利息、一般警察的野蠻，必須向地方政府請願，而地方政府的組織，恰恰就是保護壓迫他的一羣人的組織。甚至在戰爭以前，對地方政府問題有興趣的少數研究者發表了幾個詳細的調查材料，說明這個制度如何發生作用，就已經使中國有良心的人為之驚駭；他們寫了幾本枯燥的小冊子，把這個地主制度痛罵一番。在有些地方，無力付出重利息的農民就由當地的警察提去關在監牢裡；他們的家裡要不送飯送水的話，他們就會餓死而沒有人理會。在某些地主的田莊裡，農民被迫作無代價的工，作為他們封建義務的一部份。農民收穫時，一切政府人員或地主紛紛各自勒索一份。

中國整個歷史中，對於地主、高利貸者和商人的古舊的三位一體制，總是痛恨的。這個制度阻礙中國的發展達五世紀之久。而在上一世紀，這制度又把中國農民束縛得空前地緊，因為西方用暴力和商業，壓迫這腐舊的機構。古時候，水旱、飢荒、戰爭往往造成土地的集中，因為其時農民被迫出售或抵押他的土地，以應付他迫切的需要。但是西方的商業壓迫，在中國造成了流動財產的新形式，而且把流動財產集中在比較少數的西洋工業和中國市場之間的買辦人的手裡。這種新的商業資產，和歷史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商業資產一樣，缺乏投資於工業的技術、勇氣、或正當的條件；它轉而投資於土地最為安全而有利。特別是在上海和廣州之類城市的附近。新的財富產生之後，就傾瀉到鄉下去；土地的價值就飛漲起來，而農民就給他所莫測其妙的辦法粉碎了。在這些城市的左近地區，百份之八十的農民變成了空手的佃農。土地作為商業投機的重要性愈來愈大，使地主和他過去所有的個

人義務分離。地主們於是居住在城市的舒適中，避離鄉村，而以不斷增加的高價買賣土地；他們儘可能抽取最大的收入。在若干地區，按照古習慣，佃戶一向是有不屬於外人的耕種之權的；地主具有所謂「田底」的權利，但佃戶有「田面」的權利，即耕種土地的權利；任何地主不能出售農民的田面權，或剝奪其生活的手段。可是，當現代化的投機買賣侵蝕了古習的土地所有制之後，這種古怪的習慣是歸於烏有了。

在沿海地區，西洋商業的壓迫是直接而顯著的；在內地，就比較微妙而模糊。中國廣大的內地的農民，在農閒時候從事農村工業。田裡的工作告一段落時，農民就織製土布、藤籃、草帽和粗絲，到本地市集上賣掉，博取微利。他們從農村手工業中所得極少，但是他們的生存線是這樣的狹窄，以致這點點收入對他們之中大部份人是性命交關的。西方的工業品開始傾入內地了，有的從外洋直接運去，有的經過前哨站上海。新的棉織物、亮晶晶的小巧東西、煤油，以及其他物品，都賣得非常便宜，而且質料也好，使農民的手工業品毫無競爭的希望。農民家裡缺乏電力，也缺乏力的其他來源，只有人類的力氣；不管他們做出來的東西多麼便宜，和工廠做的東西比起來，不論在質料方面或價錢方面，都是無法競爭的。中國某些區域的家庭工業這就全部給消滅了，而農民這就無法利用餘閒，獲得補貼。而工業不僅沒有在內地建立起來，以吸收過剩的農村勞動力，反而集中在沿海，吸乾了不景氣的農村人口，這些人們求一日三餐，每天得在工廠裏工作十四小時左右。

一世代以來另一樁嚴重事情是國內的騷亂。把內地撕成一塊一塊的軍閥們，多半是精明而野蠻的人，他們要把他們所獲得的東西和地位固定起來；最好的方法是獲得土地。於是農民給打出田地，或被捐稅剝奪土地所有權。在華西成都附近的一個縣份裏，百分之七十的田地是屬於一個人的，他過去是軍閥。這些軍閥現在即使失掉了軍事地位，依然擁有勢力很大的經濟力量。

中國農民被投機家、軍閥和西洋的工商業弄得破產，桎梏在自己的古老的封建關係之中，漸漸被迫得氣都透

不過來。縱然中國有着一些新的鐵路和工廠，縱然中央政府有着一點合乎人道的紙上的立法。有些學者認爲，在現世界之中，只有中國的人民才比五百年前吃得更少，生活得更苦，穿得更壞。

西洋和中國許多研究者，是通過古典文化來觀察中國的。他們通過這樣的媒介物來觀察，把中國當作是「古雅」的，而且發現年深月久的蒼翠的銹痕，悠悠然籠罩在中國的鄉村和人民之上。田野中聖經時代的韻律，使中國的生活彷彿是一首牧歌，以神所指定的旋律，從這一季蕩漾到那一季，從播種時蕩漾到收穫時，從出生蕩漾到死亡。中國的知識份子爲了外國銷行而寫的關於其國家和人民的作品，總是強調這瀟灑之美，以及古哲學的明白純潔。這種圖畫是虛假而有毒的。在種田和農事的表面日常生活之下，求變的醞釀是在可怕地沸騰着，現在這種沸騰日益增漲，正在奔放到中國政治的主流中。當農民起來，在鄉下激起變亂的時候，對那些變亂的野蠻性最先吃驚的人，就是把農民的生活幻想成十分可愛的人們。人民大眾如得到機會以原始的公道加之於壓迫他們的人，其如火似荼的粗野，是甚麼都比不上的。搶掠和屠殺，火燄中的廟堂，以及泥濘的草鞋腳蹂躪錦緞的景象，是令人驚懼的。但是在任何革命之中，不論革命大小，都缺乏慈悲或辨別力。

中國的大問題，是在於是否能有甚麼民主形式的政府，運用聰敏的法律，在農民把法律握在自己的手裡而把鄉村燒成一片大火之前，用和平的手段來緩和這種緊張狀態。

第三章 國民黨的抬頭

由於鄉下的貧困，由於農村中日益增漲的緊張和壓力，中國內部產生了一種緊急狀態，要平靜下來，只有變——可能的話是和平的變，沒有其他路走，就只有暴力的變。在中國歷史上，這種革命壓力並不是新東西。曾經有好幾次，舊的制度成爲農民身上的太重的負擔。農民在那些場合，就用鮮血來染寫自己的土地的歷史，以拚了命的憤怒來掃蕩大地，甩開其時正在統治着的皇朝，建立了一個新秩序。中國的許多朝代，每一個都是由起義產生的。每個朝代開始的時候，頂上有大刀闊斧的政府，下面則有土地和封建義務的重新分配。而每個新朝代本身，終於又經歷日益擴大的分化，於是又令人不能忍受，而受苦和不满的人所醞釀的革命，又重新爆發起來。

今天的危機是和多年以前的危機不同的。原因之一，是歷史上一般的起義，只在農民中產生一點薄弱的平等制度，而歷史要求今天的，却是須把中國社會提升到現代世界中的東西。另一個原因，是革命和改組的循環律，早就蕩然無存了。一百年以前，有一個過了時的反抗瀕死的滿清的革命，從南方起來幾乎掃蕩到北京。這是太平天國革命，是一個猛烈的運動，包含著基督教的初步概念。最後只因爲外國的軍事干涉，才把它壓服下來。當時，也像如今一樣，人們覺得中國的秩序和穩定，對世界的和平至關重要，而只有粉碎中國農民的變亂，才能保證這和平。太平天國革命之被壓服，使中國約有六十年無從有根本的變革，而年復一年，變革的拖延所產生的壓力越來越大。最後，眼睛一睜開，中國就爆炸得四分五裂；好像一串炮竹，爆出一一起義，又生出一一次反動，暴力愈來愈大。從這混亂之中，出現兩個分明不同的集團，對於如何結束混亂的方法，這兩個集團各有其清晰而不同的見解。

滿清帝國於一九一一年倒台，使中國消失了表面上的不變和穩定之狀。不到五年之內，有些人從新學會了從

政之道的第一課——國家是依靠武力的。那是軍閥時代，中國給分裂成爲一塊一塊流血和不快樂的地方。每個軍閥都有自己的軍隊，每一支軍隊都有自己的地區。大軍閥統治一些省份，他部下的將軍們統治省的一角，連長之類統治縣、城、鎮。三百名士兵就可以征服一個縣，抽取它的稅款，強姦它的女人，拉走它的兒子，吃它的穀稻吃得很胖。習慣於統治別人都走掉了，軍人接收一地，就驚異地發現自己就是政府，自己就是法律，自己印的紙張就是錢。心頭火起，他們自己之間就開仗。於是一下子你聯合他打我，一下子我聯合你打他。野心、賈友，和卑鄙的手段，這就成爲中國政治的金科玉律。而每一椿壞事的主犯，總把壞事情說得非常神聖，說是爲了中國的統一才這麼幹的。軍閥們留下來的唯一遺產是對於武力的信念。蔣介石和共產黨人二十年來所保有的同樣的信念，是深信武力爲安全的唯一保證。

軍閥純粹是破壞的。在以前的時代，這樣的無政府時期也許要延長幾代，才能恢復起來。不過現在是二十世紀。列強從衰敗的滿清政府那兒勒索的租界，在中國沿海及內河各地都有。中國主要的河流行駛着外國人的輪船，那些輪船由掛着外國旗的船艦保護着。外國人所有和經營的鐵路，從中國吸取利潤給外國投資者。中國的關稅是由外國人來規定和收取的；國家稅收之中最豐富的一項——鹽稅，也由外國人來管理。住在中國的外國人對滿清以及其後的軍閥十分輕視。可是他們在廣大的中國之中，並不能生活在孤立的社會里。爲了自己，他們不得不創造或教導出一批中國人來派用場，這批人要能够在他們自己和他們打算搶劫的國家之間作橋樑。於是西洋商人創造了和他們相像的中國商人。中國的新式銀行發展起來了；老的銀行也學會了把複式簿記代替算盤珠。外國人所掌握的工廠、輪船、礦山和鐵路，需要一羣熟練的中國人來工作。他們的成功，使中國商人也開始舉辦同樣的事業，這也需要同樣的管理人和工程師。一種新的中國人這就開始出現了，這種人是可以歸化於現代世界的公民；中產階級是在這封建國家內發展起來了。

西洋思想的壓力，並不比西洋的軍隊和商業的壓力弱。在中國建立起來的新式大學，教授新的科學和技術，創造了一種新式的學者和學生，他們不大想到詩經和千百年以前的古典詩書，倒是更關心亞當·斯密司，卡爾·馬克斯和亨利·喬治。在帝國主義列強加之於中國的輕視、野蠻和凌辱之下，熟習新的學問的人們，甚至比商人更痛苦。他們給予國內的不滿以光輝的知識上的領導。當時的怒潮彷彿是一場毫無紀律的大混亂，空言和泡沫大於實質。可是它的發生，是由於一個基本問題——中國尚未成爲國家。這個問題只有一個基本的解決方法——中國的內部統一和力量。

新的商人和受教育階層的政治工具，是大家知道的國民黨。早期國民黨的建築師和靈魂，是一個眼神憂鬱的名叫孫中山的夢想家。孫中山氏攻擊世界各問題的天真之處，現在常爲有知識者所嘲笑，但是替中國人民的一切複雜問題制定行動方案的，孫中山是第一人。這方案就好像西洋有什麼思想家竟想爲封建主義問題、爲文藝復興和改革、爲工業革命問題、以及目前的社會不安問題，擬定一個清清楚楚的解決方案。孫中山是廣東人，曾在夏威夷受教育。在清朝最後的十年間，他幾乎參加過每一次失敗了的反滿暴動。他曾以被追蹤的逃犯資格，居留過日本、美國和歐洲。口頭上擁護統一的軍閥們，差不多每個人都曾經摘引孫中山的話來裝飾自己的野心；結果差不多每個人都出賣了他。中國的顛連困苦，孫中山的道理的火一樣的雄辯，他流亡過的各國的西洋文明的例證，最後都綜合在他的著作三民主義中。

三民主義並不是一本完整的書，但是它在目前中國不論共產黨或國民黨之間的神怪性，使它成爲中國最主要的政治理論。這本書的孕育時間很長，直到孫中山逝世前不久，才印成書本。其時正當他快要使他的黨在自己的歷史上作最大的冒險的時候，他發表了幾次演講，把演講稿的紀錄本摹印成書。雖然，在付印之前，孫中山的思想是早就流傳於世了。孫中山的理論是以檢視中國開始的。爲什麼中國在國際上這樣屈辱？爲什麼中國人民這樣窮

困？他的答覆是簡單的——因為中國弱，無教育，而且分裂。為解決這問題，他提出了三個主義。

第一是民族主義。中國必須把主權和統一爭取回來。必須把外國人逼出租界，必須使他們把從滿清那裏掠奪來的東西吐出來。中國必須具有任何外國所有的一切力量 and 尊嚴，它必須有紀律，必須肅清軍閥。第二個主義是民權主義。中國必須是政府為人民服務，並且對人民負責的國家。人民必須學會讀書寫字，以及投票選舉。必須樹立一個自下而上的制度，人民的權威從鄉村一直上達至於全國的最高指揮機構。第三是民生主義。中國的基本工業必須社會化，政府應該單獨負擔工業化和復興的廣大責任。和樹立現代化的上層經濟機構，同時下層的基礎必須加強。農民的負擔必須減輕，田地應該屬於耕種者。

孫中山的主義立刻為全國所接受。全部接受它的人不多，但是這主義中間，包含着一些幾乎使所有的有思想的中國人都大為感動的東西。新的中產階級把它珍藏在心中。甚至驕傲的鄉村貴族，也可以在除掉軍閥及外國人必須滾蛋這兩個主要之點上跟着它走。孫中山流亡和失敗的期間，也就是他受教育的期間。他以夢想家和知識份子開始他的事業；可是，在滿清倒台之後的十年間，他和全中國的人一樣，學得明白了光是理論不足以改造國家。幾千幾萬人，也許幾百萬人，願意承認他的理論對，甚至加入他的黨。但是黨需要力量，需要武裝工具來實現它的意志。至一九二〇年初，歷史奪了孫氏的忙，給了他所需要的力量。首先，蘇聯人已獲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反封建的革命，並且對各地的革命都有興趣。他們不僅願意把政治顧問送到中國來幫助孫中山，而且願意把久戰沙場的軍人派來替他建立一支軍隊。其次，中國內部十年的戰亂中，如今已產生一些對於搶劫以外的事情更具興趣的青年士兵和軍官，他們以國事為目的，對國家本身有興趣，他們在為自己的軍事技能尋找政治上的領導。

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得到地方軍閥的允許，在廣州設立一個名義上的政府。這以前，他曾和其他的軍閥有過同樣的協議，那些軍閥是在為實際上的專制找聽動的門面，因此每一次都出賣了他，當他打算實行超出於名義

權力以外的事情時，就給踢出去。這一次是不同了。在一年之內，孫中山的新政府就成爲白熱化的革命運動的場所。他有兩個最引人注意的俄國顧問——鮑羅廷是政治上的師傅，加倫將軍是軍事顧問。共產黨人參加了這運動，而且成爲國民黨員。政治中心是一個訓練學校，訓練一大批熱烈的革命者，在其後數年內派到全中國各地去講述新的主義。真正的力量，却在於訓練革命軍官的黃埔軍校。這軍校訓練人們如何掌握武器，不是僅只爲了武力，而是以新中國的名義掌握武器。孫中山挑選了一個瘦長而眼睛冷靜的名叫蔣介石的青年，浙江人，來主持這個學校。

在我們這時代，蔣介石的完整的傳記不會出現。能够詳述他的性格的人們之中，許多人已經死了；其他的人要就是他的家臣奴僕，把他看成聖人；要就是他的死敵，只願他滅亡。在中國，要把蔣氏的爲人實況紀錄下來，久矣是十分危險的事，因此，除了官方的幾本崇拜偶像的傳記之外，都是些零零碎碎的傳聞。

蔣氏在廣州就已經是革命的青年英雄。他使孫中山的俄國顧問和他十分合得來，以致他們在一九二三年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受六個月的訓導。當他回國主持黃埔軍校的時候，他從比較落魄的地位很快的升到顯要之處。一九二五年孫中山的死，使他擁有無人能超越的權力。

至一九二六年春，國民黨的革命軍準備出發進行那有名的北伐，從廣州起至長江兩岸，把中國從軍閥手中收回來。蔣介石是總司令。這是一批雜色部隊，使用着各國製造的殘破武器，由俄國顧問作參贊，有幾支十分重要的部隊是由悔悟了的軍閥指揮的。在部隊出動之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政治間諜在各地組織了農民和工人，并且替鄉下人準備了天亮的日子。在革命熱情的高潮之中，軍隊向北直掃，取下了漢口，漢口的工人是早就組織起來了的，在夏末開始了罷工。從漢口起，各軍向東沿長江而下，掃過南京，向上海進發。

革命軍的挺進，聽起來好像是上海的外國租界的喪鐘。內地傳出許多故事，說起暴動、流血、屠殺，說起使一切外國船隻和工廠停閉的罷工，說起中國軍人殺掉白種人，強姦白種婦女等等。怒潮到達上海，是在一九二七年春。共產黨在上海市內組織了工人暴動，而在三月二十一日，巨大的總罷工開始，除公共租界以外，全市關門。武裝了的工會，使他們自己的罷工成爲近代最大的暴動之一。他們奪取了警察局，政府房屋以及各工廠，取得這樣快，使蔣氏的國民黨部隊到達市郊之時，工人就已經完全掌握上海，而且把權力移交給革命政府。

勝利的頂點到來之後三星期，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聯盟完結了。這三星期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是神祕莫測的。一夜之間，上海流氓和秘密會社突然以擁護蔣氏的面目出現。而顫抖着的外國商人，很快地就通知別人說蔣氏確實是一個『明白道理』的領袖，而外國的武器和援助，這就供給了他。革命軍是軟弱而動搖的；蔣氏自己的若干部隊感覺到一種迫近的危機，會和共產黨人有所接洽，而忽然之間，事先一句話的警告都沒有，蔣氏的代表，在秘密會社的打手幫助以及外國人的慫恿之下，轉身進攻工人，解除了他們的武裝，槍斃了他們的領袖，並且用連續幾年的清黨，把共產黨人逼到地下去。

國民黨本身也給這次背盟行動嚇了一跳，於是分裂爲二，一派人跟從蔣介石，一派人屬於漢口的左翼。雖然，到一九二八年，國民黨又撮合而成爲一個堅強的反共陣線，並且獲得了穩定。於是該黨在外國人的眼睛裡完全得到尊重，而且被承認爲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該黨於是把權力所在地從廣州搬到長江流域。該黨所統轄的城市中，工業的輪子開始轉動。可是在鄉下，孫中山的農業改革計劃是小產了；古舊的制度再加上繼續的內戰以及商業上的投機，依然籠罩着農民。革命是流產了。

發生了什麼事呢？要了解大革命的悲劇，必須回叙廣州，說明一下蔣介石歷史上的敵人——中國共產黨。中

共和國民黨一樣，也是由知識份子醞釀而產生的。它在中國歷史舞台上出現，要比國民黨遲，它以俄國革命為模範，分析並提出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在外國人必有逐出、軍閥必須殲滅這兩點上，共產黨人是完全和孫中山及國民黨一致的。但他們更進一步，他們問：改造中國爲了誰呢？他們的答覆是：爲農民。

爲達到此目的，不僅必須實現國民黨的一切目標，而且得走下去，在每個村莊裏粉碎把農民束縛在中世紀時代的封建枷鎖。在城市裏，則工廠和作坊裡的新的產業工人，須成爲新世界的組成者。要工業成爲中國之福而成爲中國的新的災禍，必須首先把沿海廠主們的野蠻的剝削取消。共產黨早期和國民黨同盟的時候，也把他們在各地的有紀律和熱狂信仰兩點特色一起帶來。中國共產黨初期在組織上是和莫斯科聯系的。派到孫中山那裡的第三國際代表團，完全掌握着該黨，而且根據莫斯科的嚴格訓令，要他們從屬於國民黨。中共派出去的間諜，在巨大的組織運動中作先鋒，替革命軍北伐的勝利打下基礎。他們使軍閥的戰場變成浮沙；農會和工會幾乎在頃刻之間發展起來，羣衆取得了史無前例的領導權。

蔣氏看到中共和他自己一樣，是冷酷無情的領導者。他把共產黨人看成俄國的間諜，擁有一些魔術似的方案，要把農村陷人社會大動亂中——他恨他們。在他和共產黨同盟的頭三年中，他在等待時機。他需要俄國的軍火和農民的支助，無法決裂。但是他行軍到了長江流域，就開始接觸中國新工業家和商場貴族的最上層。那些人對於罷工和工會的恐怖，並不輕於外國人。而農村改革的口號，威脅着要推翻農村商業和地主的整個制度。蔣氏忽然在上海商場上發現了援助他的新的基地，這基地之強大，足夠維持他的黨和他的軍隊；他有了那些人和他們的錢作靠山，再不想依賴蘇聯的帮助或農業改革了。蔣氏一打定主意，行動極快。在共產黨領袖們尚未風聞發生了什麼事情之前，該黨的頭給斫掉了，上海事變後一年之內，中共在全中國變成了非法組織。

此後顯現出來的新的中國，蔣介石是主要的建築師。有時，他在抑鬱之中，退出政府幾個月，以證明只有他才能把政局中不同的份子湊在一起；他回任時，威信和實力總比以前更大。新的國民黨政府是一個獨裁政權。它把孫中山的言論牽強附會，說自己是人民的『監護人』，而人民則在『訓政』時期中。它的秘密警察無處不到。它的檢查制度，像一只密不通風的袋子一樣，單在中國的報章雜誌及大學之上。它在任何地方都不舉行選舉，因為它認為加強自己就是加強中國，它是用命令來管理的。這個政府坐在一張四只腳的椅子上，那四只腳是：軍隊，官僚，城市裡的大商人和鄉村裡的貴族。

蔣介石最心愛的是軍隊。蔣氏招來了一批德國顧問，把他的軍隊鍛鍊成強有力的作戰工具。軍人們學會了露步以及德國步槍及大炮的使用方法。陸軍內部有一批近衛部隊，其中包括黃埔軍校的原有集團。軍校的青年學生多半已在早期的革命戰爭中死亡，但活着的人忠實於國民黨和蔣氏，並且把他當作新中國的象徵。後來許多級的學生入校之際，原來的黃埔生已經自上尉升成少校以至上校了。到抗日戰爭爆發時，黃埔畢業生當師長的約有四十人。此外蔣的周圍聚集了一批高級軍官，他們過去也同蔣一樣受過軍閥教育，他們是不屬於任何堅固的團體的，他們指揮過蔣氏所要打的許多戰役，但蔣氏給予他自己訓練出來的年輕人的情愛和信任，他們從沒有得到過。蔣氏的軍隊是中國空前最強的部隊。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七年，他從沒有一年不進行內戰。他的力量的根據地是長江下游，他的四周都是些軍閥統制的省份。這些軍閥有時個別地，有時聯合起來對他的統治權挑戰，而他逐個逐個地不是收買過來，就是加以消滅。他漸漸把華中推廣到遠至三峽都在他的掌握之下，直至日本進攻之時，黃河以南的全中國都承認他是主人。

在統一的過程中，蔣氏在南京所創立的新的官僚機構，其人數之多，幾乎跟軍隊不相上下。這以前，中國甚至從沒有最原始形式的現代政府。新政府有一個真正的財政部，一個真正的鐵道部，一個真正的實業部。該政府

有一些農業研究所以及衛生局，雖然這些機關絕不能和西方的標準相比，已經是中國從沒有見過的最好的機關。中央銀行建立起來了，這銀行給中國帶來了一世代以來從未有過的穩定的通貨。新的公路開通了，激勵着工商業。新的教科書出版了，新的科學發展了。在這些機關裏服務的學者、學生和工程師們，既不虔誠地信仰蔣氏，對於國民黨的獨裁也不感到快樂，但他們各人總算有了服務國家的第一個機會。他們是有能力的，而且一般講是純潔的人，他們的才幹，這是第一次得到了發揮。

其他兩根支柱是形成政府的社會基礎的兩個階級。其一，比較進步的，是沿海和大城市裏的商人。他們因為革命而發了財。他們把外國人對海關的管制放鬆了；現在他們以平等資格，和西洋的商人打交道。新政府的穩定的財政，合理的稅務機構，使他們開始享受西洋商人享受了幾十年的機會。政府在長江流域維持了法律和秩序，建築了新的鐵路。一陣繁榮的浪潮，把中國的商業和工業活動提升到新的高度；出入口貿易旺盛了；生產品增加了好幾倍。

在鄉下，國民黨依靠地主貴族。在法律書上，國民黨的確寫下了一些以前從沒有想到過的最進步的法令，以減輕農民的困苦——但這些法令祇是裝飾品，從來沒有實行過。政府探究遠古，恢復了一種似乎是簡單的制度。每一縣給分成許多單位，叫作保，每保包括數百家，又分成許多甲，每甲十戶。每保每甲都有保甲長，其作用在傳遞國民黨心裡想建立的一切新的改革。在紙面上，這制度看起來是很好的。可是實際上，保甲長就是一向統治着農村的地主和貴族。農民從下面看上去看政府，看不出有甚麼改變。他的捐稅同先前一樣；他的租佃和借款利息和往常一樣高；他要有所聲訴，衙門裏還是同樣的人，總是駭斥他的要求的。革命甚麼都沒有帶給農民。而國民黨，國民革命的黨，如今在每個村莊裏都穩穩站定了，各地的黨組織的根，是在出身好和有錢人中間。

推動政府的靈魂是蔣介石本人。他可以安然把黨組織，行政和建設事務交給他的部屬去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的尙未發揮出來的才幹，稍加指點，就可以指揮使中國現代化的技術上的事務。蔣氏本人就把自己的精力和興趣放在兩個大問題上，那就是共產黨問題和日本問題。

蔣介石和共產黨之間的反對軍閥及帝國主義的同盟，是在農民和土地這基本問題上破裂的。中共會設法——但太遲了——重分土地和改組鄉村裡的整個封建關係的制度，把起義推到預定的頂點。在和北伐同時到來的騷擾之中，農民曾不止一次地把法律掌握在自己的手裏，而且自己作判斷。你總不能一方面要求人們來推翻外國的帝國主義和貪污的軍閥，同時却寬恕直接打擊你的鄰居的鄉村裡的不義和壓迫。國民黨要把革命限制為實現幾個有限的目標，如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主義。它答應在建立政府之後，照顧到佃租、利息和農民的其他問題。但是農民不願意等候。

蔣氏把共產黨人壓到地下，他切斷了他們和城市工人之間的聯系。可是他無法打破他們和激怒了的農民之間的聯系。在長江以南，共產黨人發現革命的記憶，在鄉民的心中依然新鮮，他們的軍隊這就進而建立了一個小小的蘇維埃共和國。蔣氏於是對蔣南的這個蘇維埃共和國，發動不斷的戰爭。美國的借款撐住了他的政府，他的由德國裝備並訓練起來的軍隊，年復一年地緊縮其包圍共區的封鎖線。也就是這樣的反共戰爭，使軍閥們和蔣氏結成聯盟，以資互相保護。反共的鬥爭是蠻野而殘酷的。在蔣氏統制的區域內，他的警察屠殺中共領袖，中共著名的領袖的家族也給掃滅，學生遭受監視和偵察，身邊如有共產主義的書籍，其罪至於處死。在中共區域裏，則地主吃虧最大，而窮人對富人的憎恨，毫無約束。

至一九三四年，反共的壓力變得太大了，共產黨人這就衝出蔣的封鎖綫，完成了大家知道的奇蹟似的長征。共產黨的男男女女，背着袋子，行李和檔案，從華南行軍到西北去重新立足。其主力三萬多人所走的迂迴曲折的

道路，長達六千多英里。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長征是一個殘忍的考驗，感情的頂點。他們所忍受的痛苦以及他們所擁有的鋼鐵一樣的決心，是無法以言語形容的。長征所經過的鄉間，如今依然殘留着無數石礮堡，那是政府造起來包圍中共的。烈火一樣的戰鬥，在千百個村庄里使農家破碎。在華南和華中的若干縣份里，人們因為這次長征在鄉下造成的破壞，依然在憎恨中共。在此若干縣份里，則中共在貧農中造成的政治忠實性，歷許多年而不衰。中共在一九三五年底，終於把自己安頓在西北，在陝西延安以北的區域內。延安後來變成他們的主要基地。

中共到達延安之時，正當該黨歷史及該黨路線的轉捩點。他們已經成爲一個獨立的組織了，他們和莫斯科之間，只有名義上的聯系。蘇聯已經和蔣介石恢復友好關係，而使中共自己保衛自己。中共從他們的新的根據地發出了新的號召：中國人團結起來反抗日本！全中國頃刻之間響應了這號召，因為這號召觸到了情感的最深處。日本已在一九三一年奪去了東三省，繼續進迫，越過了長城，把鴉片大傾銷入華北，窮凶極惡破壞了國醫友善的每一項標準。當時中國受到日軍空前的凌辱，日本彷彿除了全部掌握這個泱泱大國之外，再也不會滿意似的。

至於蔣，他是恨日本人的。但他覺得他的軍隊無法制止日軍的前進，覺得中國的工業無法和日本工業的現代化力量頑抗，覺得中國沒有統一。他打算先消滅共產黨，建立了統一，然後再來應付日本。共產黨的新口號却把他逼入無法忍受的景況下。中共的邏輯是誰也駁不倒的：敵國正在設法殺盡中國人，中國人爲什麼要自相殘殺呢？國民黨以耳語解釋道：它在等候抗日的時機。它說是時機一到，就會轉過頭來保衛中國。而同時，學生們却因爲反日遊行示威而給逮捕入獄。中國新聞記者和知識份子們看到這情形，表示驚訝，一天天過去，外來的民族滅亡的威脅愈來愈嚴重，在國內，政府則把資源不用在抗日方面，而用在剿共方面。

團結的呼聲漸漸侵入軍隊了。在北方，剿共的內戰雖然仍在被推動中，戰爭却弛緩下來，終於停頓了。蔣氏

飛到西安去使內戰復活，一逕飛入一個圈套中，被扣了起來——扣他的不是共產黨人，而是由於希望對日本作戰而拒絕對共產黨作戰的軍閥。蔣氏被禁閉了兩星期，在這期間他親身會晤共產黨人，這是一九二七年以後的第一次。關於蔣氏被扣期間實際發生的事情以及他和共產黨人會面的情形，從沒有人作過充份的記載，可是其結果竟像閃電一樣，內戰突然結束了。蔣氏認中共有權在中央政府的警備機構下管理他們自己在北方的地區。他們的軍隊須併入國民軍。他們應放棄其農村中的革命計劃。政府則應立即作民主改革。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提出來的政綱，應成爲全國的法典。

消息傳到日本人耳中，好像半夜里的警報。自從中國的國民革命時起，日本一直擔憂着兩個前途：一是中國團結，二是共產主義席捲中國。日本知道團結而復活的中國，最後會成爲亞洲的領袖。日本也懼怕共產主義。它自己的帝國以貧瘠多山的島嶼爲基礎，除了人力以外，各種物資都很稀少。它的武裝力量依靠平民和軍人的不用腦筋的服從；任何要使他們動動腦筋的制度，都是威脅日本的。因此，不管蔣或共產主義在中國得勝，都會使日本失敗。爲了使中國永遠軟弱、分裂和順從，日本的大陸部隊會經常從北方進迫，參與軍閥政治，用千千萬萬的特務人員來毒化中國。蔣氏和中共的新的妥協，表明如今中國不僅可能團結，而且團結的中國可能容忍並寬恕共產主義。不能錯過時機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之夜，在北平城外的蘆溝橋，日本駐軍實施戰鬥演習，有人開了一槍。日本就說他們遭受攻擊了——戰爭開始了。

第四章 日本動手太遲了

在三十年擾攘之中，中國人民獲得了一個痛苦、然而經久的教訓。捲掃全國的洶湧澎湃的革命浪潮，最後產生了一些領袖，從歷史的眼光看起來，他們在自稱對國家負責。超出了敵對的兩黨耿耿於懷的一切仇恨，他們對中國的團結和命運，終於獲得了共同的信念。日本的一切計劃，都將在這個信念的磐石上粉碎。抗日戰爭的最初幾砲，壓平了中國內部的一切不滿，壓倒了口號、冒險陰謀、政策私見。當全國轉過身來對付日本的威脅的時候，甚至革命本身在中國社會深處的微渺的工作，也暫停了一些時候。如果投降日本，中國什麼都沒有了，共產黨也完，國民黨也完，富人和窮人，都沒有任何餘餘可言。

一九三七年日本在大陸上的行動，具有軍事和政治變管齊下的計劃。過去五年來，他們已經一塊一塊地咬光了中國長城以外的地方，中國困在內戰中，只向國聯抗議。這一次，日本打算奪到長城以南黃河以北的五省。他們計劃取得了北方之後，勸蔣介石氏在其餘的地方作更遠大的讓步，並讓與特權。日本打算緊縮其經濟——政治的掌握，最後扼住全中國，並且把中國政府的地位降為下屬的殖民地政府。假如日本早五年動手，他們也許會成功的，但一九三七年是太遲了。

他們在北方的戰鬥，按照預定計劃而行進，幾乎分秒不爽。他們的部隊從北平和天津展開，攻向西北，穿過南口山峽，從南方衝出長城，然後再轉過身來從北方進入長城，打開富於煤鐵的山西省北部的諸關隘。他們沿津浦路南下，數月之內到達了黃河沿岸。在東北抵抗日軍的，是很舊式和很新式的混合部隊。出乎一般人的意料，軍閥們對於日本的威脅和諾言竟沒有屈服，反而寧願和中央政府並肩作戰。可是，他們的軍隊是叫化子隊。他們沒有軍事戰術的共同機關，沒有相互之間的信任，沒有現代化的組織。在日本的鋼鐵作先鋒的大軍之前，他們好

像泥濘一樣倒塌。那是夏天，由坦克率領的日軍，幾乎隨心所欲地飛馳過華北的黃色平原。他們的空軍統治了天空，掃射中國公路上的微小的運動之物。日本在華北的軍事間諜十分高妙。戰爭的最初階段，好像在操場上演習，日軍完全按照原定計劃，切斷鐵路和公路，佔領了一個個目標。按照一切的計算，佔領了主要的鐵路站和公路站之後，戰爭應該結束了。因為這些城鎮是使日本煩惱的政治煽動的中心，這些城鎮是中國軍事上的鎖鑰。可是奇怪，日本人誰也說不出什麼緣故，戰爭竟繼續下去。步槍從鄉村里和山里打出子彈來。日軍擄掠各種東西；他們強姦北方的婦女，直至色慾都盡了；他們在他們以恐怖佔下來的地方，加上了火的烙印。縱使如此，有一支鬼計多端的抗戰力量正在他們左近成長着；突擊他們，使他們流血，這支力量似乎只靠泥土來維持生命的。這就是中國游擊區的抗戰力量。

游擊的中國是中共的稱霸之地。在蔣介石和中共的協議之下，蔣氏擔任陣地戰，中共担任牽敵人的後方發動游擊戰。以前的紅軍，如今改爲中央政府的第八路軍，於一九三七年秋從他們陝北小小的不毛而多沙的根據地出發，開始了軍事史上最令人驚異的冒險之一。中共的軍事力量一九三七年是八萬五千人，到戰爭結束時達一百餘萬。中共在政治上統轄的人數則自一百五十萬人增至約九千萬人。在抗戰的最初幾個月，中共從萬山叢中發展開去。他們的師和正面部隊分解爲旅，旅化爲一個個的營和連，點點滴滴穿過日軍的陣綫，到達敵後的鄉間。在戰爭爆發以後四個月內，中共部隊已站立在大海之濱，離出發地七百里，組織了敵人後方的新的戰爭。

日軍的烈火開闢了許多仇恨和恐怖之井，準備人家去汲取，而共產黨人就汲取了它們。軍閥部隊的兵士們在危險的公路上的日軍之前逃遁，逃到山裡；他們是一幫幫沒有組織的不法之徒——可是他們有槍。其中有許多人參加了中共抗戰的後備隊。別人丟掉或賣掉的武器，馬上用來武裝農民抗戰的根苗。北方大學生一向嚷着對日作戰，即在戰爭已經到來，而且其野蠻性遠超出他們在課堂中的想像之外，他們也要參加戰爭，他們拋棄了學校，

通過封鎖綫，參加了抗戰。中共的領導是黃河以北整個抗戰運動的集合點，不論共產黨，國民黨或無黨派的人的每一點點精力和知識，都很快地貫串在一個社會改造的政綱之中，這樣來建立穩定的根據地，繼續作戰。中共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很好。早期有幾個戰役是配合作戰的模範。日軍在北方，只有在輝煌的忻口之役中，才遭到第一次頓挫。在忻口，政府守住一條長長的陣綫，中共軍則抄過日軍的交通綫，在日軍的後方把一整個師團打得七零八落。

戰爭在北方拖下去，日軍鎖斷了交通綫和供應綫，直至陣地戰成爲必遭失敗而且不可能進行的事。至一九三八年初，紅軍廢棄了軍隊的一切標準組織，把各師編成一個變化多端的突擊隊的綫。依靠人民的支持。蔣介石的政府明白了中共力量的來源，感激游擊抗戰消耗敵人的實力，承認了這新的制度，並授權在黃河以北敵人後方的深處創立一個自治的游擊根據地。第一個游擊政府建立在距北平數天路程的冀西阜平縣，其時在一九三八年一月；該政府的官員包括共產黨員，國民黨員和無黨派人士，曾得中央政府的批准和祝福。

日本人的算計在華北給游擊抗戰所推翻，在長江下游給推翻得甚至更澈底。中共在北方生根之前一個長時間內，日本參謀部和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使上海三角洲瀾漫了火燄和鮮血的戰役上。這是一個蔣介石的戰役。蔣氏以游移不決的態度注視着日本進入華北的初步行動。他在決定打仗和覺察中國的弱點二者之間徘徊躊躇了一個多月。當他決心抵抗的時候，他打的辦法破壞了日本的圓滑的政治軍事的野心結構。日本希望北方打，南方談判。蔣氏却寧願在長江下游他的直轄地區內投下戰爭的骰子，這樣來以全民戰爭猛擊敵人，那些直轄地區最接近他自己內部的基地，他的最好的部隊已在基地中厲兵秣馬。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他把他的德國人訓練的陸軍之中最精銳的部隊投入戰鬥，抗擊上海的日本陸戰隊駐軍。在幾天之內，中國的肉和人把日軍壓入黃浦江邊上。

狹長的一小塊地區內。日本這就明白了他們所面對的不僅是一個孤立的華北事件，而是一個對付中華民族的戰爭，要打贏這次戰爭，必須把日本的資源完全動員。日本把海軍開出港口，空軍開出台灣待命，接着就以絕對優勢的鋼鐵，轟入密集的中國軍隊中。上海這次大殺戮死人多少，直到今天還沒有確切的估計；在軍人的鮮血和勇氣吸收日本的排砲之際，中國人傷亡達數十萬。

當時也好，現在也好，蔣氏死守上海的決定，是整個戰爭中最令人聚訟紛紜的一段插曲。把中國人的肉來迎擊日本的鋼鐵，並無成功的希望；撤退也許可以解放中國陸軍中的若干精良部隊，以便後來在內地作戰，在內地，它們可以在比較差不多對等的條件下迎擊日軍。實際的考慮如此，但蔣氏拒絕遵從此種考慮。他認為站在潮濕的壕溝之中的兵士不斷地走入屠場，是不折不撓的抗戰意志的具體化。

上海之戰在軍事上無益可言；在政治意義上，這是戰爭中的最大示威之一。此戰使西洋的最悲觀的中國通爲之吃驚，而且在歷史的紀錄中，毫無問題地証明了中國人民面對無望的劣勢時，能够表顯多麼大的堅苦和英勇精神。上海的示威對國內甚至更有價值。戰爭的故事從人們嘴上傳到內地，燃着了愛國熱的火炬。此戰給予全國以動員的時間。日軍猛攻上海攻了兩個月。之後，在南邊用聰敏的包抄行動，拔掉了華軍陣線的寨子，掃蕩了那陣直線，在極度的混亂之中直達南京。

蔣介石的首都南京陷落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其後的許多星期內，日軍進行了歷史奇觀的奸淫、縱慾和恣意大屠殺。這個災難雖大，却並未打斷中國人的抵抗。中國的殘破部隊是這樣的四散奔走，七零八落，有些部隊甚至把部隊的駐地在報紙上登廣告，以便潰兵找回原部。當時如果日軍立即向內地進發，那麼他們也許不會遇到除山嶺以外更堅強的阻礙。可是他們竟等待了一下。他們覺得中國首都之攻陷已經剝掉了中國抗戰的心臟，覺得蔣氏會願意講和。

一九三七年至三八年間的冬天，中國發生了奇跡。政府所在地搬到了上游的漢口市，離海八百里。而中國空前未有的最完全的團結精神，在漢口存在了好幾個月，其時曾在武漢就過的人，從沒有能够精確地說明這武漢精神是怎樣一回事。全中國都動了——人們從沿海漂流到內地，在這臨時首都聚成混亂的漂流。南方和西南的軍閥部隊開來參加戰爭。中共把他們的游擊隊加速開入支撐日軍陣線的錯綜複雜的交通線之內。在漢口，政府和中共人員在同一會議內開會，制定進行戰爭的共同計劃。政府授權在長江下游敵後創立第二支中共軍——新四軍；共產黨人參加着軍事委員會的會議。

中國作家，工程師和新聞記者的精華輻輳在漢口，撻台那磨損了的抗戰之繩。至一九三八年春，日軍重新進攻，以漢口為最後目標時，漢口已經凝成了新的軍隊和新的精神。一九三八年四月，日軍在台兒莊之戰中遭受了正面作戰的失敗，這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次。這個挫折只是暫時的。日軍分兩路從北方和東方迫近漢口，同年的秋天奪得了漢口。差不多同時，登陸的日軍取下了南方大港廣州。於是日軍竟倚在他們的槍砲上，又休息了一下。日本的戰畧在紙上是很完善的。中國在地理上越來越簡單了。華西是崎嶇多山的地方。華東是沖積平原，稻田一望數千里，絕少山嶺的阻隔。華西和華東都由三條大河灌溉，這三條河從山裏流到平原，滙入太平洋。日軍如今控制了整個海岸以及全部工業中心。它也控制了三條大河的河口。在北方，它佔有北平天津一帶以及黃河的出口處。在華中，它自上海經南京至漢口，駐紮在長江兩岸。在華南，它佔有廣州，獨霸西江。日本控制了這些城市，鐵路和河流，就覺得他們可以等候，等到一切經濟運輸機器的癱瘓使中國的抗戰停止。他們就等候了。他們又等下去，等了七年，直等到日軍在殘破的本島投降盟軍為止。

日本在中國莽撞。他們爲甚麼要莽撞，重慶政府比較精明的政治家吳鐵城氏後來作了極好的解釋，他說：「日本人自以爲知道中國過份地清楚。」日本在中國的政治和軍事情報工作確乎是世界上最好的，可是他們集中在

分裂和罅隙上，集中在人物和私仇上，集中在槍砲和工廠上。他們對於每個省份，每個將軍，每支部隊的紀錄，包括着在中國這樣多的惡行和劣跡，以致堆積起來的結論是盲目的。中國是一個國家這一事實，他們是難於明白的。他們看到了中國進行了十三年的革命，但只看到革命的渣滓，革命的流產，革命的內部緊張；他們並沒有測量革命的成果。和他們作戰的，遠不止一支聯軍；他們是對整個民族作戰。他們會注意到中國沿海工業的襪襟成長，並且在地圖上註明了新的鐵路。可是中國的實力並不在城市裡，而在人民的心裏。中國是原始的，其原始的程度，使它工業、鐵路和機器雖然破壞，却不能使它遭受像後來歐洲那樣的大災難。中國的根是在泥土裡。只要下雨出太陽，稻穀就會生長，日本軍的任何封鎖，都無法隔離農民和土地。中國剛從混亂之中探出頭來，但是它依然十分接近混亂，所以它的日常生活中加上一點戰爭的破壞，是無所謂的。舉個例，假如中國必須把政府、工業、人民和軍隊搬到內地，它就做得到。日本打算粉碎的那機器之中，有一種巨大的彈性，你打它，它搗了，可是並沒有破。

一九三八年漫長的數月中，中國軍隊被迫緩緩退向內地之時，發現自己的路上擁塞着移動着的老百姓。冬天的這個喘息使千百萬人有時間來作自己的決定，而中國就在移動，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巨大的集體移民之一。令人詫異的，是中國任何作家或小說家都沒有把這個場面充份地記錄下來。大批大批的衣衫襤褸的人民，通過公路和山脈向西移動；這景象是遊牧時代以後絕無僅有的，但是遷徙的有多少人，他們從那兒出發，重新定居在那裏，都並無記載。中國政府和報章雜誌只主要地記錄了對戰爭重要的事件如軍隊、官員、大學和工廠的遷移。

政府在戰爭爆發後，差不多立即就開始疏散工廠。這件事情整個放在經濟部長翁文灝博士的手裡。翁氏是中國最出色和可愛的人物之一，體格瑣小，是一個書獃子。他的額上有一個很深的裂痕，這使他特別吸引人。他臉上永遠掛着微笑。在其後的整個戰爭時期，他是內閣高級官員中從沒有被任何人指責為貪污的寥寥可數的幾個人

之一。他的出名的潔白無瑕使他上升到普通政治之上。中國戰時的工業發展是有偏向的，工業集中在沿海，集中在極少的幾個大城市裡。中國的私人資本絕大部份投在紡織工業和消費品上。政府投資居多的重工業，只是拖在整個經濟後面的小尾巴。鋼的產量從沒有超過每年十萬噸。北方戰爭的迅速以及上海戰爭的激烈，其勢差不多可以在頃刻之間耗盡所有的工業。政府現有的材料，指出撤退時遷移的工廠共約四百家，其設備約二十餘萬噸。和蘇聯後來的成就比較起來，這數字似乎算不得什麼。其重要性只有分析一下才能顯露。翁氏把中國差不多全部的紡織工廠和消費品工廠放棄給敵人，集中力量把重工業和兵工廠移入內地。中國只救出不到百分之十的紡織機，救出了機器廠和重工業約百分之四十，但十一所破舊的兵工廠裡的東西，救出的達百分之八十。這就是說寧使中國在此後數年間衣不蔽體，務必儘可能滿足軍隊最低限度的需要。

工業遷移的初期階段毫無光榮可言。上海的疏散開始得很晚；工業家有點不大願意遷移自己的工廠；政府的決策也很遲緩。第一家走的是上海機器廠，那是國內最好的機器廠之一。該廠直至戰事開始二星期後，才從蘇州河出發遷移。機器裝在小船上，蓋上樹葉和樹枝以作掩護，船慢慢地撐到長江湖江而上，有空襲危險時，就躲在江邊的蘆葦裡。其他工廠跟着遷移，是日軍於十二月初把上海和長江的交通切斷以後的事。由於遷延過久，上海的撤退只搬出機器一萬四千噸，之後就給敵軍的推進阻絕了。

雖然如此，上海這一下却證明了事情是可以做的，至一九三八年春，華北和華中數十家搬動的工廠就拆卸機器，包裝好之後轉運入內地。在民族的有機體繼續發生作用之時，做成了一樁很大的工程。中國最大的紡織廠之一的裕豐紗廠，從黃河跋涉長途而搬到四川，走了一千哩，而四川省又是一條鐵路都沒有的。該廠在二月間包裝好了自己的八千噸機器，整批由鐵路運至漢口。五月間，它告別了鐵路，用輪船溯江而上，走到三峽的口中。八月間，它重新包裝了一下，載上三百八十艘當地的駁船，上溯峯迴路轉的三峽而入四川。一百二十艘駁船在山

峽裏沉掉了，但除了二十一艘之外，統統給船夫撈了起來，繼續前行。這一隊人馬於一九三九年四月到達重慶，山地之間特別闢出一片地方準備機器的來到，到春天，該公司已經忙於訓練蓋蓋的四川農婦來照料發鏽的鋤鏈了。

漢口至華西一路上都有各色各樣的機器。運到內地去的東西都得用手來搬。成百成千的苦力拖着銅塊，最重者達廿噸。武漢抗戰的最後一星期內，疏散工作到了偉大的地步。漢口電力廠直到最後幾天還在發電，因為電是生活的必需品，可是要把它的十八噸重的大輪機留在漢口，是不可能的，因為退到四川，這個輪機就沒有辦法配。該廠於十一月初開始拆卸，但這個輪機直至十一月廿三日才挨上輪船，離日軍入城只有兩天。搬運這種大機件，發生了小輪船沒有辦法應付的許多問題；開得進三峽的輪船上，所有的起重機沒有一架能够舉起十六噸以上的東西。中國人解決了這問題，把重機件放在浮橋上，使浮橋浮起，把浮橋用汽船拖，拖着穿過急流。

在四川重新安頓下來的新工業是十分簡陋的。鋼鐵廠的樑柱用竹桿搭成，煉鐵大爐用的煤，是一筐一筐挑去供應的。煉銅廠用着農民那裡收來的銅元，以最新式的電解法把銅元變成純銅，然後運入深在山洞之間的兵工廠。

中國大學的遷移，正和中國工廠的遷移同時進行。和工業一樣，中國的高等教育機關生長在卅年的混亂之中，而且也集中在沿海和大城市裏，而且也是日本最可怕的新中國的因素之一。中國現代歷史上每一個大轉捩點，都是由學生起事和知識份子的不滿作為標幟的。學生孕育了反對滿清的起義。學生的暴動和示威引起了一九一九年的全國怒吼，其時甚至貪污的軍閥都被迫拒絕了凡爾賽條約。一九二〇年後日益高漲的革命浪潮，其最重要的關鍵往往是學生暴動。最後，除了共產黨以外，學生及其教授們是最熱心和喊得最響的抗日示威份子。

日本人特別嫌惡華北的北京、清華、燕京和南開四大學。他們特別把用美國錢建造起來的清華挑出來加以特

殊待遇。他們粉碎了該校的實驗室，把儀器書籍搬到日本，把學生的健身房當作馬廐。南開大學是差不多全部給破壞了。在中國知識份子文藝復興的北京大學的校舍裡，日本特務警察設立了偵訊總部，審問政治和軍事案件。

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夏季進攻之際，學生正在過暑假，不在學校裡。教育部就發出了一個號召，要他們到兩個集中地去報到。其一是北方的西安，其二是長江以南的長沙。兩個大學的學生在西安得令移到陝南去。他們乘車走盡了鐵路，就開始一百八十哩的長途跋涉，越過崎嶇的秦嶺山脈。學校的系主任們是這次行軍的參謀長，他們把男女一千五百人分成三組，五百人為一組。每組前站有警衛隊、糧食隊和交通隊，後面有騾馬馱運米和麵餅，再跟着幾輛哮喘的卡車，在峻嶒的公路上爬行。糧食隊到鄉村裏去購買能找到的一切新鮮菜蔬，以便在其他的學生到達之時，有足够的菜來開飯。他們所走的路，途經中國若干最原始的地區。地方當局把學生安置在農家或馬廐中。工科學生裝了收音機收聽晚上的廣播，到明天早上他們把新聞貼在壁上，使後到的學生可以看看。對於鄉村居民，看到當天新聞這是生平的第一遭。

日本向內地推進時，各大學相率遷移。有些學校是在日軍入駐以前幾天才撤退的。日軍自南方進入廣州時，中山大學的學生還在北郊撐着船，把圖書館裏的書運走。國立中央大學農科覺得幾頭育種牛價值太大，棄之可惜，於是這些牛在一九三八年整個夏季，在距離日軍前鋒數星期路程之處，一路吃草一路走向內地，直至一九三九年夏天，才最後到達平靜的內地，安居下來，把快樂帶給瘦削的四川本地產的母牛。中國一百零八所高等教育機關中，有九十四所或則被迫西遷，或則完全關門。雖然，整個教育制度却在一九三九年秋重新建立起來了，流亡的大學裏入學的學生有四萬人，而戰前最後一學期大學生註冊者不過三萬二千人。

教育機關轉入內地，主要地聚集在三個中心地方。第一個在重慶附近，另一個在成都，第三個在雲南的首府昆明。這三個中心的機構和質地各有不同。重慶近郊的各大學在政府的嚴格統制之下，永遠感染着首都流行的空

氣。成都各大學則避難在教會辦的華西協合大學的美麗的校舍裏，它們被安頓在比較寬敞的地方，在加拿大和美國教會的保護之下，保存着自己的學府尊嚴，差不多沒有被侵犯過；他們的學術地位在戰時一直是最高的。華北最重要的各大學，則跋涉至西南，戰時在昆明合成西南聯合大學。北方各大學戰前一直以光輝的知識生活和進步而輝煌的政治警覺著名的。到了昆明，他們就在塵灰裏站起來。學生們住這四人，六人和八人一間的房子，有些人住在老鼠喧囂而蛛網密佈的廢而不用戲院裏。他們吃着飯和蔬菜，總是不夠吃。政府一向懷疑北方諸大學進步的政治見解，如今像老鷹一樣以視着這些流亡機關，把偵探網拉得一年比一年緊。開頭的時候沒有關係——各大學逃避了日本人，就十分高興。學生們的生活苦，他們也明白全中國都在受苦。歲月拖下去，教師挨餓了，通貨膨脹使收入成爲諷刺品，於是西南聯大開始在政治上重新振奮，到戰爭結束時，該校變成了中國南方政治不滿的主要處所。

工廠和大學的遷移是一種奇觀。此外更有多少農民和城市居民給日本的侵略弄得漂流無依，誰都不知道——各人估計不同，約自三百萬人至二千五百萬人。農民在日軍之前逃走。黃河會決堤以阻止日軍，他們是逃避黃河泛濫的。有些農民在莫明其妙的恐怖下逃出來。跟隨工廠遷移的工人也許不超過一萬人，他們之來，是因爲要沒有他們的活，機器就沒有用處了。飯店老板、歌女、冒險家、帶着幾箱香烟或幾疋布的小商人，總共大約有數十萬人。這些小人物跟着有組織的大運動旅行，有的步行，有的坐舢板、駁船、火車和人力車。數萬人擠在上溯三峽的駁船裏，數十萬人在山道上列隊而行，好像成羣的螞蟻，不斷地向西翻山越嶺。死於疾病，日曬夜露以及饑饉道旁的人究竟有多少，沒有估計；他們的白骨，至今依然曝露在這條路上。

至一九三九年夏，中國的戰爭走入新的規範。大遷徙是過去了。救出來的少數工廠的輪子，在新的廠房裡轉

動了。各大學生在規畫秋季的課程表。破碎的軍隊，駐定在山地裏。前線現在是一條沿着華西山脚和各大河河谷山腰的線。在北方，共產黨人開始深深地掘發農民的曠曠的自覺，愈掘愈深。他們和重慶之間的聯系被隔斷了。他們就形成了新的行政工具，並且一年年變得更聰明、更有力。在華中和華南，和中央政府關係漸鬆的勢力及軍閥開始坐大自肥，只有在重慶，由於炸彈從春落到秋，過去的精神還保存了幾年。

其時以及其後一些時候，中國並沒有了解自己已經走入絕路。其時日軍得發動一次新的戰役，總是大叫着這一回要直搗重慶，中國的軍隊則拚命招架。這些戰役規模很小，但很厲害，這是日本統帥部特別安排的新式的戰爭。這種新式戰爭的目的，在於經常使前綫處在不平衡狀態中。日本新的師團和幹部到火綫上走一下子，就調到後備地區準備作將來的戰鬥。日軍在瀋海自己的後方地區建立了新的工業，把中國經濟剩餘下來的部份聯結在日本整個經濟制度中。

外國的戰地記者在中國所寫的東西幾乎全屬荒唐，是由於這些東西以記者招待會和公報為基礎。我們用外面世界懂得的話，來描寫一個西洋人不會了解的戰爭。中國寫戰爭公報的人，都是些從沒有開過火藥味，從沒有聽見過一聲憤怒的槍聲的糊塗人所寫的，他們儘是說着幾千人的戰鬥、血戰、拚命的進攻和反攻。中國人發表這樣的公報發表了好幾年，開始的時候他們自己相信着日軍依然打算衝進山國，直撲內地，後來，連這些文字匠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話了；但他們依然牽強附會，把早期漂亮的修辭來形容前綫拖泥帶水的角逐。在中國戰場任何地方，都沒有真正的前綫、火綫和突破點等等，但人們寫起來，就有供應綫、戰鬥計劃和大包圍了。中國報紙本身並不相信所傳的日軍數千數萬進退維谷或陷入重圍，不過就這麼印了出來罷了。於是外國報人變得諷刺了。有時這些誇張之詞馬馬虎虎看過去都很難。美國陸軍情報處有一次發現日軍只有三萬人參加一次戰役，中國軍事發言人說有八萬人參加戰鬥，但公報正式發表敵軍此役死傷即達十二萬人。

日軍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發動的各次戰鬥，與其說是打仗，不如說是搶糧。他們沒有更大的戰界目標，無非是使鄉村陷入恐怖，收割田野和市鎮，使前綫的中國部隊永遠不堪一擊，並且把新兵送上火綫訓練一番。戰役中多半是所謂『飯碗』戰役，因為多半發生在華中，那是中國的『飯碗』——產米很多。作戰時日軍集結了幾個師團，深入中國軍隊的前綫，把鄉村蹂躪了一通，然後回去。中國部隊的應付辦法是包圍，日軍突入之際向後撤退，然後在日軍側翼和後方摘掉日軍的供應站。中國人至多只能做到摘掉日軍的突出地帶，迫他們回到根據地去，要做得更多，就需要翁文灝搬了家的工廠裏所無法供給的相當數量的五金和配備。結果，所謂中國戰爭，就是長期消耗的僵持。

這個中國戰爭是在一條有彈性的無人地帶上作戰的，該地帶縱深約五十至一百哩，在中國中部一帶。在這荒涼的地帶內，中國人破壞了足資敵人在週期性的攻擊中利用的一切公路、橋樑、鐵路或渡口，中國軍隊所作的唯一防禦，就是使這一帶鄉下弄得不能煎彈。日軍和華軍在這一地帶來往追逐了六年。農民餓死了，軍隊流了血，鄉村被燒成一片白地，小城市換主人多至六七次，然而六年之久，前綫一直穩定着，很少值得注意的變化。

這一時期的典型戰役之一，於一九三九年夏在晉東南進行。山西是一個重要的省份。該省產煤極多，而且是長城以南鐵礦最富之處。它倚在黃河的胳膊上，它的峻峭的山脈，掌握着華北平原。至一九三九年初，華軍在該省的陣地被迫入中條山的山坡間，中條山是在該省南部邊境，就在黃河北岸。中共八路軍的游擊區是在日本據點的後面，而且包圍着那些據點；正面是中央軍。

我（註）在一九三九年秋去看了這戰役。這是我訪問中國前線軍隊的第一次。在其後的六年間，我一次又一次地去觀察相同的景象，那是一年比一年黯淡，一年比一年乏味。

我和一支中國的生力軍一起出發，自隴海鐵路盡頭處向北行軍。部隊串成長長的行列走過許多山，艱苦地牽

着，沒有紀律或一定的步伐。他們的草鞋足迹所過，使灰塵揚到膝蓋那樣高，山中許多哩外的人，可以由天空中華旋的塵灰，斷定是一支軍隊在行軍。各部隊的指揮官騎在瘦骨伶仃的馬上領頭走。他的後面是步行的兵士，兵後面是輜重隊——做苦力的兵用扁担扛着彈藥箱；有的人揹着一袋袋的米；連部的廚房，其中包括一個兩個人抬的長滿了黑鍋灰的大鏟子，則跟在最後面。這支部隊有幾尊尙堪一用的小砲，馱在騾背上。當時，整個中國軍隊在二千哩長的前線上，據說共有砲一千四百門左右。騾背上裝一門迫擊砲顯得重一點，但這門砲要比一整隊步槍還要有力，還要重要。戰爭的後期用牲口來運輜重變成了稀罕的事，但那是一九三九年，同我一起的部隊是用牲口的——這個牲口輜重隊甚至比踉蹌步行的兵士們還要爬得慢。騾車上米袋和軍用品堆得很高。米袋之上，有一兩個兵伸直四肢躺在太陽里打瞌睡；趕車的人很漂亮地揮舞着長鞭子，揮過牲口的頭劈拍作聲；車輪因為沒有油，大聲吱吱地叫；不管這騾車怎樣在起伏不平的路上蹦跳，躺在米袋上的兵却總是睡着的。他們完全不慌不忙，因為已經進行了很長久的戰爭，會繼續經年累月地拖下去的。天一下雨，行軍就悽慘了，兵士們一次又一次地全身濕透，他們的腳陷在爛泥里。

路上來往都有人。向前走的是不斷地行軍的人們的艱難的腳步，對面來的，則是戰場上丟棄下來無人照顧的兵士。病兵和傷兵通常自己步行到後方，用自己的腳。在前線，頭上重傷和肚子上受傷就等於死，因為醫藥隊從不能把這些人及時搬到後方去醫治。可以走路，但顯然已在軍事上沒有用處的人們，則發給一張通行証自己回去。這些人是很可憐的，在山路上一撓一拐，靠在木杖上，扶着山石或樹木掙扎而行。在每個山坡脚下，你總可以遇見這種人，他們爬完了一座山之後在坐着休息，滯鈍的眼睛注視着前頭的又一個坡，又一重山。你極難得看到

（註）此後的『我』，都是指白修德。

生病的或受傷的人用担架送到後方。傷病兵的傷口和髒東西發出惡臭，蒼蠅雲集在他們周圍，甚至在他們的膿眼上或傷口上築巢不去。

我們坐齷齪的平底船過黃河，然後經由越來越少的山道到前線去。他們緊緊追蹤向沁水山谷間撤退的日軍。那是秋天，正當收割玉蜀黍的季節，高粱也熟了。在你明白每一個村落里的憂愁和迷信有多大以前，中國的山景從外面看起來是很美麗的。山脊上望下去，你可以看到打穀場上的浮皮升騰如雲，農民正在打穀子。柿子又熟又紅，在稀薄的枝葉間閃閃有光，柿葉早就焦黃了。人們正在犁地準備冬天下麥種，地土的氣息是很好聞的。有的田裡新穀子的薄薄的葉片使地土發綠，另一些田里，則棕紅色的高粱的耳朵，沉重地掛在長長的高粱桿上，我們騎馬經過時，擦過我們的頭。

日本人剛過去，他們在鄉下留下了到處焦黑的破壞的痕跡，有時馳馬走過許多燒光了的鄉村，走了一個整天，只見一堆堆的廢墟。有許多路面壞得這樣厲害，以致中國的山馬也沒有辦法走過積貫在路上的溝。你得下馬來自己找路，牽着馬走，要不然的話，就得騎馬登上荒蕪的山脊，走好幾個鐘頭寬路而行。荒山野地之間，有時忽然站着一所孤立的茅屋，屋頂已經倒下了，木頭燒焦了，在無人地帶站立着，成爲荒涼的象徵。

鄉民講的故事，和我後來在日軍每次出擊之後聽到的故事是大同小異的。農民在日軍推進之前逃走了。他們要不自動地逃，政府也會下令強迫他們離開。他們帶走了一切東西，自傢具起至種籽止。他們把豬和牛牽到山裏，把衣服細軟埋在地裏，退到山上築草棚住，等候兩軍決勝。日軍開進去的，是無用的荒地。他們的行進曾受大水阻礙，到他們到達重要目標時，鬚髯已長了兩寸，泥土滿身，又疲倦，又憤怒。

我經過的有些區域里，給日軍捉到的每一個女人都曾被強姦，毫無例外。關於強姦的故事，其慘痛處是這樣相同，以致除非描述特別惡毒的辦法之外，這些故事變得單調了。有人會看見有些地方日本人和牝豬交媾。在鄉

民來不及好好隱蔽的地方，日軍騎在馬上踐踏高粱地，迫得女人們露出頭來。日本軍官把小老婆從大城市裏帶到前方，那原來都是中國人、俄國人、高麗人或日本人自己的老婆。兵士就得在鄉下找人享用了。日軍的車子壞在泥地裏的時候，就叫農民來，把衣服脫得精光，加以鞭撻，要他們像野獸一樣拖車子。日軍常把馬和騾子在塵埃裏打死。在公路和山上，你可以看到他們的牲口屍體在腐爛，騾馬的屍骨曝露在太陽里發白。被迫代替騾馬的中國農民，也受着同樣無情的鞭叱，直至倒下或發瘋爲止。

騎馬及步行上前綫，需時兩星期。從一個團部出發，我從山腳邊被領到一個蓋着高高的麥桿的山頭上。我和一個兵一起靜靜地快步而行，蟄伏在麥桿後面，然後爬到較舒服的地方。那個兵小心地分開麥桿，向山下指點。遠處有些白牆的房屋以及城牆的模糊的輪廓。他漫然指點着，小聲說：『這些是日軍』。我竭力注視。於是我注意到離我們不遠的田野里有甚麼東西在動。我問：『這是甚麼？』那軍士甚至並沒有轉過眼睛來順着我的指頭看。『這些是農民，』他說：『他們必須收割，你知道——現在是收穫季節。』日本人也懂得的；他們自己也是農民。除了突擊之時野蠻以外，他們對於在田野間工作的人也是中立的。

那一星期內，我在山西前綫旅行了三四十哩。後幾年我在其他許多省份里旅行了許多路。情形總是倒買口的。在各地地方，除了工事裡住着一羣人看守着發鏽的機關鎗或洗擦舊步槍以外，我更看不到其他東西。華軍的前哨是二十或三十人一堆，用走路的傳令兵來和營部連絡，營和團及師之間則用電話傳達命令。日軍通常是兩三百人駐在鄉村裏，有野戰輕砲保護。在數千里的山上，你都可以望下去望到日本人；在任何一點，華軍總要比日軍多五倍。可是日軍總有重機關鎗和野砲的，華軍如接近日軍，在露天走一兩哩，就會給敵方的火力擊倒而自己這方面沒有辦法加以壓伏。

一九三九年時中國前綫一切平靜。此後漫長的五年內，由於同樣的原因，中國前綫也還是一切平靜。

第五章 外戰中的內戰

要把戰爭從平靜的晉南前綫帶到寬敞的太平洋上，需要兩年——這是混亂的兩年，在這兩年中，全世界看到了中國的深山裡面接連地發生相互抵銷力量的行動，而不知道這些行動的內部意義或歷史上的重要性。中國的前綫到一九三九年是安全了。政府重新安定下來了。戰爭變成了生活的常軌。西邊後最初幾個月間，政府撤開了一些辦例行公事的機關，在這些機關之上建立了一個複雜的行政機構。至於中國進行戰爭的方法，神祕之處是很少的。

戰爭靠在農民肩上。貢獻糧食和人力這兩樣必需品的，是農民。政府把農民補出來的食糧养活軍隊、國民黨、兵工廠的工人、以及官僚。政府有了農民供給的人力，把徵發來的人送上前綫，用來開闢公路及搬運必需物品。最重要的一切事情，不論軍事的或政治的，都推給農民去幹，他們穿着藍色的灰色的衫子，盡心竭力給抗戰供出原始的精力。軍隊的移動，美國空中堡壘機場的建築，運輸的組織，各問題都歸結到可以找到多少農民來動手，可以找到多少貧民所生產的米來解救危局這兩點上。中國的一切籌算，都是以農民的生產力來彌補一切的。甚至軍火生產中也是如此，特別是中國製作爆炸物的氮化合物資源，其關鍵所在也在農民，因為中國人是從農民身體的排洩物中取得氮化合物的，他們很細心地搜集前排洩物，用來調合作藥。

戰爭開始時，向農民徵稅是收錢的，政府就用這錢來購買他的麥子。在通貨膨脹的重壓之下，貨幣制度於一九四一年起開始每况愈下，於是政府聽從一個美國經濟學家的勸告，改而徵收實物。為徵收此種新稅，政府先把自己的需要直接算成米糧數目，然後指定每省應徵數，再由各省指派縣，各縣指派到村，每個村裡的頭目總設法使最窮的農民担负最大的一份。新的徵稅法唯一的好處，就是使作戰力和政治的本質在甚麼地方，表現得非常精

楚。農民把穀物繳給當地的官員，當地官員收到之後，揩掉一點，把所剩的繳給政府，於是政府把穀子漏着洞的，一袋袋穀子裝給所屬各機關。穀子是遠比鈔票值錢的東西。

這種新稅是戰爭迫使國民黨改變政策的象徵。國民黨自成人之日起，就依靠着沿海大資本家和鄉村貴族的聯合支持。日本的侵略掃蕩了沿海大資本家、商人和工業家，於是政府差不多完全倚靠貴族的政治上的支持。這一轉變在表面上並不明顯。真的，一九四〇年時對高級顧問官所作的一個調查，顯示其中百分之五十還是從下江兩個商業省份來的，這兩省一直是國民黨的主要支柱——百分之三十五是江蘇人，百分之十五是蔣委員長家鄉的浙江人。只有研究了政府沒有辦法做的事，研究了從政府一切的怠忽的罪惡中取得利益的是那些人，這一轉變才顯得確鑿無疑。舉個例，徵實的時候，小農出了雙倍的穀子，富人却逃避了租稅。政府對這事眼睛半開半閉，把徵實交給各地方官員去辦，只要自己得到穀子，什麼話都不說。在公報和演講裡，政府官員對於使通貨膨脹走到頂點的囤積家暴跳如雷，人們也都知道大囤積家是大地主，然而政府從沒有採取行動。政府倚靠着地主，地主倚靠着農民。要把農民的力量從年深月久的苦痛中解放出來，要把這些力量聚而抗日，是需要對於橫隔在重慶和糧田之間的地主，採取最嚴厲的行動的。地主中一部份人是從前的軍閥，現在依然擁有軍事力量，大部份人則是各地國民黨地方組織的基幹。政府覺得這機構太脆弱，如有任何基本的改革，它就活不了。

內政上的實力抵銷的辦法，不過是許多辦法中間的一個而已。軍事上也有實力抵銷的辦法。日本佔領中國的軍隊約十五或二十個師團，將近一百萬人。他們的軍隊駐紮在沿海一帶，鐵路綫一帶，以及大江兩岸。他們的各防區都以現代化的交通和其他的防區聯系起來。他們佔有了戰略中心地帶。在大陸的半圓形上，在他們陣地的邊緣上，是中國軍隊，約四百萬人，由於原始的道路和運輸工具的缺乏，被釘死在那裏。要把中國一個師從華北運

到華中，也許需要一個月，而日本一個師團從北平運到漢口只消十天。這就是說，在機動的戰爭中，中國人在動手之前就已經輸了，他們唯一的希望是在危險地點安置足夠的兵力，以應付合乎常情的威脅。

那就必須守住四個地區：中國中心的長江三峽一帶，北方瀟關附近的黃河彎曲處，西南雲南省的兩翼，以及東方的長沙及薩米區。這四個危險區域，各有可靠的將領率領的大批華軍守護。其中三個由蔣個人的『中央』軍的可靠部隊掌管；只有長沙一帶的守將薛岳，一個性情暴躁的廣東人，戰前曾和蔣介石有點小嫌隙，是以特別高明的軍事能力而獲得指揮權的。各省和地方雜牌軍，則被分散在這四個重要地區之間的地方。重要的長江下游前線守將是顧祝同，他是一個熱狂的反共將軍，把注意力放在中共的發展方面較多，放在日本發展方面較少。次要的戰區司令，多半由蔣氏的親信以外的地方軍閥担任。有一個時候，八九個戰區司令中有半數的人曾在過去十五年内公開反過蔣，或親自對他作戰，或贊助過作戰。

各部隊在一九三九年進入新陣地。一九四〇、四一兩年間，他們忙於築壕保守。重慶離開得太遠，只有名義上的管制權，因此各軍就盤踞下來統治自己的區域，自己委任或黜退縣長及法官，自己收稅及制定法律。有的部隊覺得十分安全，所以叫兵丁參加私人的耕作，以補充口糧。重慶來的訓令或不理，或服從，視情形而定。中國軍隊並無真正中央補給制度，只是把錢交給各師師長，由他自己設法。中央政府的十分緊張的兵工廠，每月至多只能生產槍彈一千五百萬發，砲彈及迫擊砲彈數千發，平均每人每月只有槍彈四發。精明的指揮官不敢以這樣少的儲備物來計劃攻勢，於是攻擊精神漸漸腐蝕掉，彈藥給囤積起來，直至老朽不堪用。一九四三年有人看到一隊牛車把槍彈運到前方去，彈盒上印着『一九三一年製』字樣。重慶太遠了，彈藥從兵工廠繁忙的公路到北方戰線上，要好幾個月。指揮官遇危急時，不能希望請求重慶急送軍需而有辦法——他得靠自己軍火庫裏存着的東西作戰。

另一件抵銷力量之事，存在於這個過渡期間的商業中。當西南的滇越鐵路被割斷的時候，全世界關切地注視着中國的封鎖。滇緬公路於是重要起來，成爲封鎖中唯一的出口的表誌。實際上，中國所有的官員也都知道，當時滇緬公路和滇越鐵路，在中國供應問題中只是很微小的因素。一九四一年年底以前，日本的封鎖是一個篩箕，而歷史上最大的走私組織就在這篩箕上鑽尋空隙。據估計，光是買賣汽油的走私者，就僱用着五十萬人，他們把汽油從海邊的船上偷運入西南邊境的山道中，轉而賣給中國政府。唯利是圖的日軍是和中國的投機家合作的。私人投資者把和汽油一樣多的布疋、輪胎、藥品以及其他緊要物品運售給政府，這並不是單方面的買賣；中國的錫、錫和鎊也從同樣的道路，運出去給敵人充實兵工廠。中日兩方對走私的事情都知道，中國政府人員積極參加着走私。中國液體燃料委員會給予走私進來的汽油以充份的運費和回佣，由於敵人的行動而在路上損失的汽油，也不論多少償還全價。政府辦的中國航空公司通過廣州日軍的路線，用賄賂收買高度揮發性的汽油，來維持這條把中國聯結在一起的唯一的重要交通線。中國共產黨人，則在敵軍所佔的城中，購買槍枝、手槍和汽油。

中國戰場是很奇怪的。重慶寄出去的中國郵件可以經常寄到日軍所佔的各大城市，那邊也能寄信回來。在越南邊境，中國軍官從河對面日本管制區裏的經紀人那兒買米養兵。重慶政府官員經常匯錢給上海和北平的家屬，並收到關於他們的產業被敵人如何估用的報告。

在重慶，相持的局面，是由巨大的嘲諷和不快樂反映出來的。戰爭變成既不是戰爭，也不是和平，而是仿做演習着戰爭及和平的曠曠境界，實際上這境界中既沒有戰爭，也沒有和平。一切舊的緊張又開始了，其中最大的，是政府和中共之間的緊張。雙方都並沒有就國共之間的聯盟，得出一個澈底的結論。這聯盟依靠着很脆弱的一個特定之點，即共同禦日，日軍攻擊一停，這聯盟就開始鬆散了。要創造聯盟的穩定有力的基礎，首先就必須改

造中國的社會，而改造社會就是革命——兩黨却就在這一點上無法有一致的意見。

分歧的基本原因，是共產黨的擴大。中共的影響和武裝，逐月在敵人的後方發展。中共總部仍在陝北延安，可是至一九三九年初，陝北本區雖仍然最出名，但已變成中共許多控制區中的一小塊了。他們力量最大的地方，早已伸展到黃河以東，濱海區域以及長江下游。早期的紅軍在抗戰最初幾年間已經死光，新的八路軍是華北本地人，其指揮官多是戰前從沒有聽過共產主義的青年中尉和上尉。延安和重慶一樣，高級會議中永遠是幾個老名手，但在中共作戰的戰場上，新的領導者不斷從草野裏崛起。中共在本質上依靠着周圍人民的援助。他們並無擁有數千萬和平農民的大後方；他們所控制的地方和日軍的交通綫犬牙交錯，並且密佈着日本駐軍和碉堡。如果中共必須對這些日軍施行壓力的話，他們就永不能休息。他們也就永遠不休息。爲了保衛自己，他們不煽動，就要死，要就拚命使民衆擁護，要就不得民衆擁護而滅亡。

他們在日軍後方的鼓動和擴張，使他們和政府部隊不斷發生磨擦。日軍挺進時，政府曾在華北和華中都留下一些部隊。中共在新的社會基礎上組織鄉村抗日時，就一再和政府軍隊及官員發生衝突。由中共看來，這是一個全民戰爭，不容許有中立的人。政府戰前所委任的老村長以及中年縣長，却無法適應猛烈的游擊戰爭。結果，能夠轉變的人留着和人民一起，太老和太脆弱而無法轉變的人，就給游擊隊員在抗戰的理由之下撤換掉。同樣地，中共區域裡孤立的政府軍發現自己已被吸入中共方式的游擊戰中，他們要是不願意合作，就發生磨擦，而雙方於是屬對方不守信用，彼此攻擊，一年年拖下去，日軍後方的政府機構融解了，被吸收了，被中共控制下的完全新的抗戰機構代替了。

雙方第一次武裝衝突發生在一九三八年夏季。這之後，偏僻地方的政府軍和中共軍，各和自己的統帥部隔絕着，彼此作戰越來越經常。在政府統制區，政府人員把中共的擴大看成是一種疾病。由於政府不肯或不能像中共

那樣一方面動員人民，一方面不致危及擁護自己的社會基礎，他們就覺得中共也應該停止組織人民。中共在政府統制區的幾個辦事處，受到了越來越嚴緊的監視。政府的熱狂分子在湖南平江襲擊中共戰區在該地的聯絡處，屠殺了該處的辦事員，其他城市裏同樣的辦事處被封閉了，蔣介石的中國內部的中共活動慢慢地轉入地下，直至只剩下重慶和西安兩個公開辦事處，這兩個辦事處也受着監視。一九三九年秋，山西爆發了一師人大規模的戰鬥；這次衝突至一九四〇年春經談判講和後停止了，但更大規模的激烈衝突，跟着就在長江下游新四軍活動地區爆發。

到一九四〇年仲夏，顯然地，必須有一點協議，否則中國的團結就會粉碎。大問題極多。第一是得嚴格劃定中共的陝北區域，該地區兩黨的邊境兵士總在時斷時續地打仗。其次是軍需問題。政府會答應以餉銀和軍火供給中共的八路軍四萬五千人，又在一九三八年春答應供應新四軍一萬五千人的軍需，可是餉銀也好，軍火也好，來得很遲緩，而且來時附帶着許多條件。政府的諾言在紙上很好看，但事實上，中共是在自己作戰，得到政府的幫助極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是抗日的政府和中共部隊必須清楚地劃定界限，以使衝突減至最少限度。

一九四〇年夏天的一個協議，解決了中共陝北區的劃界問題以及給養問題。可是，協議的關鍵所在，依然在於政府要求中共把八路軍部隊完全調到黃河以北，把新四軍部隊調到長江以北地區。

至一九四〇年底，發生了自此以後著名的新四軍事變——這是中國戰時政治中大轉捩點之一，是直至如今依然在喚起激烈憤恨的感情的標誌，是中國內戰的起因。無人能精確地知道政府軍在一九四一年正月初如何包圍並屠殺了新四軍總部的部隊。我們根據一切現有材料所能作的最不偏私的結論是：新四軍大部份部隊已於十二月底調到長江以北。他們在江南留置軍部，那包括該軍大部份的參謀人員，指揮部以及若干戰鬥部隊，總共約五千餘人。他們已奉命北調，政府規定了他們的行軍路線。中共方面說這條路線會把他們直接引入長江邊上日本駐軍的

掌握中。他們請求改變路線，而他們在重慶的代表周恩來將軍，爲此事見了蔣委員長。委員長批准了改變路線，並且請周氏吃聖誕夜飯，這兩人爲和平和友誼而乾了杯；一切都解決了。之後，延安中共總部突然急電其重慶辦事處。新四軍被騙入了政府軍的包圍圈中，該軍軍部部隊被屠殺了。周氏於是趕去見蔣委員長。他沒有能見到蔣，却得到一個保證，說是一切順利進行，政府正在下令給政府軍隊切勿阻擋新四軍的行軍。

誰說着誰？有人說蔣氏的親信瞞着他發動攻擊，待他知道後，他就說誰以掩蓋之，而且後來饒恕了這行動。國民黨說新四軍會攻擊政府軍，而政府軍把暴動者處以紀律。這種說法巧妙地掩蓋了一個事實，那事實是新四軍當時部隊比國民黨的少得多，而且其中大部份是非戰鬥員和司令部人員。

於是重慶瀰漫着公開分裂及全面內戰的謠言。混亂過去，得知整個新四軍軍部已被消滅，參謀長被殺，軍長被拘入集中營，死者數千人，被俘者數千人。事變的本身已經破壞了，得勝了的政府軍却又用日本人一樣的野蠻來對付被俘的中共同胞。幾年之後，有一個大學教授講起了俘虜營中的可怕的經過，他不是共產黨員，只是在旅行中和新四軍一路走而被俘的。他說中共部隊里男女都有，女人是作政治工作、看護、及參謀人員的。政府軍強姦了這些中共女俘虜，她們被傳染了梅毒，有的自殺了。俘虜們給關在打仗的地方關了一年半，然後送到四百哩外的一個新集中營去。男女都被迫扛運政府軍的行李，生病或體弱挑不動，就挨打。有的人給槍斃，有的人給灌埋了。當告訴我這故事的教授被釋放的時候，俘虜數千人中，還活着的只剩三百人。

新四軍事變在此後的一切國共關係中，劃下了一條感情的歇斯底里的線。一切談判都停止了。各地的中共軍隊都給截斷了給養。政府最精銳的部隊所組成的封鎖綫，把中共的陝北基地封鎖得密不通風。開始的時候，這是一個中國對抗日本戰爭，如今是兩個中國——一個是國民黨的中國，一個是共產黨的中國——對抗日本的戰爭。這兩個抗日戰爭之外，同時無聲無息地進行着一個附帶性的戰爭——國民黨中國和共產黨中國之間的戰爭。

一九四一年秋訪問亞洲的人，就會覺得難於斷定中日兩國間鬥爭的結局。繼續不斷的通貨膨脹與物價在競賽。中國軍隊失掉了機動性。日機隨興所至地轟炸着首都重慶。中國人之中的確存在着英雄主義，勇敢和信心——但也有同樣多的憎恨，懷疑和通敵行爲。中國人無法打勝，但他們不會投降。日本曾設法粉碎中國的軍隊，破壞它的經濟，鼓動其內部的不協調。他們得到了部份的成功，但整個而言是失敗的。中國依然被封鎖在一個曉曉板似的平衡狀態中，日本帝國部隊無法推翻這個平衡。如果把這個鬥爭看成只和亞洲有關的鬥爭，這局面就無法令人了解了。漸漸地，事情變得明顯，決勝之點的到來並不在中國本身。中國之戰是較大的世界戰爭的一部份，中國內部的問題及其痛苦是貫串在裏面的。民主國要是得勝，中國不會失敗，民主國如戰敗，中國就不會得勝。自然而然地，日本差不多同時得到同樣的結論。亞洲的戰爭是西方更大的戰爭的一部份。

日軍的領袖們了解荒唐的凡爾賽和國際聯盟並沒有改變了世界任何東西，也明白這是一個製造及破壞文明的時代，是一個國家要就偉大要就是滅亡的時代。從一九三一年起，日本人看穿了世界當時存在的混亂狀態，決定一有機會，即殘酷地進擊。日本的領袖們是些小人物，但他們有大計劃，在這些計劃中，中國被當作日本未來一切偉大的樞紐。在日本繼續向前在較大的未來世界中獲得偉大以前，必須解決中國問題——而解決的辦法必須合乎日本的口味，要使中國担任鞭撻之下的俘虜，拖拉日本征服者的戰車。

日本在一九三九年春天停步考慮了一下。它已經從蒙古沙漠起至亞熱帶的珠江三角洲上，佔領了中國一切重要的軍事目標，但中國依然在和它作戰。再要深入該國內地，就需要使出日本人的吃奶力氣。要中國降伏，必須把每一個日本兵，每一滴汽油，每一噸鋼鐵，都投資於駐守中國內地數年之久，直至中國屈服爲止——如果中國會屈服的話。這樣做，在一九三九年，在許多日本人看來似乎是荒謬的。因爲不管中國的結局如何，其時正在歐

洲發展着的戰爭，其結局無論如何總會在今後數十年內牽連日本。因此日本等候着。一九四〇年春，英法軍在德軍之前崩潰，使東京每一個決策的機關裡鐘鼓齊鳴。法國和荷蘭已被蹂躪而完蛋了；英國在死亡的門口；這些國家在南洋的屬地變成了孤兒。這情勢惹動了日本人，於是一九四〇年的帝國政策，就從大陸轉而為南洋的外交攻勢。

日本開始對這三個殖民強國提出要求，數月之間，一切都順利。法國的官僚們在本國和殖民地裡都沒有根基，同意封閉中國唯一的鐵路供應緬越鐵路，並且讓日軍駐紮到越南北部。英國被歐洲的敗仗弄得昏頭昏腦，同意封閉滇緬公路三個月，這樣關住了中國後門的最後通路。荷蘭則被牽入了日本的經濟合作的要求中，日本要求荷屬東印度的煤油，荷蘭人準備着招待一個日本代表團，討論煤油問題的詳細節目。一九四〇年仲夏時，日本似乎無往而不利——可是到了秋天，他們竟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外交攻勢已經像打濕了的爆竹那樣洩了氣。只有在越南，他們得到了所要的東西。英國人把滇緬公路重新開放，並拒絕再討論封鎖問題。在秋天，荷蘭人接待了日本去的煤油談判人，答應每年把不到二百萬噸的煤油賣給日本——這數目只是荷印產油量的四分之一。日本人自一九四〇年冬直至一九四一年春，這才消化了他們所獲得的教訓，得到了一個分析和解決辦法。他們對問題的分析是準確的；解決的辦法却是一個大禍患。

日本有兩個主要問題，一是在中國的尙未結束的戰爭，二是即將開始的南洋之役。大陸問題實在更其迫切，但南洋之役具有時間因素，那是要就馬上動手，要就永不動手的事情。這兩樁投機之間最好有一個為期數年的間歇，不過歷史是不等人的。一九四一年初，日本這兩個事業都不像他初料那樣進行順利。日本已把這兩個問題考慮了幾個月；不必任何智慧也能得到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即它的失敗之原因，并不在於戰場或談判席上，而是在於美利堅合眾國。

月復一月，美國漸漸成爲日本在太平洋上最大的對手。中國以憤恨之感注視着英國的封閉滇緬路，它覺得英國出賣了共同事業。對於法國在越南的行動，中國只有鄙視。似乎只有美國才能給中國以希望。美國把煤油和鋼鐵賣給日本，那是真的，但美國也漸漸在開始運援助品給中國。中國把將來的希望，寄託在美國身上。荷印也是這樣。荷蘭人只有幾架舊飛機和少數巡洋艦，不敢和日本の海軍及其久經戰陣的陸軍對敵，可是荷印得到了美國外交上的鼓勵，對付日本的外交壓力很是堅定。從日本人看來，美國的政策彷彿是破壞的陰謀。只要美國政府向中國或荷印說一句話一切都解決了；沒有這句話，日本就動不了。因此，日本的一九四一年計劃的基石，是在逼迫美國作決定，該年春，在華盛頓進行着談判。

日本人堅持其要求爲合理。他們說，他們所要求於荷印的，不過是礦源而已，他們很願意和美國分享。又說，他們在中國所要的無非是和平，而和平只有在日本控制下才能到來。日本所遇到的幻滅似乎是不公平的——日本並不在攻擊其他民族，日本自己正在受打擊，被破壞。『你們希望我們七千萬人幹甚麼呢？』日本駐巴達維亞總領事 在煤油談判之中問道，『要我們鎖在自己的多山的小島上麼？……我們必須要有煤油……假如你們不給我們，我們就自己拿……我們必須中國有和平——如果取得和平需要一百年的戰爭，我們就打一百年。我們在這上面冒着整個民族生命的危險……我們必須擴展……你們怕我們，因爲你們寬屈了我們。』秘密地，日本打電報把計劃中的對美談判大綱，告訴它的駐歐使節，說『要用外交談判來結束對中國的鬥爭，要建立東亞共榮地帶，要保持我們的國家資源，以備將來。』

甚至正當初步談判之際，日本的和平之說也給軍隊的貪婪破壞無餘。日本的將軍們把部隊開入越南南部，作爲進擊南洋的跳板。美國則以平時民主國家所罕有的急速反應，加以反擊，禁止煤油和鋼鐵運往日本本土。荷蘭和英國跟着美國的樣子做。美國的禁運煤油，使華盛頓的談判進入新階段。現在他們再不關心抽象的條件了；談

判變成了戰爭原料問題。日本的一切決策都有了一個時間限制——它必須在煤油用盡之前取得美國的協議，它必須投降並變得無力，否則就必須在變得弱而不能行動之前進行攻擊。

日本人如今再不能一面進軍，一面同時談判。他們走入陷阱，他們就設法作一個反圈套。他們說，如果美國再能把油和銅賣給他們，他們就可以把越南南部的部隊撤到越南北部。但美國再不能出爾反爾了。又把煤油和銅鐵賣給日本，就等於美國支助日本對中國的野心。美國的談判人員說得很清楚，中國如不自由，則日美兩國之間無法恢復正常關係，日本要試儘管試，總不能發見一項同時佔有中國而絞靖美國的方案。

美國也有一張時間表。美國的計劃準備在一九四二年春季行動——到那時美國一支志願空軍，包括驅逐機一隊，轟炸機一隊，並可能有魚雷機一隊，可以用中國旗從中國基地出發作戰；到那時荷印和馬來亞大約可以重新裝備好；到那時美國穿過太平洋的烏嶼可以配備並設防停當；到那時菲律賓將增加美國飛機和美國戰鬥部隊。這一切完工之日，日本就會倒臺了，如中國人所說的像『甕中之鱉』了。日本人充份明白這一條絕路。到秋天，日本國內的辯論解決了。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七日，東條英機將軍任內閣首相，這是現役軍人担任首相的第一人。東條是陸軍中的內幕人物，陸軍在日本決策的最後兩星期掌握了日本的舵。東條的計劃，是以熱烈的談判來保持華北，而重新獲得世界貿易的自由權，這樣來使日本繼續強大。如美國拒絕，則槍砲已經齊備。

至十一月中，日本駐各國的大使館接到一本準備緊急時使用的密碼。短波無線電廣播如兩次播出『東風雨』三字，就代表日美關係斷絕。十一月底，日本海軍已出動在海上，在北海道附近集合，並開向北太平洋；普通的密電太慢了，日本要外交人員用電話。至十二月初，軍隊已集中在越南南部，準備進軍南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美國數千家報紙和電台的自動電話機響了十二次，報告着一個新聞。疲倦的星期刊編輯們注視玻璃板板下的電鈕打出一個特急電。那是下午二時二十二分：

特急……白宮說……日軍進攻珍珠港……
亞洲之戰，現在是美國的戰爭了。

第六章 珍珠港事件以後

美國接受遠在地球另一端的戰爭時，對戰爭毫無準備。英美的主要武裝，是白種人優於有色人種，或至少白種文化高於其他等等糊塗信念。國防準備還够不到裝裝樣子騙人的程度。在菲律賓，我們只有一個空軍的骨架——B-1式機三十五架，那是早期殘破的飛行堡壘，火力不够，裝甲也不够，其中十七架在戰事發生的第一天就在地面上被炸毀；F-5式機二十架，可用，但飛得慢，是瑞典政府的訂貨而被轉移到菲律賓來的；初期型式的C-47機六十架；中型轟炸機一架也沒有；加上一些雜七雜八的A-1式及A-2式機，以及幾架每小時飛九十哩的觀測機。戰爭爆發後一星期內，這支空軍只剩下戰鬥機三十架，轟炸機一架都沒有了。我們的陸上部隊包括菲律賓斥候隊，那是很好的森林戰士；新自美國開到的國民警衛隊數千人，以及匆促訓練出來的菲律賓雜色後備隊，那是剛從菲島稻田及農家徵來的人。

其他盟國也很弱，荷印有三百架飛機，但其中大部份是陳舊不堪一用的。荷印有正規軍三萬人，其中六七千人是荷蘭人，其餘是土人。他們有步槍，機關槍以及幾尊舊砲，此外就沒有甚麼了。補充兵四萬人很快徵召起來，但尚未訓練，馬來亞的英國人保衛自己之物，只是森林，自己的驕傲，以及帝國的傳統。他們的空軍差不多完全是老朽過時的。他們在新加坡以美金約三萬萬元的巨款，建築了一個巨大的海軍根據地，可是它只準備應付海上來的攻擊；而日本人，當然，是從陸上來的。理論上，英國應該是南洋的主力——他們有澳軍一師團，英軍數千人以及大艦隊一支；但英國的指揮部是不够格而沒有決心的。

西方各盟國——英美荷——在心理上缺乏對日作戰的準備。除麥克阿瑟之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對日作戰的指揮官們，都是些十分自高自大的盲目的人們。美國防守珍珠港的空軍將領之一，曾在日軍進攻之前五個月在一

個集會上發表了一次奧妙的演說：「希特勒是我們真正的麻煩所在，」他說，「我們對付了德國人之後，就可以轉向日本小鬼說：『好，好，小弟弟，要乖一點』，他們就乖一點了。」

在白種戰士的神話之中，黑皮膚的人簡直就不是打仗的人。每個人都認為日本人都是近視眼不會打槍，認為他們的轟炸不正確，認為他們只會模倣，認為他們不會建造或維持真正的機器。你還記得一個故事，說起他們如何建造一只英國船，東拼一塊西湊一塊麼？不是有一個故事，說起他們用幼稚的計劃造船，船一離開船塢就翻掉麼？不是說日本飛機不好，第一架D5E式機一出廠就炸裂麼？日本零式機的一切詳情，軍事情報員早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就自重慶通知華盛頓，該機的機動性能，航距和引擎馬力，都有紀錄——可是給攔在檔案裡不問不聞。西洋諸國最精明的人注視着日本打中國達四年之久，而竟毫無印象。他們雖然不能懂得中國之戰，也不大費力氣去找尋簡畧的軍事形勢以外的事實，却大言不慚地有許多結論：他們說，中國之戰証明了日本在軍事上只是一個四等國，既沒有資源，也沒有從事現代化戰爭所必需的技術。

如果說在戰場上，盟國在軍事上和心理上缺乏對日作戰的準備，那麼，在爭取被攻之地的人民的信任的競賽中，它們準備得更不够。世界史上的一個時代正在結束中，但沒有人能及時了解；甚至在勝利以後，許多人還沒有懂得這一點。日本侵人南洋，是奴役下的亞洲的歷史的轉捩點。這是一個數萬萬人的革命的凶惡階段，其凶惡的程度，使戰爭本身差不多成爲不足道的小事。四百年以來，自阿爾芳索的大帆船於一五一一年穿過蘇利甲海峽，以及其後數十年聖哈維爾穿過該海峽以來，白種人的鐵釘鞋，蹂躪了亞洲皮膚黝黑的各民族的尊嚴和文化。軍事上趾高氣揚的白種人，搶掠了東方的財富，把信仰挑在槍尖上，硬塞進異教徒的臟腑。四百年以來，亞洲的民族仇恨漸漸累積起來反抗這制度，其內部壓力像一座火山。現在，一個皮膚黝黑的日本民族在白種的奴隸的眼前凌辱起白人來了。

菲律賓人有一個古老的傳說，講起上帝如何製造世界上第一個人，眉目都塑完之後，就放在爐子上烤。可是他揭開爐蓋揭得晚了，這個人給燒黑了。不過，這是上帝所造的第一個人，他把生命吹入此人之後決定再做一個。他用同樣的材料做第二個人，同樣地小心塑造其形體，熱心地等待着，但他等得不耐煩，把爐子打開得太早，因此這人沒有烤熟，是一個生病似的，生麪團似的白人。上帝不滿意，而且責備自己第二次做錯。於是他造了第三個人，這一會他常在爐邊張張望望，把人形取出來的時候，烤得不多，也不太少；此人是溫和的金棕色人。上帝滿意了。

這個故事也可以是馬來亞或緬甸或印度尼西亞的故事，也可以說是中國或日本的故事，也可以是任何棕皮膚或黃皮膚民族的故事。白種人之到來，已使這種民族帶有防衛性地自己警覺自己的膚色。日本兵工廠裏最凶的武器，就是故意提高人們膚色的自覺，強調白種人的優勢和霸權，強調有色人種的卑下和奴隸地位。一九四二年初，日本對南洋各國暴風雨似的進攻，彷彿是排山倒海而來的軍事力量的大檢閱。實際不然。那無非是消滅少數幾個白種人，那些白種人的腐敗的軍事機構，一方面承受其奴役下的民族的冷淡的憎恨，另一方面則被其中若干民族認為是十字軍的狂風暴雨般的起義一掃而光。

南洋之戰，除了菲律賓和美國人在巴丹半島及哥來吉多島上輝煌抵抗以外，是一段恥辱和愚蠢的故事。

日本人在歷史上對外國的戰爭中，從未有始有終打出甚麼結果來。不管他們一切宣傳如何誇張，他們的對美戰爭也不能說是對付白種世界的戰爭已經打到底；當時不過是把白種人逐出亞洲而已。他們第一拳打擊珍珠港，企圖爭取時間，擊破美國海軍，以進行南洋之戰。南洋有四個進攻點：北方的香港和馬尼刺，南方的馬來亞和荷印。

香港按照計劃而攻下，但菲律賓守住了。菲律賓的保衛戰，和南洋其他各戰役一樣，可以用政治來解釋。在一切奴隸民族中，只有菲律賓和盟國並肩作戰，菲律賓人受所有亞洲人都受着的許多凌辱，因而痛心疾首，那是真的。美國人的俱樂部不准他們加入。他們的薪水，要比同樣工作的白種人來得低。他們之中甚至教育最高的人，也不喜歡白種人虛偽的謙虛之狀。他們的領袖們依然有着痛苦的記憶。奎松總統過去曾和美國作戰四十年，到麥克阿瑟的父親手裏才投降。然而美國會給菲律賓以學校和醫藥，而且答應在幾十年之內給他們獨立，他們也相信這諾言是誠實的；他們是走向自由的事業中的年輕夥伴。日本答應給他們的東西，絕不能跟他們已經有的東西相比，也比不上美國已經許下的諾言。

菲律賓人給日本宣傳所惑，或打算投機取巧，因而助敵者，為數不多。有些第五縱隊在日機襲馬尼刺的夜裏閃動火光，指引目標；有的第五縱隊狙擊企圖管制燈火的防空隊員，還有人給日軍以情報，替日軍當嚮導。可是絕大多數的菲律賓人忠於美國，像忠於他們自己的利益一樣。他們像小孩一樣信任着美國的力量。當呂宋的軍隊被壓縮入哥來吉多島和巴丹半島的時候，菲律賓人依然相信大批船隻正在開來，援助即將到來。雖然失敗一天比一天更顯得不可避免，他們的信心並不動搖。甚至在五月初，一切有組織抵抗終於崩潰，也不能使他們相信他們的利益和日本人一致。兩年半之後，他們依然如故的信心迎接了回來的美軍。

盟軍的戰畧在正月初把菲律賓丟在腦後，認為已經不可救藥；這戰畧集中注意力在守住馬來亞至荷印一綫。這一着是毫無希望的，因為傾倒在這最後一綫上的一切東西，無非是倒入失望和沉滯的海中。日軍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自泰國邊境進攻馬來亞。他們很快地穿過了英國人深信無法通過的森林，向半島的西海岸掃蕩，然後滲過樹木和森林，進撲新加坡。

日軍所用的被人認為荒謬的技術，突然變得所向無敵。日軍的制服的確破壞了一切軍事成規，可是破爛的線

皮鞋和短褲更適合於森林戰，要比沉重的英國軍靴、頭盔、防毒面具以及其他種種配備好得多。日軍穿着各式各樣的破舊衣裳，這使他們很容易混在平民中間。他們沒有重需隊，而且差不多沒有運輸隊。英軍坐着卡車，陷在泥裏，而日軍徵用了腳踏車，迅速地在別人不注意的小路上騎腳踏車進入戰鬥。日本的士兵裝帶着一瓶水，一個飯團，一點乾海菜，幾根鹹菜；在當地要是找不到吃的東西，他可以靠這點東西過活四天。英國人却要靠二十三種食物過活，其中大部份是罐頭食品，從英國人看來，敵人簡直是「聞一聞油味」就可以活命的。英軍有口徑很大的武器，瞄得準，打得遠；但熱帶茂盛的叢林中，多半只能盲目射擊，因此瞄準和遠距離發射失掉作用；日軍則用小口徑武器，每人攜帶着自己的子彈。

第五縱隊在馬來亞幫助日軍很大。他們用巧妙的辦法，把指揮部或砲兵位置指示給敵機掃射。牛奶罐頭剝掉了外面的紙條，在太陽中閃爍有光，從空中看來，是一支直指目標的箭。香蕉樹葉面上是綠的，底下是黃的，他們把黃的一面翻上來作成標記，這在地面上更不引人注意。土人給日軍送食物，擔任嚮導。日軍有了這樣的幫助，在七個星期之內從馬來亞北部至南部尖端挺進了四百五十哩，然後停了幾天，整頓一下，直撲新加坡。

英國人在戰前既未能使屬地人民有所準備，戰事一起，他們更完全和屬地人民隔離。日軍進攻開始時，檳榔嶼「純屬英國種」的英籍人士奉命撤退，但亞洲人都不准走，連英國人歐亞混血的妻子也不准走。這個命令以及隨之而來的其他種種種族歧視的辦法，動搖了土人的士氣。英國也把中國人包括在次等民族之列。中國各界——共產黨，國民黨，銀行界，商界——的領袖五十人曾訪晤新加坡總督，要求作戰的武器。他們給拒絕了。中國人成群結隊地去當救火員，担架隊員，救護軍司機。他們形成了防空隊的骨幹。當馬來和印度工人逃跑之時，中國義勇隊每天早晨七點鐘集合，担任需要他們做的一切工作。他們管理船塢，肅清被炸的建築物，掘戰壕，運軍需，但直至戰事將近結束時，他們才被允許作戰。中國義勇軍第一連只在該島陷落之前五天才得開赴前方。他們乘

卡車出發時，唱着『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幾連人終於在匆促訓練之後，看到了戰鬥。其中有一連，派駐在該島西北角的沼澤地帶，其武裝是雜色槍枝，多半是獵槍，每人僅有七顆子彈。他們並沒有防空壕，在大雨傾盆之中，他們設法掘了戰壕，戰壕裏的水和地一樣高。六小時之後，日軍先用機關槍那樣密的排砲無情地轟擊，然後在該地區登陸，這些中國人給殺光了。

至二月底，馬來亞和新加坡陷落之後，日軍的注意力移回南北兩方——向緬甸和荷印。荷印在幾個星期之內陷落，該地土人的不穩並不積極，但土人對他們的主人失敗無助於中，使真正的保衛戰成爲不可能。在緬甸，土著民族憤怒地反對白人，用他們所想得到的一切辦法放火、搶劫幫助、日軍（註）。數月以後，有一位棕色的高級官員，移來在英政府治下的一個重要人物，在澳洲寫下一篇文章，企圖解釋日軍的勝利爲甚麼驚人地徹底。他的英文詞不達意，可是急於求人了解，因此他寫下七頁文章，該文名爲『戰爭及日本勝利之原因』。在最初三段內，他鋪敘了日本的經濟需要以及世界上的權力之爭，又議論了一下軍備和戰術。這之後的大頁半，他一項一項讓白人對有色人種的種種小侮辱。馬來蘇丹不准進入新加坡。馬來官員被迫須在柵前下車步行，但白人可以直接而過。英國人必須被稱爲『先生』，但黃種人不許有此種尊稱。英國人因爲有着『只招待白人』字樣的牌子，不能和同事們共飲一咖啡。他結語道：『爭取持久和平的道路，是在於實現你們大西洋憲章所稱的人類自由平等的諾言。我們說的故事雖細小，但大西洋之形成，乃由於小滴水珠。』

到五月底，日軍已完成了所有的野心目標。他們強姦了白種人的帝國，北起香港，南至達爾文港附近，西面

（註）倍爾頓氏所作『跟隨史迪威撤退』一書（Jack Baldwin: Retreat with Stilwell）的第一章，是緬甸之戰的最好記述，也實在是整個南洋之戰的最好的政治分析。

，則掃清了到達加爾各答的大門。西洋帝國主義皇冠上的寶石——印度，只隔一重山而已。

一九四二年夏的印度，炎熱，多塵灰，在灼人的熱帶太陽之下，等候着領導。該國三萬萬五千萬居民，昏悶在炎熱之中，被內部的熱情和衝突煎灼着，只在自己的大痛苦以及對英國老爺的共同憎恨中聯合起來。歷史的一擊已經成熟了。在整個戰爭的過程中，聯合國的隊伍從沒有比一九四二年夏季那樣更近於失敗。在各個災難之點中，印度僅次於斯大林格勒。德軍其時已在伏爾加河邊，在埃及西部沙漠，離亞歷山大城只三十哩。德日軸心夥伴之間，只有一些動盪不穩的國家，一百年以來，那些國家一直是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對敵的棋子。這其中印度最關重要，如果印度把白種人趕走，則甚麼東西都無法阻止日德兩軍會師，而使戰爭延得極長，使戰爭的代價多費許多倍。

盟國理論上是爲了爭取自由而戰。印度農民大眾對自由却已急不及待，他們已感受到帝國主義制度在東方的崩潰。可是問題是十分奇妙複雜的。假如印度要自由，英國人就得起走；假如英國人被趕走，日本人就會進來，很容易取得勝利。取得光榮和勝利的解決辦法只有一個：必須儘可能最迅速地、最誠實地、最完整地給予印度以獨立，這樣來購買印度的友誼，以便勸說印度民衆像中國人一樣，爲了自己的利益而作戰。誰都不知道自緬甸的崩潰起至一九四二年八月的危機止這短短的幾個月內，是否能有效地形成這樣的解決辦法。發生了的事情，是劇中每個角色都胡亂冒險地做他應做的戲，終於每個人的野心都立即失敗，或最後失敗。日本人做錯了，英國人做錯了，印度國民大會黨也做錯了。

日本人做錯，是因為他們沒有在六月間危機明顯之時進攻。掃遍全印度的不安的浪潮，是日軍在別地方奇妙地擊敗大英帝國的結果。可是日本計劃作戰，首先考慮軍事戰鬥，把政治放在第二位。他們希望被奴役的民族

仇恨成爲他們自己的新帝國的支柱，而不成爲自由的支柱。模倣歐洲時，日本把歐洲的弱點和優點一起模倣下來。它全部採用了白人帝國的建造者的盲目的種族主義——它認爲有些人人生來應統治別人，它自己就是天所指定作統治的民族。日本人野蠻的自高感覺及其對白種人的可怕的鄙夷，與其說是一種有條理的政治理論，不如說是一種情感。在這種情感之中，也包括對於其他黃種人或棕色民族的鄙視，其鄙視的程度，和過去的統治者一樣大，甚或更大。日本人之所以力量強大的，自於亞洲生活的革命，可是他們不了解這一點。他們不了解印度內部的不滿，也就不會利用時機給他們的優勢。假如他們集中手頭所剩的一切軍事政治力量，衝過印度邊境的山嶺，他們進入印度時，印度可能已革命成功而歡迎着他們呢。他們太過驕傲，對印度人估計過低，沒有準備利用印人起義的時機。

英國人的失着，驟着看不出來。一九四二年春，克里浦斯爵士自倫敦赴印，帶去了一個條件極多的獨立的諾言。在印度的炎熱之中疲倦而煩擾，他糊里糊塗把他的建議提了出來，他雖然本心想作一點必要的改革，可是給英政府的訓令束縛了。克里浦斯之行失敗以後，英印雙方都向前走入不可避免的衝突。處理夏季危機之權，這就落入印度的英國文官之手。英國官員的作爲，和人們所料想的不爽分毫：他們對付整個事情，對付沸騰的痛苦和渴求自由的熱烈情感，彷彿處理一件警察局的案子。他們用安靜、有禮和極端無情的苛刻，準備粉碎覺醒的大眾。有一個新德里的英國高級官員，讀了那引發起義的國民大會黨的決議案之後，第一個反應是說，『你知道麼，我覺得這是不合法的。』

可是不管其手段如何乏味，反叛的浪潮是起來了。要稱讚引起此種結局的英國官員，是很難的；然而要是他們失敗了，印度可能被拖入軸心國的軌道。英國的錯誤直到這之後很久才變得明顯。他們不用獨立爲禮品而爭取印度的友誼，反而鎮壓了這次反叛，這就種下了長期憎恨的根源。在我們這時代，英國在印度的統治的結束是遲

早之間的事。他們本可以在印度培養一種跟美國和菲律賓之間相差不多的友誼聯合，可是計不出此，替自己招來了可能是永久而無法調協的衝突。

最後，印度國民大會黨的錯誤，和日本或英國一樣壞。這個團體是印度最老和最有力量的政治組織；它領導印度人民對英政府進攻過兩次。它和中國國民黨初期相似，因為它是由於國恥的不滿，對自由的期望，反映農村困苦和條理不甚明晰的社會改革計劃而組成的混合品。和初期的國民黨一樣，有兩方面的人支持它——不快樂的人民大眾，以及供給領袖人才的受教育的中產階級。國民大會黨的內部包含着將來內戰的種子，這一點也和國民黨一樣。

國大黨和國民黨不同之點中最凸出的一點，在於國大黨避忌暴力。國民黨是從內戰及軍閥的騷擾之中成長起來的，它的領袖們只有在學會了如何以暴力影響政治決定時，這才取得政權。暴力或暴力的威脅，浸染着中國每一個有教育的人的政治思想。印度國民大會黨癱瘓了二十五年，因為該黨信託甘地的精神領導，相信他的轉變可不由暴力取得的說法。

一九四二年夏，印度國民大會黨的非暴力抵抗政策，錯過了數百年來取得印度自由的最大的機會。其時英國是軟弱的——軍隊散佈在帝國的遙遠角落，文官不快樂而士氣低落。敵人近在門口。千千萬萬的印度人等候着國大黨領導機關的指示。該黨的確號召他們走出店舖、田野和工廠，但不是去作戰，而是去抗議。該黨領導者號召他們出來以空手反抗機關槍和大砲，並且訓令他們不要還擊。許多同情印度獨立的朋友們對於國大黨在軸心國家威脅之際轉而反對英國人是否聰敏，覺得懷疑。但既然作了這個性命交關的決議，國大黨却無視於一個事實，即實施此決議，必須武力。消極抵抗的結果，只是無謂犧牲了許多人命之後，繼以失敗。

從六月到八月，國大黨整裝待發。它向世界和印度提出來的問題，只是說只有印度人才能有效地應付日本進

攻的威脅，而印度在奴役制度的鑄鑄之中，不能有效地爲自己的國防而戰。起義的戰鬥口號是「離開印度」——要求英國給印度人民以完全獨立，以便他們組織自己的國防。差不多已被奉爲神聖的國大黨副領袖尼赫魯氏，會爲印度的要求作過最出色的說詞，尼赫魯在參加運動被捕入獄之前五天，在一次說話中總結他對白人世界和亞洲的整個態度：

使我驚異的事情，是英國人完全不能按照新的世界形勢，按照現實主義來思想——這所謂現實主義是比軍事現實主義多一點的東西，是政治的、心理的、經濟的現實主義。

英國人，不論其爲何人，想起印度來，只把它當作英國的附屬品。他們的印度史是在他們佔領印度時開始的。一般歐洲人對亞洲的概念，無非把亞洲當作歐洲和美洲的附屬品——當作必須由西洋的良好工作來超度的一大羣低級羣衆。

可是從世界眼光看來，歐洲的稱霸只是最近的事。英國人到這裏來的時候，印度的工業是和英國一樣先進的。印度在英國人到來以前，從沒有作過附屬國。我們吸收了我們的征服者，他們變成了我們的一部份，印度從沒有依賴過其他國家。現在權力的中樞在倫敦，却不在印度。

我看歐洲不論有何輝煌的成就，目前正在竭力自殺——我這樣想，我覺得歐洲文明中缺少着甚麼重要的東西，有甚麼毒物在毀壞着它，使它每隔二十年帶一次戰爭來。我覺得亞洲縱然落後，可是擁有確實的文化上的穩定——主要在中國和印度……

問題所在，正如它在戰爭開始時在我面前顯現的一樣，是在於如何把這個新亞洲和歐洲及美洲的進步力量聯結起來。我們希望亞洲和對希特勒作戰的力量並肩作戰。把亞洲看成附屬品的話，這就做不到；必須在

平等基礎上對待亞洲才行。

法國的陷落是這樣驚天動地，這樣淋漓盡致地表現了西方帝國主義機構的腐敗，以致我們以為歐洲人的眼睛終於睜開，看到了帝國的危險了。然而他們並沒有睜開眼睛。

之後很久，馬來亞和緬甸淪陷了——這無論如何是對於英國人的一個直接教訓，因為分崩離析的是他們的帝國。令人驚異的是，甚至這樣還沒有甚麼效果……

過去以歐洲正在發生的事情而言，我們心裡批評政府，但並不使政府煩擾，並不想阻擾對抗軸心國的作戰努力。現在我們從新的觀點上來看問題了——如果保衛印度，使不至受侵犯……顯然地，除非我們告訴人民說是他們在保衛自己的自由，他們是不會向這方向走的。

克里浦斯是在那個時候來的……但克里浦斯放在我們面前的圖畫，和現有的乏味圖畫非常相像，也不能使人民覺得他們正在保衛自己的自由，使他們熱烈起來。我們無法使這戰爭成爲一個人民的戰爭。

人們對於克里浦斯的訪印，緬甸的情況以及對待從緬甸撤退的成千成萬印度人的方法，反應很深很大。在印度的命運被人決定的時候，特別是在我們一切的思想，使我們深信英國當局沒有資格保衛印度的時候，我們不能旁觀。如果我們不同意克里浦斯的建議，難道我們就靜靜地坐着看我們自己的民族崩潰麼？

我們得到了結論，爲糾正計，我們必須現在就採取行動，不讓局面越弄越糟，以致親日的情緒抬頭。

在這樣的領導之下，國大黨進行動作。八月八日，國大黨在孟買舉行的全體大會批准並通過了一些決議，號召全國完全不合作，直至英國人退出爲止。政府在數小時之內就進行反擊。它行使其合法的緊急權力，用新聞檢查鉗住了新聞。黎明時，甘地，尼赫魯和國大黨的其他高級人員就在孟買被捕了。警察把認爲危險的各地領袖一

概找出來加以逮捕。

到明天，全印度沸騰了。領袖人物之被捕，斬掉了這個運動的頭，非暴力的哲學，鬧割了這運動。這運動虛無主義式地沸騰到街上去。英國貴族這一回所受的威脅，要比一八五七年大暴動以後任何一次都大。他們嚴格檢查發到外面去的電報，以阻止敵人或英美民衆獲悉這個危險。政府是在爲生存而戰。在首都德里，示威者集合起來，唸着『印克拉勃·秦大巴德』的口號，聚起金色和紅色的大旗來遊行。英軍在大街上開槍制止他們。郊外槍聲響激雲霄，房屋着火了，暴民拆倒牆壁，把磚塊擲向軍警。迫擊砲隊出動了，機關槍也架起來監視各街道。政府正式承認會殺死暴動者四十人；據印度人說，被殺人數當數倍於此數。在三天之內，孟買紡織工廠百分之六十關了門，該城被殺者有三十人。一星期之內，幾乎生產着印度全部的鋼的達達工廠也因另一次罷工而關門。亂事如燎原之火，從德里和孟買出發，燃遍勒克腦，堪浦爾以及恆河上下游。英國人很快地把軍隊集中在大城市里，以壓服火燄的中心。可是到這時候，起義已像播種一樣地遍佈農村，幾百個孤立的行動在鄉村中間燃燒着。加爾各答和德里之間的鐵路交通給截斷了一星期；暴民拆掉鐵軌，割斷電話和電報線。英國人的緊張達於極度。他們甚至把皇家空軍調出來，在地面部隊不能深入之處掃射拆裂鐵軌的游擊隊員。

這起義除了大城市之外，缺乏聯絡和指揮。農民的反應與其說是理智的，不如說是本能的；雖然他們的領袖排斥暴力和死亡，他們自己已覺得這是一個戰爭。他們的攻擊集中在鐵路，橋樑和警察局。他們在發現自己能責罰人的地方，其暴怒是毫無慈悲的。有些警長被暴民用手撕成碎片，還有些人給活埋。軍隊長官出來如沒有人保護，而給他們發現時，也被殺死。有些沒有聯絡的暴動者佔取了整個縣份，並且堅守大片地方，郵件和警察都鑽不進去。國民大會黨對於自己的人员利用武器以及指導人民的力量方面，都沒有準備。該黨只要求以不流血的革命來取得政權，毫不用權力政治來考慮問題。於是沒有計劃的叛亂中心就給英國人逐個擊破。至九月中旬，在印

度人數千被殺之後，危機是過去了，帝國的掌握又堅定起來了，如果日本人要入侵印度，就得打仗了，就沒有法子利用革命動力的泉源了。英國人贏了這個賭局，因為出事情的時候日軍並沒有侵襲印度，却寧可把自己的力量，徒勞地化在中太平洋上。

由於印度反叛的粉碎，亞洲大陸上的戰爭縮小成爲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戰爭。日美戰爭是實力的無情比賽，却在遠處進行，日美戰爭規模儘管大，政治意義却小得很，因爲在這個戰爭中，日本一開頭就註定要失敗的。中日之間的戰爭，形式上很差，其唯一的重要性，是在於這是亞洲兩個獨立民族之間的戰爭。英美在對日作戰最初幾個月內沒有能在自己的力量之上裝一點道德的標準；印度國大黨可能獲得它所尋求的道德上的領導權，却給壓伏了。只有蔣介石的政府還在對亞洲揭示着新世界的希望。

第七章 如此「訓政」政府

中國自稱有一個政府——這「政府」的獲取政權，從來不靠選舉投票，但官員們和宣傳家們喜歡這個合法字眼。他們用國民黨的特別的國家理論來彌補事實和言辭之間的遙遠距離。這個理論也並不兌現，只不過很有趣而已。這理論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在堅持着。根據這理論，中國不必有一個人民的政府，而只要有一個國民黨監護人民的政府就行。孫中山氏把該黨的責任分爲三期。第一期爲軍政時期，是該黨保衛人民，反對國外帝國主義及國內軍閥的時期。第二期爲訓政時期，在這時期中，該黨教導人民怎樣管理國家。第三就可能是憲政時期，其時其他黨派也准許活動，而國民黨在選舉中和各黨競爭。

在戰爭時，只有國民黨掌理政府，國民黨就是政府。該黨任命並訓令一切政府官員。該黨控制着國民軍。軍隊里所有高級軍官全須入黨，士兵百分之九十也至少名義上是黨員，每個部隊中都一定有政訓人員。由於政府和黨是一樣東西，軍隊也就是黨軍。國民黨掌握着新聞檢查。黨的工作費用是由政府開支的。黨的各部門靠人民的稅款過活。而由於其他各黨都被認爲不合法，批評國民黨就是違犯了國法。

蔣介石的噱頭，就在於他似乎想把訓政和憲政兩個時期同時完成。爲了作戰，他就從人民那裏徵兵及抽取錢款及米糧；爲了做這些事，他利用了古舊而壓迫性的保甲制度，這制度是把農民放在嚴重的管制之下的。而爲了和共產黨作戰，他得加強新聞檢查和秘密警察。同時，他很喜歡民主詞句和口頭禪。他說起投票和憲法的迫切需要。他答應給農民以更多自由，但他所做的，往往是限制了他們現有很少很少的自由。他自己的語言和行爲總是矛盾的。他的政府有兩個面孔；一個朝着農民，保留着中國封建主義的一切古舊的不民主的特點，另一個面孔出來向外面看，對着中國的盟邦，這個面孔是用西洋人眼里中意的東西扮出來的，上面有着訓政，人身保護法，

以及民主。

在紙上，這政府是很合邏輯的。中國有一個行政院，管理民政事宜，推行法令，擬訂預算，任命官員，宣戰，締結條約。行政院下面的十一個部長，從西洋人眼光看起來好像是內閣；宣傳部不屬於戰時內閣，而是直接向國民黨負責的。此外有個立法院，外表上有點像國會的樣子，却既不能制定政策，也不能否決議案，其存在的效用，只是用橡皮圖章在法案上蓋蓋印。此外有司法院，管理法庭。中國在三個一般熟悉的政府機關以外加了一個考試院，銓敘各種人員的資格，自律師起至看護婦止。又加了一個監察院，有審查、彈劾和稽核之權。五院之上有個國府會議，除了各院長都得由該會委員擔任之外，該會的權責是十分含糊的。更高一層則為國防最高委員會，行使着『最高權力』。而頂尖上則為擁有戰時『緊急處置權』的蔣介石。

你要死釘着這樣的邏輯，一定會發瘋。美國人習慣於建立在法律基礎上的政府，他們從中國自己宣稱的各節上來設法了解中國。新到中國的人，力求明瞭實情，努力了幾星期而毫無效果，往往攤開雙手，宣稱中國並無政府，只有一團糟的混亂或軍閥的聯盟，或宣稱全體中國人都是滿清的遺民，或宣稱這一切完全是法西斯主義。所有這些單純的解釋都是錯的。了解中國的最容易的辦法，是首先要決定所謂政府只是國民黨的掩護體，國民黨的政治和派別才是決策的主要因素，而黨的後面，是人類最老的統治形式——個人專制主義。

該黨指定一個黨代表全體大會，代表大會選出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執委會又選出一個中央常務委員會。在政府內部無法找到的一切黨內論爭、決定和權力，都在這個中常會之內進行。黨的中常會每兩星期在重慶開會一次，發命令給政府的最高機關國防最高委員會，然後國防最高委員會把命令遞交政府各有關機關。五院院長是由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的；中執會任命國府委員；中執會控制國防最高委員會；如果中國要選一個新的總統，這總統也是由國民黨中執會選任的。

國民黨的組織做效着俄國共產黨。在每個縣里，每個部隊里，都有黨部。鄉村中的黨部，則通常握在當地官員和農村貴族的手里，他們才有足夠的閒工夫，或教育，或金錢，來從事政治。各地黨部由縣而省，成金字塔形，省黨部則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基礎，代表大會定兩年舉行一次。國民黨員在中國人民中佔極少數。黨員的義務如下：

所有黨員均須嚴格遵守下列各項紀律：（一）服從黨章及主義，（二）准許自由討論黨的任何問題，但一經決議，必須絕對服從，（三）保守黨的秘密，（四）不准在黨外人士之前攻擊黨員或黨組織，（五）不得參加任何其他政黨，（六）不得組織派系。（註）

上述規則，忠實的黨員多少遵守着前五項。至於第六項，則國民黨實際上有很多派系——有的是保守的，有的是自由主義的，有的只有一個名義。該黨像美國民主黨一樣，是一個龐雜的政治混合物。

黨內最堅固的一派和政府內最有權勢的力量，是名為C.C.派的右翼集團。C.C.是反動的；它反對外國；它贊蔣委員長最近；可是它也是國民黨內唯一的從根組織起來的集團。它的領袖有兩人，一是陳立夫，一是陳立夫的哥哥陳果夫。陳果夫生着肺病，在整個戰爭期間，他是委員長侍從室的人事處長，各種文件及尋求委員長青眼的人們，都得先通過他。C.C.的真正老板却是他的弟弟陳立夫。陳立夫戰前曾任國民黨組織部長五年，組織得很有成績。在黨內真正需要投票解決的任何競爭場合，C.C.派能够操縱議程，左右問題，並且使自己的候選人衝出來獲得絕大多數的票數。其他各派的力量或則從軍隊裡產生，或則由於其領袖們在首都得到寵眷的個人關係。C.C.

派却不然，十年以來，它一直能够使代表們的選票擁護它的要求。選票和黨內多數，還不過是C.C.派買賣中精良貨色的一部份，此外，它還擁有蔣介石的寵愛，擁有蔣氏絕大部份的眷顧，統制着全國的思想、報紙和學校，管理着一個只對黨組織負責的獨立的秘密警察系統。

C.C.操縱着國民黨大多數的政策和選票，因此也控制了委任下級政府官員之權。它担任着反對自由主義及共產黨運動的急先鋒。在這些事情中，它以委員長長的親信代表資格行事。但委員長也有自己的一套，他甚至在黨內也採取合縱連橫的做法，使C.C.不致於得到絕對的控制權。在某幾省內，省縣黨部完全由當地的軍閥主持；有幾個省份內，國民黨很有一些地方色彩。但黨部人員大多數是當地的官僚和鄉村貴族，這些人都是堅決的C.C.份子。從極右派的C.C.向左看過去，第二派的人是軍人集團。在黨的代表大會上，軍人的意見總是批評性質的。如果軍人的意見是統一的，國民黨內部吃黨飯的人也許會倒台。可是軍人分爲兩派。一派是曾任軍政部長十四年的何應欽的軍人官僚集團，另一派則爲青年熱烈的黃埔派。

黃埔派包括蔣介石二十年前在廣州創立的黃埔軍官學校的畢業生。這是一批新式的戰士；蔣的較老的朋友是新國家的建築師，他們則是棟樑。黃埔畢業生在早期的反軍閥內戰及反共內戰中死了不少人。活下來的人，是一個團結緊密集團。時光流轉，他們升了官。在抗戰開始時，整個中國軍隊中的一小部份約四十個師是由黃埔派的人指揮的，到抗戰末年，黃埔派指揮之下的軍隊，達全國軍隊三分之二。一般人承認黃埔派有兩個代言人：一是胡宗南，他是有名的黃埔第一期畢業生；一是陳誠，他是黃埔的青年教官，於一九四四年繼何應欽氏任軍政部長。何應欽手下的人，由於一向資格老，地位高，是國民黨軍方最有影響的人。但是黃埔派有熱力，有緊密的團結，掌握着將來的前途，投票擁護着自己的主張。這兩派之間，政治上沒有多大差別。兩派都是權力主義者，都相信暴力的聲音可以決定政治。不過黃埔派主張政府應該比較有效率，主張清除壓在作戰努力之上的爛木頭，而

何氏的黨羽就只希望維持現狀，維持一切的糊塗和貪污。

在陳立夫不當國民黨組織部長之時暫時代替他的人中，有一個德國留學生名叫朱家驊博士，朱氏痛恨着 C. C.。他到黨中能幹和進步的份子聚集在他周圍。朱家驊派不像其他各派那樣有清晰的標誌。它並無明顯的主張。它是右派，但不是極右派。朱氏利用着自己一小派人來聯絡各方，把自己的力量押在主張提高效率一方面的秤盤上。

可憐中間派而接近美國標準的，是政學系。這一派人多半曾在日本或美國受教育，懂得現代商業的方法，要求中國更有效率，希望中國工業發達，並希望中國建立有益於國家的工業。他們主張法治和有秩序的政治，主張建立一個保守而具有流綫型現代化形式的國家。他們之中包括中國某些最能幹的專家，了解應做而未做之事。政學系的主力，是從上海和華北的大資本家之間集合起來的。戰爭掃蕩了這些資本家，也就把政學系力量的泉源剝奪了。由於該系人物的思想明確，不神秘，現代化，由於該系許多領袖能說英語，美國人覺得理解他們要比理解中國其他的人來得容易。蔣介石因為不得不和美國親近，自然而然地漸漸把許多重要職位交給政學系。他們作官時表顯得很能幹而有自制力，他們夢想着一旦握得政權以及効力的機會時，他們能達到的效率應如何巨大。

國民黨內甚至有自由主義派。這個左派的領袖是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孫氏因為自己的父親是革命之父，並不懼怕迫害。而且，有着中國幾乎獨一無二的機會，他能够說出他所想到的事情。集中營和苦刑從來輪不到他。他用西洋的方法來思想行事。他要求西洋式的改革。不過他是個學者。他大約是重慶讀書最多的人——是一個絲質的人，不是個銅質的人；他的智力以令人驚異的輝煌，閃爍在中國政治舞台之上，但是他既無力量，又無氣魄來和控着國民黨的頑固人物對抗。雖然他不會和國民黨決裂，他却具有在內部反對它的勇氣，他公開聲言反對

壓迫和貪污，他說了人民所敢說而不敢說的話。孫氏是立法院長，那是一個比較顯赫而比較不重要的恰如其分的位置。他明白黨內進行着什麼事，他利用着自己的地位來促成民主和人權宣言，擁護他的人很多，可是他在黨內的票數極少，蔣介石常一連好幾個月拒絕見他。

蔣委員長以總裁資格統治着整個國民黨。黨員之中獨立不羈而他的意志不同的人，至多百分之十。少數幾個真正不滿的人聚在孫科周圍追求革命的若干理想；此外有少數人喧嘩地爭鬥，無非在設法逼取蔣的注意。委員長十分注意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這中間感覺少數人的批評，然後在內部會議中和各派領袖一起決定改動內閣或發表政策聲明。有時他丟開了訓政之類的神話，乾脆踏進會場，在黨的常務委員會里宣佈他的意志，然後接受該會恭順的贊同。當C. C. 派似將失勢的時候，委員長竭力迴護它。當美國的批評太凶的時候，他就給一點甜頭給政學系中一兩個人望頗好的人物，表示他信任政學系。

要恰當地觀察黨的機構，只消看看委員長的私宅。在私宅里，許多秘書在數千名訪客中挑精揀肥，在數千封公文中選擇需由委員長自己處理的報告。接近蔣的耳朵就是接近最高的政治威權。只有他的私室里才能發現迅速的決定，只有他的指令，才能使行政不循腐朽的常軌。即使在紙上，委員長也幾乎具有無限的權力。理論上，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可以訓令他；事實上，他在訓令中執會，而他也具有合法權力，可以否決中執會的任何決議。他對政府的掌握也是合法的；戰時國家最高機關是國防最高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工作集中在十一個委員的手里，這十一個委員是他所指定的，而他是主席，而該委員會只有在主席召集之時，才能開會。

政府竭力否認這是獨裁政治，可是按照它自己的說法，它的最高機關是這樣的：

國防最高委員會主席，按照組織法，有緊急處置權。主席在處理黨政軍事務之際，不必依照普通手續。

主席得視情勢需要，頒佈有關此等事務之法令。但在一般情形下，主席在行使此等權力時，須與常務委員會先行商酌之。（註）

中國政府的最大的麻煩，是在於決策和行政之間有一道很寬的溝分隔着，這條溝的大小，和橫隔在委員長及其發抖的部下官員之間的溝一樣大。高級政策是由委員長支配的，行政則由少數幾個人担任，這幾個人為委員長所信託，但權力有限，而且行事決不致於逾越自己的有限的權力。

蔣氏把自己的政府分成三方面——軍部，黨和民政。每方面他付託一個毫無問題忠於他的人管。甚至那三個人之間，也有許多微妙的相互傾軋和牽制情事，這使一切重要的決定，都得交回給他管。然而這個三人執政團的權力即使有這些限制，他們在最近五年來還是委員長一人以下中國最有權勢的人。何應欽掌管軍隊；陳立夫掌管蔣黨；孔祥熙掌管着民政。這三個人都是圓滑可愛的人物，懂得怎樣逢迎蔣委員長的嚴厲乖僻的性格，以取得個人的利益。孔氏已遠離中年，陳立夫則為中年人，但所有這三個人都和蔣氏有二十年左右的同袍之誼。

在一個戰爭中的國家內，軍隊是最重要的事務，故何應欽大約是蔣氏三親信中權力最大的人。何氏年近六十，是一個矮胖結實的人，臉圓圓的，永遠很有禮貌，眼鏡後面的眼睛竟彷彿小學教員似的。他的實力的來源，首先是由於他担任着蔣氏的軍事代表之職，其次由於他親自在軍隊中佈置下的政治機構。何氏生長在落後的貴州省，有一個謠言說他是全貴州最有錢的軍閥之一。他曾和蔣委員長差不多時候在日本士官學校求學。和蔣一樣，他

離開日本，參加了一九一一年反對滿清的起義。他的真正前程的開始，是在他被任爲國民黨的黃埔軍校教務長之時，這之後，他一直追隨着蔣氏，如影隨形。至一九二七年，他成爲國民軍的參謀總長，一直担任着這個職位至一九四六年五月止。

他在軍事委員會九廳八處的灰色辦公廳裏指導戰爭。他是一個書桌軍官，種種文件川流不息地使他的屬下眼目暈眩。他從抗日戰爭爆發時起至史迪威事件止，兼任着軍政部長和參謀總長。糊塗的指揮以及戰場上中國軍隊的漸漸腐爛掉，除了蔣介石之外，他大約要比別的任何人都更負責。重慶有一時期公開談論着團長缺一，市價若干。中國兵士的挨餓，徵兵的暴屍殘殺，軍餉呈報表裏面的滿是死人名字，一般人都認爲是貪污的自然結果，而直接歸咎於軍政部的各機關。

在軍隊內部，何氏却還不是公認的領袖。反對他的是戰時長得羽毛豐滿的黃埔派。由於控制着軍需品和軍餉，何氏可以寵愛這一個部隊，苛待另一個部隊，而使依賴他的人漸漸盡忠於他。可是三分之二的部隊是黃埔人物指揮的，他們多半看不起何氏。黃埔派領袖之一胡宗南將軍，他年紀在四十五左右，指揮着封鎖中共的軍隊以及駐防在受着日軍威脅的黃河渡口上的軍隊。胡氏也許是軍隊一切年齡較輕的人中最得委員長喜愛的人，有人認爲他是蔣氏的繼承人。他像何應欽一樣瘋狂地反共，却嫌惡何氏，並且在戰時不准何氏干涉他個人所管的戰區。甚至錢款、軍需和人事問題，胡宗南也都直接聽命于委員長。他的部隊軍餉比中國任何其他部隊都充足。

黃埔派另一個領袖陳誠，也是陸軍中何應欽的對敵。陳誠大概是美國最喜歡的中國軍官。他是一個瘦個子，身材只有五尺多一點點，他的頭髮在一年年地灰白。他在戰爭初期，高高在上，很得蔣委員長的寵信，其時也和中共能合得來，但漸漸地退爲微末的前線指揮官。他在戰爭中期的任務爲保衛長江三峽。一九四三年，美國人把他調升起來，成爲中美共同訓練計劃的指揮官以及怒江前線部隊的指揮官。陳誠升任此職，激怒了何應欽，何氏

看到他的對手由於美國的供應品和裝備之助，變成了軍隊中最重要的人物。何氏一怒之下，使訓練計劃遭受了破壞，使怒江前線補充兵到得非常緩慢，使參謀總部發餉給陳誠指揮下的部隊時十分慳吝。直至何氏逼迫陳誠下了台，換了一個比較馴順的軍官來主持美國訓練計劃，這計劃才算一帆風順。

何應欽也好，胡宗南也好，陳誠也好，都對委員長必恭必敬。他們在戰界上意見得難得一致，但這三人委員長都喜歡。委員長一個一個地輪流加以撫慰排解，雖然，他總讓他的參謀總長何應欽保持最高的威信。每天出入於委員長辦公室的，是何氏；最高計劃和各地視察，也是何氏的責任。甚至何氏周圍掀起了浪潮，部隊的腐化和無效率變得顯而易見，而美國人迫使陳誠上台代替何氏擔任軍政部長之時，何氏依然是參謀總長和軍隊裏的最高人物。

上述三巨頭之中，國民黨的組織家和國民黨中央派的領袖陳立夫，輕而易舉地成爲最出風頭的人。他有一張精緻漂亮的臉，眼光如火，頭髮光滑而作銀白色，他柔嫩得像一塊古老的象牙。他是一個無情的，怒火如狂的人——有紀律，無慈悲，不貪污；他反對外國人，他是一個神秘的民族主義者；他沒有個人財產，也沒有人罵過他貪污。蔣委員長和陳氏的關係淵源很久。蔣在上海貧窮時節的第一個恩人，是強有力的愛國家陳其美。陳立夫是陳其美的侄子，由於上述淵源，陳立夫幾乎是委員長的貼身衛士。一九二七年大舉北伐時，陳立夫爲其私人秘書，後來蔣指派他爲國民黨組織部長，以清除黨內一切自由主義或共產主義色彩的份子。

陳立夫會用情感豐富的辭令來解釋他自己的立場。從他看來，中國最大的危險是共產主義。他認爲共產主義是外國對中國思想的一種侵略，他是國民黨內偉大的理論家，他的作品是半生半熟，一半理智，一半神秘的大塊文章。美國人是不可能懂得這些作品的。他以消除不合于中國古代傳統的一切東西，作爲自己的大業。他認爲西

方的工業可以移植到中國的古社會中，而不必擾亂中國年深月久的禮儀和習俗。他像日本人一樣看西方，覺得西方是一種劣等文明，具有現代社會中很有用處的若干野蠻的詭計。他的態度，和西洋旅行家觀察澳洲森林人揮擲飛鏢或非州人投放毒箭時的態度相同——認爲這些是應該研究的有效辦法，但是傳殖這些東西的文化則並無可學之處。另一方面，陳立夫以抒情的情調，欣賞着中國過去的偉大，並且用詩的詞句來解釋中國革命和美國革命的不同。他說，美國人不得不發現新的真理來建國，但中國人只消向後工作，去重新發現舊的真理就行了。他對人們罵他是反動派深惡痛絕；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十字軍，正在設法把中國從共產主義中救出來。國民黨集中營內受苦受難的人們的狂叫之聲以及他的秘密警察加在自由主義者身上的恐怖行動，都不能擾亂他的清睡。

由此可見，只通過傳統的古典主義來看自己國家的一切中國人，可以陳立夫爲代表。中國的古典著作把最基本的重心，放在社會的秩序和安定上。統治者必須聰明，而人民必須服從。古哲學家們已爲每一個人制定生活的位置，誰都不能逃脫這位置。各階級之間的關係是有規定的，政府的作用，就在於使每個人按照他在社會上的地位作事處世，古典著作依然是拖在中國思想後面的重担。縱然現代教育到處風行，中國成千成萬的半通不通的公民，依然把古老的繁文縟節當作社會的準繩，很像美國本源教派以聖經爲個人生活的準繩一樣。陳立夫很能象徵這個相信中國過去的基本信念。中國古典主義的保存者鄉村貴族中，除了陳立夫之外——此外也許除了蔣介石本人之外——再沒有產生什麼人物，擁有強烈的確信，足以抵制現代世界的侵入的。陳立夫和其他大部份神秘主義者不同，具有兩個實際用處極大的條件。一方面，他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受過結實的技術教育，他曾在該校學作鑛工程師。另一方面，他手頭掌握着一個野蠻的工具——秘密警察。他是個兩重性的人。他以人和神仙的語氣說話，他是一個中國古文的能手，他是個精緻的書法家。可是他也能夠捲起袖管，和中國政治上最厲害的角色面對面坐着討價還價。

作爲中國戰時的教育部長，陳氏可以隨便製造中國人的心。許多大學曾在長途跋涉遷入內地時寫下了學術上的史詩和冒險史；但是這之後，以知識方面而言，是每况愈下的。學生和教授都餓着肚子。通貨膨脹使講師變成乞丐。中國青年的精華已在抗戰初年投身於戰爭；在北方，他們參加共產黨，在華中，他們成爲國民黨的官吏。繼他們而作學生的是一批雜亂無章的人。按照法律，中學生和大學生都得免除兵役。學者比軍人更有面子，也更需要。於是入學人數驟然增多。學生之中有些人，也許大部份人，是愛國的。可是政府教育他們很少，也不大替他們找事情做。陳立夫吹牛皮說他會使學生的興趣從文科轉到工科。戰前中國大學生讀文科者將近佔百分之七十，在陳立夫的領導下，減到百分之五十左右。這個教育重點的轉變，中國各地都沒有什麼爭論，一個作戰中的國家自然需要工程師比教授多。但陳氏並不以此爲滿足。他在政治知識的科目如歷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上面建立了一種恐怖統治。大學裏禁止討論政治。學生偵探着自己的先生。學校教職員彼此互相偵探着，猜疑着。

自由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以及一般批評政府的學生人數之多，使國民黨吃驚。國民黨於是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作爲該黨的初級組織。青年團踏進了學校。它的經費是政府供給的。一年之內，團員有五萬人。教授們哭泣着學校給毀了，因爲青年團團員功課不及格，不可留級。這青年團的思想和表面都是法西斯主義的。它喊着崇拜領袖。它舉行夏令營，在夏令營內，精壯的青年男女操演着，吼叫着德國化的『萬歲』，捏緊拳頭致敬禮。在學校裡，青年團威脅自由主義者和過激份子，要他們不出聲，要他們明白青年團後面是有政府全力支持着的。

陳立夫說他主張學術自由，但和他意見不同的教授們一天天瘦下去，挨着餓。他們講話十分小心；他們的教室是危險的。中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是馬寅初教授，他是一個有趣的人，曾在耶魯大學畢業，有一時教過蔣委員長經濟學。馬教授在學校裡講授了通貨膨脹的道理，這個題目越來越使人發生異乎尋常的興趣，而且不可避免地觸及政府。有一天晚上，馬教授被邀至蔣委員長處吃飯。他踏進了派去接他的汽車之後，前座兩個衛兵道了一聲

對不住，說他是被逮捕了。他在集中營裏和警察看管下過了兩年。但陳立夫堅持說，這不算破壞學術自由，因為馬教授名義上是個國民黨員，他曾公開批評黨的政策，這破壞了黨的紀律，因此他應受責罰。

陳立夫領導教育部，好像帶領一支軍隊。國立大學裏反對他的教授們到了毒，設法和他一致的人則風雲得意。陳氏建立了劃一思想的軌道，這和現代中國教育的整個精神是完全不符的。政府已經審完了一切課程的教科書，這些教科書成爲初中至大學的思想的標準。戰前的教科書舊了，給新的教科書代替了，於是中國四方各處的學生，開始呆記着相同的字句。陳立夫覺得遲早之間，全中國都會研讀同一套的思想規程，學習同一套的禮儀，而這一套一套，都追隨着他自己的想法。陳立夫的知識上的偏見，和他的美國黨棍子一樣的組織天才同時並進。他設法使自己的人担任重要職位之後，一定弄得他們服服貼貼，經常用自己指揮的秘密警察檢查他們的忠實性。

在戰爭的中間幾年，陳立夫跳得極高。他的檢查制度使新聞界、戲劇界、和文學界在他的指令之下輾轉呻吟。由於戰爭的真相和虛話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檢查官們爲免除政府的煩惱，就把真相壓制不給發表，而創造了一個神乎其神的中國。一個CC所指派的宣傳部長曾頒發一個正式指令，命令一切作家應該避免現實主義和悲觀主義，應該寫作愉快歡欣的事情。有一張長長的表，列舉了禁止發表文字公開討論的許多題目，其中包括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問題，中蘇關係，動亂中的新疆，對美國或英國的批評，政府的貪污，前線部隊的痛苦，對農民的迫害等。分析稅項，批評政府財政政策，發表預算或通貨發行數字是禁止的。批評政府任何人員的爲人，家庭及行爲，是禁止的。甚至談談物價之高漲，也是禁止的！

蔣介石左右的三執政之第三人，是孔祥熙博士。孔氏是蔣委員長的大姨子的丈夫。他担任着中國的內閣總理，直至蔣的小舅子宋子文於一九四四年繼任他爲止。他是個圓團團的人，面部柔軟，拖着一個多肉的下巴，這使漫畫家非常高興。他是孔夫子第七十五代直系子孫，這是一樁光榮的事。他在約六十五年以前生在山西一個開鎮

號的家庭裏，曾在山西教書，留學美國，在耶魯大學得到學位，回國變成了革命家。他在參加政治之前，投了一大筆資本，担任美孚油公司的山西代理人。他的高升，開始於和中國獨一無二的宋家結親之時。宋家的小女兒就是蔣介石夫人，二女兒是已故的孫中山的夫人，大女兒就是孔祥熙夫人，大兒子是宋子文。孔夫人大概是宋家最精明的人。在她的絕非溫和的慫恿之下，她的丈夫變成了中國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孔祥熙於一九三〇年被任爲實業部長，一九三三年任中央銀行總裁，戰爭開始時任內閣總理兼財政部長。他成爲委員長的代表，處理着高妙的所謂政府的機構。

戰爭的歲月對孔氏並不太仁慈。他們家人在香港或美國玩耍的時候，他獨自住在轟炸之下的重慶邸宅裡。他染了瘧疾，得了脾臟病，這使他的個人生活十分苦惱。他是一個和氣的人，他不喜歡吵架或危機，他幾乎能够以一個微笑或一個如泣如訴的故事，撫慰任何事情。他是美國實業員作高壓力的鬥爭時所喜愛的目標。他的最大的願望之一就是被人喜愛，而和他相熟的人覺得他這樣可愛，以致叫他作爹爹。他是中國青年會的偉大的贊助人。如果作青年會工作，他也許早已獲得了他的飢渴的靈魂所渴望的愛情。不幸地，對於爹爹，權力政治和青年會的規範絕不相同；孔夫子也幫不了忙，而在爲國家的事業辛勤服務了七年之後，爹爹終於取得了中國第二最壞的名譽。中國人是具有世界上最尖刻的幽默感的人，喜歡當堂出采的事情。他們這位內閣總理的體內的性格，他毫無定見地主持着的瀟灑了貪污和游移空氣的內閣，他的周圍卑躬屈節的諂媚份子所組成的親信集團，都象徵着老百姓眼裏看到的國內一切荒謬的腐化。

對孔的批評，在重慶成爲戶內流行的遊戲達五年之久。這些批評既針對個人，也有政治作用。孔氏對於個人各方面的事情非常敏感。有一次他問一個美國人，人民怎樣說他，那美國人回答道，『是，人們多半說你被拍馬屁的人欺弄，說你一家人貪污得可怕。』孔氏想了一下說道，『不過拍馬屁拍得誠實與否，我是明白的。』對於

孔氏其家人的個人批評常常走到遠離真相的荒唐地步。孔的一個朋友說，這些謠言之中有百分之九十不是真的，但『百分之十其實比謠言還要壞。』

孔的兒子孔令侃，在廿二歲的時候就被任爲中央信託局局長，那是政府的主要購買機關。這個年輕人不論在天資方面或訓練方面，都不配作這樣的事情，而他的行爲是無法無天的。

孔府的女性方面並不更好。孔的小女兒（*Jeanette Kung*）是出奇地傲慢的。當美國政府用一架（*C-54*）式機把蔣夫人和孔二小姐送回中國的時候，飛機飛越喜馬拉雅山到達中國後，只剩下回程的汽油。孔二小姐下令給美國地面人員把飛機翼裡的油箱倒乾，因爲她自己要這點汽油；美國陸軍人員自然拒絕，她就大怒。當孔的大女兒（*Rosalind Kung*）飛到美國去結婚的時候，她父親徵用了一架國家航空公司的飛機飛越喜馬拉雅山替她運嫁粧。孔夫人直至珍珠港事變時止，一直住在香港；這之後，她在重慶稍稍逗留了一下，就在一九四三年飛到美國去和蔣夫人一起住，一直留在外國。她是個對於金錢感覺極強的女人。和她在上海紗布市場中的秘密活動一樣，她另一樁財政活動是普通的商業航空員。但是她的大買賣如操縱外匯等，是商業史上大事件，不過這其中包含着的巧妙事實，只有這位財政部長太太自己明白了。孔府一家人的行爲，使慘痛中的民族啼笑皆非。孔自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不喜歡笞刑、集中營和暴力，而在外交事務上，他主張親近西方民主國家。使陳立夫成爲如此危險的罪惡性格，他一點也沒有；可是中國人民看到他是一張滑稽的諷刺畫，和他們從事戰爭所爭取的東西成爲強烈的對比，因此他們恨他。

對孔的政治上的批評，同樣地尖銳。蔣委員長是行政院長，政府的最高領袖。理論上，他的副手是担任行政院副院長的孔祥熙，但事實上，軍隊和黨隨自己的高興作事，而孔位置不高，不過是推在前台出場而已。行政院內閣，每星期在重慶開會一次。該院甚至在例行公事方面，都很少實際的權力。委員長餘剩下來的權力，屬於

國防最高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和國民黨中常會。各部長遵從其上級各會議的領導，自己幹自己的，孔管不着，舉個例，孔氏就不能控制當時的外交部長宋子文；外交方面的一切事情，或由宋子文和委員長商酌決定，或由委員長和他的廚房內閣商酌決定。孔無法對行政院中的軍政部長行使權力。他也不能和教育部長陳立夫爭辯。他甚至無法指揮省政府，各省的主席都是委員長親自依照各地的權力和政治平衡的原則指定的。

有時，民衆批評的一陣勇敢的浪潮或美國不贊成的壓力，會偶然地逼得內閣稍加改組。那期間孔氏就一點權力也沒有了，改組內閣的是蔣委員長。而委員長改組內閣的方法，和美國孩子玩音樂椅的遊戲一樣：琴聲一響，各人換坐別人的椅子。委員長的遊戲的獨特之處，是在於椅子的數目總是一樣，遊戲的人數也總是一樣，每個人都不會很久沒有位置。委員長相信的人極少，這極少的人總是單調地輪流擔任着各種職務。如果一個部長因特別醜惡之事而被迫離開內閣，他通常就變成其他機關的秘書長之類，過一時又會重新出現，担任另一部的部長。外人是很難掙足的。

孔氏心腸很好。他頒發良好的命令減輕災荒省份的賦稅，並指撥大筆款項以應臨時緊急的需要，但是他一發了命令，就覺得萬事大吉，他的許多好主意就流產死在重慶。他的主要職務是以金錢供給政府和軍隊。他是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中央信託局董事長，後來又兼任中國銀行董事長。要使中國站在多少堅實的基礎上，就需要蔣介石來決定的基本政治措施。要壓倒囤積穀子的地主，要建立累進稅制，都需要有力的社會領導，那恰恰就是國民黨所壓制的東西。中國人對於稅款的典型態度，反映在政府通訊社下列一則新聞里：『海外部長張道藩氏封翁最近病故，遺產約十五萬元，張氏爲民表率，已自動繳納遺產稅。』

孔氏無法觸動政府和人民相遇的重要關鍵——鄉村征實稅。收稅員一大羣，共約三十萬人，通常是地方上委任的。政府的威信，就依靠這些收稅員剝削榨取的能力。孔氏另尋了一條容易的路子：印鈔票。中國的通貨發行

額自一九三七年的十五萬萬元增加至一九四六年的一萬萬萬元。物價隨着通貨上升，至對日勝利時，物價比戰前高了二千五百倍。人民爲了通貨膨脹罵孔，經濟學家們私底下嚴厲斥責他。他却不過聳聳肩頭，不憂不急，信任着他的印刷師傅。只要他能够生產足夠的錢款，蔣、何和陳都會高興他的。他用嚴格統制外匯的辦法，維持了美金一元等於中國國幣二十元的空架子的滙率。這個滙率和實際無關，在他當政之時，黑市滙率高至六百對一，後來又上升至三千對一。孔氏堅持說，只要官定滙率維持着，就沒有通貨膨脹。『如果有人願意用兩萬元買一自來水筆，那是他們的事情，那不是通貨膨脹』。他有一次說：『他們發了瘋，如此而已。』

孔氏固執着維持官價二十對一的滙率，並不是沒有狡猾成份在內。美國陸軍建築房屋和基地時，須用中國國幣支付，他們不能在黑市中以四百、六百或八百對一的滙率來購買中國幣，而須以官價二十對一支付。中國物價飛騰，故美國政府凡有所建樹，其價格也跟着飛騰，直至最後建築一個空軍基地需費美金四千萬元，造一個竹頭的廁所要美金一萬元以上。中國政府以自己的名義存在紐約的美金於是越積越多，而美軍購物時收到的錢越來越少。在美國陸軍拒絕繼續按照這協定行事的時候，中國財政部已積聚了美金數萬萬元。在嚴格的商業意義上講，孔氏爲他的政府做了漂亮的一手，可是長期看來，這是一樁圖眼前利益貪小失大的事情。駐在中國的每一個美國士兵都知道這個敲竹槓的滙率，都覺得美國受了最無恥粗魯的欺詐。我們的兵士對巨大的開支覺得憤恨，而他們在戰爭結束時帶回美國的憤恨之感，在政治上價值之高，決不是中國在紐約所存的金元可以償付的。

孔氏需要幾個好人來做點事情，但是財政上的混亂，使政府中有效率的人員覺得自己在泥沼中跋涉。孔氏挑了蔣廷黻博士，中國最光輝的人物之一，作他的預算局長。蔣氏奮勉從事，審查着彼此吵鬧着的各部會送去的預算。他給CC罵爲粉紅色，被外人罵爲孔的人；而當壓力加諸孔氏，各種開銷往往不得不乖乖地拿出來。蔣廷黻起草了國家預算，那是大家知道的秘密，但任何人都不得公開發表。在這預算之外，蔣委員長有一筆『特別開支

』的個人預算，據說，那數目和國家預算差不多大。委員長常常發高至數萬萬元的大支票，送給他的寵臣，政府銀行於是就得以正式預算的鈔票支付之。至於蔣廷黻自己的預算局，甚至一位閩人到委員長那裡取得了兩倍於該局原來的經費，蔣廷黻還是做不成甚麼事情。政府低級官員的官俸遠落在通貨膨脹之後，這使他們別無他法，要就是挨餓，要就是貪污，薪俸通常是用額外津貼來支撐的，這筆錢要在國家預算以外設法。額外津貼使要員能够生活，使他們的工作比較誠實，但也使他們更其依賴頂頭上司的喜怒，那些頂頭上司也得諂媚自己的上司，一直諂媚到蔣委員長止。

在蔣廷黻之外，有兩個潔白無比的能幹人，站在緊要的位置上。一是翁文灝博士，經濟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一是俞大維將軍，軍需局長。翁氏管理着一批沿海救出來的工廠——煉銅廠、煉鋼廠、電廠等。俞氏指導着兵工廠，以槍砲子彈供給中國的部隊作戰。俞氏得到的錢極少，不足以購買翁文灝的材料以生產軍火。而翁文灝要不破產，也不能降低出售材料的價格，因為他的錢款也太少。因此，煉鋼廠的機器只有百分之二十轉動，製造軍火的器械躺在防空洞裡不動，而前線士兵因為缺乏軍需品，對孔祥熙以下的人誰都咒罵。

當經濟危機使生產只好停止的時候，在一個嚴肅的會議席上，孔祥熙認真地建議叫軍需局長在兵工廠里生產香烟製造機，把香烟製造機賣掉可得大利，然後用來製造軍火！這政府就是這種樣子的。

第八章 人民擁護蔣介石嗎？

任何觀察家都可以看到，這幾年戰爭對蔣介石是够仁慈的。他臉上的紋路沒改動過。永遠是白淨的，永遠是裹身在一副嚴謹的甲冑里，彷彿恐防大家細察的好奇心侵犯他的人格，所以要保存得穩穩當當似的。在很多羣衆集會的場合，他都只講幾句短截的，用高亢的浙江口音聲發放出來的話。沒有人見過他爲可愛的人羣中閃爍着的感情而激動過；也沒有人見過他在起伏的歡呼聲中，除却徐徐微笑，或頻頻點頭以外，會有其他的動作。

只有在感情震動得最厲害的時刻，他才會在公衆面前把自制的鐵幕稍稍揭開，讓人們看出其中的真面目。一九四五年八月，蔣安靜地坐在重慶的一家擁擠的無線電台里，等着向中國的人民宣佈戰爭已經結束。他像他向來那樣，非常專注地裝扮過。頭修得乾乾淨淨，沒一根細毛可以洩露秘密，証明他的頭髮在轉灰色。他的卡幾上衣毫無污蹟，也不加什麼修飾，緊緊地一直扣到喉頭，腰束着一條珊瑚勃朗式皮帶；自來水筆則夾在口袋上，室內很熱，二十多個人都溜汗了；只有委員長像覺着涼快。他更爲動動他的玳瑁邊眼鏡，斜睨一下放在他面前桌上的紅花，再慢慢地轉過來對着麥可風，用他清幽而高亢的聲音對人民說，勝利已經贏得了。他講話的當兒，屋外的播音機便把消息傳出來；羣衆認得那輛引人注意的汽車，開始集中在石屋的外邊。他可以聽到微弱的歡呼的聲音。

蔣在十分鐘內便講完了。然後，突然地，他的頭垂低；濃黑的眼下，眼皮因睡眠不足而顯得腫脹；瘦削的身體的各部肌肉，也因極度枯竭鬆弛下來。一剎那間，他的穩靜的外貌像給什麼刺了一下，疲勞與力乏在勝利的時刻突圍而出，把真人畢露。但這種心境一來又便溜走了。於是他便步出廣播室，經過人羣時，微笑着不時點頭，然後迅速趕回家中。看看他通過羣衆下樓梯到汽車上去的人，沒一個能知道他剛剛在民族敵人失敗後，便在同一晚要發動全部機器的齒輪，使國家重新陷入內戰泥沼的人。

蔣個人的自制，是使人明瞭他那複雜而含蓄的性情的最重要的一條線索。這性格是由一種暴烈的，風雨飄搖的生命來的，而且，正如他的權力的貪慾，他的無情的計謀，他的無比的頑固一樣，已經不只成爲一種個人的特質——而是一種國家政治中的力量。蔣的性格反映出中國歷史上最騷亂的五十年，它同時又歪曲了它們。

約六十年前，蔣介石生於一個浙江小農的家庭，那家人是屬於村里統治的一羣的。那時候，中國正進入一個史無先例的混亂而多災多難的時期。他的童年是很不愉快的。他五十歲生辰時那樣寫道：『余九歲喪父親……當時我家淒慘情況，非筆墨所能形容。余家孤立無勢，即爲他人諸多侮辱及虐待……若非余慈母艱苦支撐，家中即不免完全破產。自余九歲迄廿五歲，十七年之久，余母無一日不料理家中煩瑣之事。』

在蔣的童年時代的中國，政府外國勢力的加緊壓迫，每次都作讓步。蔣看到了民族的危難，大爲感動，乃立志做一個軍人。他在日本受了短期的教育，回國後，參加中國第一間在保定設立的軍校的入學試。他考得很好，取錄了，並且在一年之內，成爲校內的一名卓越的生員。他是保定軍校一九〇七年選送到日本受訓中幾個人中的一個。在日本，他不久便以士官學校學生資格被選拔到一個日本野戰炮兵團去服務。他不喜歡日本，後來他對當時在那裡的工作大加譴責。但是他可喜歡軍隊生活的。有一次，他對一羣不大願參加他的軍隊的中國學生說：『當我年青的時候。我決定要去當兵。我一直相信，參加軍隊是人生的最高的經驗，也是革命行動的最高形式。現在我所有的經驗、學問、精神和人格，都是從軍事訓練和經驗得來的。』

他在日本的時候，像其他有思想的學生一樣，受孫中山的新的強大的中國的啓示所激動。一九一一年，他回國參加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的革命。這第一共和國後來證明只是一種笑柄，他就跑到上海去；他在那里到底幹什麼，是一件衆義紛紜的事，因爲官方的傳記都急急忙忙地畧過了他這段時期的生活。雖然，人們知道有一個革命家叫陳其美的幫助他，這個人是陳氏兄弟的叔父。一九一五年，蔣參加了另一次奪取上海附近的江南製造局的

苦迭打。事後同志們——這些人現在仍然是他的親信——都逃亡出國，只有蔣隱居上海某處的陰暗的下層社會里。其時他的生活忙碌，艱苦，面臨着危險，飢餓和人們的遺棄；後來他又當了短期的小書記，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工作。那時候上海的下層社會是衆所共知青幫天下，青幫控制着全市買賣鴉片、營娼和勒索諸業。它起源於城市裏，幾世紀以來一直是中國盛行的秘密結社的一種。這樣的一種團體在西洋是沒有類似的；它在這個大而亂的都市的貧苦下層中植了根，看到合適時便打發它的打手，用暴力來保護它的顧客。這種有組織的勢力，甚至比警察還有力量。他們是激烈的暴徒呢，還是毫不客氣的盜匪，是常常不易辨別的，他們在這兩個世界中隨便走來走去。沒有傳記家能準確地將尋出蔣和青幫的關係到底到了一種什麼程度；但每個有見聞的中國人都不會否認他們之間確有關係，中國革命的歷史也不能不記載下，每次上海有危機發生，青幫總是支持蔣的。

從上海的霧裏走出來之後，蔣介石便大踏步向前，在廣州投身到白熱的中國的國家政治裏來，時爲一九二四年夏。他到底又怎樣以他從前那種毫無分文，依靠上海旅館老板而生活的身份，達到這樣優越的地位，這點人們也不清楚。短期內，他在一個福建的軍閥底下做事。他在上海的朋友把他薦給孫中山，孫先生便在一九二三年派他到莫斯科去學蘇聯的軍事技術。蔣回國後到廣州，對蘇聯極不信任，但却狡黠地欣賞起一黨國家的辦法來。當日的廣州正充滿新的力和新的觀念。國民黨的領袖爭論着，顛頭着。密謀消釋後，他們重又在政治上聯合起來。留廣州的兩年中，蔣從來不會在一次爭鬧中輸過。一九二六年的春天，他發動了反對黨內左翼份子的，他的第一次成功的武裝突擊；那真是件合時的傑作。孫中山死後，他襲取了黨領袖的職位。

往後二十年，中國和蔣本人都變了，但是他在國民黨內的優越地位從來不會受過任何嚴重的威脅。他現在唯一的慾望已變爲，而且依然是一種凌駕一切的權力貪慾。他所有的政治都圍繞着他的權力的觀念。他是在一個叛逆和暴烈的時代成長起來的。在他之前的同時代的軍閥幾乎對所有的人類禮法的標準都破壞過；他們除了權力外

什麼法律都不遵守，而蔣在這種玩弄權力的把戲上，又比他們都高明。暴亂的幼年教會了他對戰敗者不稍存憐惜之心，而征服者只要他的部屬無損，便會永遠做征服者。當一九二六年他從廣州動身北伐，準備去攫取長江流域時，他已經熟悉了所有的收買人和殺人的藝術。

從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成功到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之間，整十年過去了。在這十年中，蔣介石的這個脆弱而帶深思的面容在中國的生活裏變得愈來愈大，愈有意義了。蔣是很狡黠的！——只有一個狡黠的人才能從暴徒出身，做到一個顯赫和能够和日本帝國爭戰的領袖，而在這上面建立起他的權力來。他懂得怎樣向上海的商業世界吸取金錢和實物的支助；他同時又會使中國幾個最不壞的學者參加到他的政府中來。當他騎上革命的浪頭戰勝軍閥時，便已獲得了權力，浪潮退却了，但蔣又把他的勝利在新的基礎上鞏固起來。他仍然講到國民革命，但事實上包容人民意志的一個革命却避開他了。蔣並不依賴廣大的農民對他的感情，他是依賴軍隊和它的槍枝的。

對日戰爭使蔣介石幾乎成了半個神。戰爭爆發後短期內，他是被目為全中國反抗侵略和爭取自由的意志的具體象徵。又一次，如像他在大革命的時候一樣，他就等於中國——執行着中國的意志，不容譴責，批評，甚或勸告。

用美國人的標準來衡量，蔣的生活是儉樸的。他早餐的時候只吃新鮮水果，烤麵包和牛奶。在外交場合下，他的廚子便給他燒幾樣中國的珍珠，但是在家裏和蔣夫人在一道的時候，委員長只吃很簡單的食品。他不大運動，却愛在鄉間散步，散步時由一隊衛士在周圍保衛。他常常背痛，那是他在西安事變時得來的，之外，他的假牙也不時打擾他。中日戰爭期間，他鑲的那假牙是華西的一個加拿大傳教士給他安上去的；它使他覺得不大舒服，在家裏走動時便把它脫下來。有一次，他只好取消了所有在公共場合露面的機會，因為假牙正在修理。除却這些不重要的刺激外，他的身體是健康的。他常常都像端整而有信心；與人談話時，只有他的腳神經質地顫着，不斷

地從喉頭發出『好，好』之聲，顯出那時常在他心內騷動着的神經的緊張。

作爲領導全國抗戰的領袖，他還是苛刻而無情的，雖然他裝得很神聖的樣子，並且成爲一個虔誠和實行教規的美以美派教徒。他說的話，有如清教徒般的懇擊，而他的兇暴却是舊約中的耶和華。他每天都讀聖經，對於罪惡，他像試驗過它，並發覺它不如虔誠那樣有好報應，而向它緊張地蹙起額來。他不抽煙，很少喝酒。美國官員在正式的宴會上看見過他恢復從前的老樣子，非常熟練地倒起酒來，但在中國人中間，他却是個苦行者。中共領袖毛澤東到重慶會商停止內戰時，蔣舉杯勸酒給他，但只把酒杯碰碰嘴唇。

蔣是清廉的。但是中國人指出，一個要甚麼東西便有甚麼東西的人，是可以誠實得起來的。政府供給他一筆無限制的預算，一大批汽車，無論到那裏他都住最好的房子。美國人送給他一架私家飛機。在重慶他的總部範圍內，他有一所大房子；長江的對岸，還有一所宏麗的邸宅，他常常坐私有的小汽船到那邊。戰爭的後期，他在重慶郊外另一邊蓋了好些別墅，稱之爲自己的「山洞」，把其餘的拿來招待外賓。這些房舍，根據美國的標準來說雖是平平而已，但以四川而論，它便是宏麗的了。其中甚至有鉛瓷磚的浴室。在某一招待外賓的別墅——後來赫爾利去拜訪過的——工人把進門大路直鋪到浴室的門前，這使得他們大爲驚愕。

現在，統治着中國的蔣是高於所有的平民的。有一種謠言使他非常激怒。這是他早二十年前也不願意聽的一種謠言。重慶曾經傳播過一個故事，說是蔣夫人不在家時，委員長和一位姓陳的女護士同居了，她是給他燒家鄉菜的。這故事是沒什麼根據的，可把蔣氣壞了；他召集了他的副員，外國使節，和兩個記者來，當着蔣夫人的面前宣稱他是信仰基督教的，他只愛他的太太，他完全否認那謠言的真實性。即使在軍事大潰敗的最危難的那個月中，這次花園懺悔依然是重慶人談話的頭等資料。委員長闢謠的半官方的抄本如果你要的話，也能從政府那裏得到。

新生活運動是將把他個人成熟了的信仰和愛好加諸人民身上的一種更自動的方法。新法活運動反對奢侈、抽煙、喝酒、跳舞、鬚髮、賭博、在街上吐痰等。警察常常要人家遵守這些規律，他們不讓路人在街上抽煙，告訴人不要把菓子皮丟到陰溝裡。這類突發的虔敬不久便成爲過去；在高級官場中，它被看做是蔣個人的弱點。雖然蔣夫人很喜歡抽煙，但委員長却最反對西式的浪費。重慶是直到一九四三年才舉行舞會的，因爲那時美國駐軍那慶，以致禁例無法再實行。中國人在不是陪都外國人的場合，仍不得跳舞；有一次一家私人的房子因跳舞被搜查，最後的一個美國兵離去後，客人都被抓起來。

沒人曉得蔣介石在對日戰爭中究竟把持着多少個職位。有一次他的秘書說他至少身兼八十二職；那秘書以爲從別處可以得到一個完全的表格，但他從不曾編好一個。宣傳部做過一個，但是不完全，其中說到蔣介石是：國民黨的領袖；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海陸空軍大元帥；中國戰場最高統帥；國府委員會主席；最高國防委員會主席；中央計劃委員會主任；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主席；新生活運動社的領導人；黨政促進委員會主席；中央訓練團團長；革命先烈遺族學校校長；全國滑翔協會的主席等。（註）

首先，蔣介石以爲他自己是個高明的軍事領袖。但雖則他是領導全國作戰的軍事領袖，他可不是個戰略家，一九四四年魏德邁亞將軍來華時，發覺中國士兵泰半處於飢餓狀態中——不是營養不良，而是實在的飢餓，而蔣氏守也好，攻也好，都沒有有效的全盤計劃，不禁大爲震驚。對於估計日軍或在日軍攻勢未到達之前事先移動部隊去防守，蔣都是不很行的；他總是在戰場已開闢後才派遣部隊跋涉千里到前線去，這就不能完全說是因爲日軍有機動的方便了。美國的官員在總結他的戰事時那麼說，「對聲東擊西這種戰畧，他還是個乳兒呢。」

蔣又以爲他自己是個好軍人，但他真正的天才却是在政治方面。自古相傳的討價還價的技藝，沒有人及得上他。他是平衡勢力的大頭目，他把中國統一，並保持着它的統一。如果他的士兵肚餓，那正好，因爲這樣他才能

出價錢，使那些不可靠的將官效忠於他，他們是以士兵的死亡來獲利的。如果給他送上戰場的士兵在沒聽到槍炮聲之前便死去，也是一種使或者會向他挑釁的司令官的力量減削的好方法。

蔣是個政客，應用勢力比應用觀念要多得多。中國的任何觀念，只要和他的不同，便被視同仇敵。無論在黨內或在政府內，他堅持着人人都要完全無條件地效忠於他，儘管你誠實，有經驗和能力，你不能缺乏這一資格。又因為忠心包含着投合的意思，蔣便成了個聖人。照中國的傳統看法，學者是最受尊敬的，而在中國人眼中，大統治者便是個最偉大的老師。蔣的公共演說開始有點像教員管教他的學生一樣；他三翻四覆地說，『要忠心；努力學習；努力工作；愛你的國家。』每一國家大事都是他決定的，於是他慢慢相信起自己的學問和判斷來，以為自己比他任何一個下屬的人都強。

(註)此外，他還同時兼任着航空委員會委員長，中央政治學校校長，中央軍官學校校長，中央警官學校校長，空軍幼年學校校長，陸軍大學校長，四行聯合總辦事處處長，僑華捐款保管委員會委員，中國航空協會主席，全國精神總動員委員會主席，中國空軍學校校長，國立中央大學名譽校長，中央青年幹部訓練團團長，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中國紅十字會名譽主席，中國童子軍協會名譽會長，中央憲兵學校校長，騎兵學校校長，砲兵學校校長，工兵學校校長，軍需學校校長，機械化部隊學校校長，通訊兵學校校長，西北特別武裝聯合學校分校校長，特別武裝幹部訓練團團長，幹部特別訓練班主任，中央幹部訓練團團長，西北游擊幹部訓練團團長，西南游擊幹部團團長，輜重學校校長，兵工技術學校校長，軍醫學校校長，獸醫學校校長，測量學校校長，憲兵訓練學校校長等職。曾有多次，他兼任過行政院長和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等職。

通貨膨脹成爲中國的最大問題時，有一位政府的高級官員譏刺地說，『中國的困難是在於委員長一點也不懂得經濟學，他的財政部大臣也是一樣。』但奇怪的是委員長却寫了一本經濟學的書。那是一本空虛而又含糊的書，充滿了無知的理論，連他自己的御用學者都要受不住；在政府里頭的較聰明的人，便大膽胆子把這小冊子收回來，不讓它散播出去。由於禁售，反而使得它成爲收藏家上乘的資料。一九四二年的秋天和一九四三年年初，委員長在他的鄉間邸宅化了好些時間來潤飾他的傑作『中國之命運』。那本書大部份是他一個私人秘密寫的，可是其中的意思和最後的註釋倒是他自己的。這是一本無所不知的教本，包括了中國人的人類學、民族的歷史、和它未來的復興。他的顧問先生們看到他對現代中國歷史的解釋非常驚訝，因爲那是惡意地、不分皂白地排外的。他把民國初建立時的軍閥橫行、賈淫、私運軍火、抽鴉片、盜匪叢道以及一切殘暴的混亂，一起歸咎到外國人身上；他甚至爲外國傳教士和他們所創設的大學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而悲嘆。這本書在沒有『撤回修改』之前，已售出約五十萬本，關於修改，『撤回修改』可能是蔣夫人堅持使然的。同樣地，即使因爲新聞檢查使任何外國記者都不能獲准從書裏引用他的話語，它也成了蒐集家的好材料。

政府、軍隊和黨都成了他自己的私有領地，蔣的好奇心和狂想於是也降到了最低的水平。有時候他大聲聲罵，有時候他處罰人家，又有時候他教訓人家；再繁瑣的小事他也有興緻去作決定。他去看完了重慶出產的戰時唯一大影片，范士白的驚人作品譯成中文的『日本間諜』試映後，立即把片子送回電影公司，他個人的訓示是要片中多加插國民黨的事蹟的鏡頭。宣傳部長有一次穿了長衫去謁見他；蔣說宣傳部長太年青，不該穿舊式的長衫，也該穿西服才對。蔣決定誰該去美國，誰不該去；又決定官辦的新聞學校畢業的學生誰該取得學位到外國留學。國立中央大學的學生埋怨伙食不好，委員長便跑去那兒和他們共餐一次；他說伙食已經不壞了。

他的部隊在曼德里北部作戰的時候，他致電給史迪威將軍說，『我聽說曼德里區西瓜很多。中國兵喜歡吃西

瓜。你看是否可以讓他們每連每天吃一個。」他向前線的將軍發命令，硬要他們辦些無關緊要的瑣事，毫不顧及中國交通的極端困難。每天他讀重慶的報紙，記下一些使他高興或使他不快的小東西來。史迪威將軍被送走的時候，委員長要人把所有外國記者的通訊都譯成中文，由他個人來加以檢查——全無遺漏。他的命令有時寫在小紙條上發出；有時發出後他又忘記了，以致互相矛盾。比方他初時寫的是：『本年各省政府徵實工作務先辦妥，』但不久另一個命令又來了，那是：『續征新兵爲本年各省政府之首要工作。』

在外國人看來，他外表的謹慎證明他的穩重，這是一種在一個瘋狂的社會裡的相當有理性的品質。但是有時候，蔣也會從他那無表情的鎮定一變而爲盛怒，他會捧茶杯，捶桌子，尖聲地叫喊，像一條兇猛無比的毒蛇。要是他碰到一個稀有的不甘在他面前示弱的人物如宋子文的話，結果必定是很富有戲劇性的。一九三五年，蔣宋曾激烈地爭論過關於中共的問題，結果是宋在以後的若干年都不得干政。一九三八年，英國大使卡爾爵士設法使他們會談；這一次和前幾次一樣，亦以爭吵結束。一九四四年初，蔣再遇到宋，後者失勢的放逐又被延長下去。一九四四年夏天，蔣正在鄉間散步，看見一個官長領着用繩索捆在一起的壯丁走過，大爲震怒，他痛打那官長，要非有個衛士去把人救過來，便不得了。於是，他也想起中國抽丁的可怖，立即召見了主管的將軍，一點也不留情地鞭打他；第二年的春天，那位將軍明正了典刑。

受過西方訓練的高級官員們都曉得委員長不是一個能幹的行政官。在私人談話中，他們承認他的許多錯誤，但常拿他這些地方和他的唯一的大優點來比較——這優點是他要繼續作戰到日本被擊潰爲止；其他的人或許失望了，疲了，但他就是中國，他是從來不逡巡的。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那樣保持着中國政治上的平衡，安排得很好，同時依然繼續抗戰。他打發他的軍隊去，一齊打敵人，好讓他們不來打他；軍閥們都給他那些機巧的委任方法撫定下來了；不喜歡他的人也支持他，因爲他被世界公認爲外國對華貸款和供應的正當的承受人。他利用地主對他

的忠心，來控制鄉民的無比的不幸，他答應實行改革，來避免美國的壓力。

一九四〇年夏，士氣降到最低點。一切都不如意。日本人日夜來轟炸，晴朗的天色，帶來敵人的飛機，也晒乾了田裏的稻，帶來飢荒。日軍當時在越南；美國政策還猶疑未定；英國人則宣佈封鎖滇緬路。蔣大聲叫出來了：『你們打算盤吧！你們算算我們有多少軍隊，有多少發彈藥，有多少加侖汽油。但是我可不在乎。十七年前我開始的時候才有軍校的二千學生。那時美法英日都反對我，共產黨也比今日更強大。我沒有錢，但是我向北打败了軍閥。我統一了全國。現在，我有三百萬人馬，半個中國，而英美又是我的朋友。讓他們來吧，要是他們把我趕到西藏，五年後我要回來，並且再征服全中國。』在蔣看來，這是他的戰爭，他的敵人和他的責任。他並不是回顧三年前開始的對日戰爭，而是回顧他個人發蹟以來的十七年。中國，就像從前廣州那小小的軍校一樣，他看做是自己私人的。

對於唯一的一羣他不能控制的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人，他的感受也是個人性質的。只有中共有組織，不能服從他。他們有自己的地區，自己的軍隊，蔣的勢力把不住他們。他們公然反抗他；所以，在他心目中，中共不忠於中國，他恨他們。一九四一年他說過：『你以為這些年我不讓日本人擴張是最重要的嗎……我告訴你，不讓共產黨擴大是更重要的呢。日本人只是皮毛的病；而共產黨却是心腹之患。他們說願意支持我，但暗地裡他們要把我傾覆。』他的戰爭是個人的戰爭。對中共，他記得清清楚楚，就像他在中共長征時最後一次看到他們一樣。他會命令他的機師幾小時地駕駛飛機追隨那漫長的蜿蜒的道路，那中共的長征將士飛越過的小嶺道路，好使他能下望監視着他們。

要說出什麼時候人們對蔣的領導的忠誠開始崩潰，是很困難的，但重慶的軍閥和各地的農民幾乎是同時生離心傾向，這點却無疑問。一九四三年年底，各戰地司令長官的總部里公開表示對他的不滿，其中好些曾和蔣在過

去的內戰中交過鋒，這次肯服膺他的領導，也不過因為日本人的威脅更大而已。在西南，兩廣的將軍們對蔣時有不平之鳴，並且毫不隱藏他們的憤怒，讓它傳出他們自己營盤外去。當他從前是另一個戰士時他們已認得他；在他們看來，他不是個紳，而是個該幫他們找錢和接濟他們的同夥。對西北、四川、雲南、新疆的獨立軍閥，蔣是用名譽爵位作酬報來籠絡住他們的；他聽任他們去發不義之財，私運鴉片煙也好，乾脆的雙重稅制也好，只要他們肯履行他補給丁來補充軍隊，和徵收來完糧的要求便得了。蔣和這樣的敵人作戰多年了，他懂得怎樣去操縱他們。

一九四四年，人們對蔣的批評顯然傳染到重慶來了。甚至那些把蔣看成是中國的活的化身、是潰敗流沙中的岩石的人，也認為這位『老先生』不無過失——認為他也像其他的領袖一樣，有很多值得批評的地方。一種愈來愈厲害的反蔣的情緒是：中國比蔣更重要，而蔣本人却是癱瘓的中心點。有這種看法的人相信，蔣的政治平衡法和委任術損害了中國的元氣，因為他不能平衡腐化、反覆、和勒索，來獲得力量。力只有在人民中才能產生，而蔣的聯盟却是把他繫在和壓迫人民的人一起。蔣如是他憤怒的藥瓶全倒在這群黨內和黨外的沒有組織的批評家身上。不論你多腐化，他都和你處得來，只被尊重他像他尊重他自己那樣；誰若不肯接受他以自己等於中國這公式，便會被目為無賴漢，便要把你搜索出來，交給他的秘密警察用恐怖手段對付。有些恨蔣比愛中國的心更強的人，投降了日本人；其餘的要到外省去找一個隱蔽之所，幹私人的事，或者轉到單調的官僚政治的低層去。無論如何，除掉很運氣的幾個以外，其餘的人全得當心他們說的每一句話。

有權利說話的幾個，有些是國民革命中極有聲名的人。慈和的孫夫人，國民黨首創者的未亡人，說話有鋼鐵般的勇氣。她從不公開攻擊蔣，但她也不隱瞞她對國家現存的腐敗和分裂的情況表示痛心。她依然保留着昔日國民黨賴以得勢的所有的革命意識，她悄悄地支助困危中的自由主義者和民主團體。孫科博士呢，他要講什麼話

從來不猶豫，對蔣當面講也好，在公共場合講也好；蔣可以從外國和本國的新聞中把它的控訴檢出來不准登，但他止不住他說話。宋子文也是太胆子大，太突出了，簡直就嚇不住；要他不說話，除非又把他接回來當權。

一九四四年連農民對蔣介石政府也有表示了。在每個村子裏，他的相片高掛在政府的辦公廳牆上，他的名字依舊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象徵；但對於在農民中執行他自己意志的人，大家都感到憎惡而且恨之入骨。早在一九四二年，就已有農民暴動滲入省城的消息傳來。這些消息——半是謠傳的，半是真實的——從每個角落傳來，從遠離中共影響的區域傳來。在國民黨統治下的鄉村，上百上千的鄉村中，散播着不滿。貴州、甘肅、福建、湖北都有民變。四川的鄉下，則有暴動——憤怒的、組織散漫的。無法平息的暴動。蔣活在一個日益暴烈的國度裡；這一類的壞消息使他狂亂了。他的脾氣那麼不定，以致手下的人只敢挑好消息和媚言向他報告了。新聞界是死寂的，鄉間的茶室也掛着牌子：『莫談國事。』

這個個人政府的所有的怪誕的成分中，最不調和的一種或許便是蔣對他自己職務的評價。蔣真正地相信他是引中國走向民主之道的；稱他為獨裁者不免叫他大為生氣。有一次，中共在重慶的首席代表周恩來告訴他說，只有民主政府成立後，中共才會交出他們的部隊。蔣說：『你難道能說我不民主嗎？』

第九章 注定遭殃的中國兵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派魯登道夫將軍去觀察奧國統帥部，他的簡潔的報告後來成爲歷史上有名的佳話：「我們是在和死屍聯盟」。

珍珠港事變後幾個月之內，在亞洲的美國陸軍對於中國盟軍，也差不多得到了完全相同的結論。多年的僵持局面，已使中國軍隊成爲軟弱的、軍心不振的、沒有組織的一大批人，被敵人鄙視，被它自己的人民視爲外人，被它的政府忽視，被它的盟軍嘲笑。誰也不會懷疑中國士兵的勇敢，但中國軍隊本身却並沒有運動力，並沒有實力，並沒有領導。

簡明地列一些數字，要比寫幾本大書，更能說明中國軍隊的狀況。一九三八年，當日軍初步攻勢結束之際，華軍共有四百萬人。這之後的六年間，中國政府每年徵兵一百五十萬人；至一九四四年，軍隊的名單上至少應有一千二百萬人，但當時只剩四百萬人了，就是四百萬人，也還是客氣的說法。其餘八百萬人那裡去了呢？誰也無法確知。這其間僵持的數年中，戰死和受傷的也許有一百萬。其餘七百萬人就乾脆無影無蹤了。他們失蹤了，因爲有些人由於疾病和飢餓而死亡，有些人個別的開小差回了家，或大批的投降了敵人。

中國有徵兵制，徵兵的方法是最簡單和最無情的。中國的徵兵毫無編號，體格檢查或合法免役等辦法。重慶政府決定要多少人之後，就指令每省闔出人數；各省再指令各縣各鄉，於是就開始徵召。在某些區域內，徵兵比較誠實點，但整個而言，辦理徵兵之貪污腐化，不可以言語形容。有錢的人是絕對不必參戰的；各地官員以劃一的公開的價格，把免役証賣給有錢人。任何農民，只要湊得出錢，就可以賄賂避免兵役。最後被抓住當兵的人，往往是最無法離家的人。一區內壯丁拉光之後，就綁走過路人，或從有組織的壯丁販子裡購買壯丁以充數。徵兵

過程中，壯丁有的被殺掉，有的給打傷；有時他們在到達營地以前就餓死了。中國軍隊裡的士兵從沒有假期，從不回家，極難得收到家信。進入軍隊，通常就是一種死刑——死在路上，死在徵兵過程中，死在野戰的新兵訓練處及長途行軍中的人，要比進入軍中後死的人還多。

受訓之後還活着的壯丁到達前線軍中，其境遇比徵時也好不了多少，因為中國軍隊是在戰場上漸漸餓死的。如果運氣好，官長誠實，而且一切都按照規程辦理的話，中國士兵所吃的是米飯和蔬菜。他的口糧照規定是二十四兩米一天，但是十分不足的。米以外的食品，偶而有些青豆蘿蔔之類。更偶然在鄉下購買或強搶些肉吃，吃肉的機會是極少的。美國兵看到中國兵挑着死狗的時候，總是嘲笑他們；美國兵遺失了一只小貓就咒罵，中國兵像狗，是因為挨着餓，而美國人養的肥貓一星期所吃的肉，要比中國兵士一個月內見到的肉還多。

一些部隊緩慢的行軍途中，總在山嶺道上留下許多腐爛的屍首。疾病或衰弱程度不同的士兵，必須繼續和他們的部隊一起奮力向前，因為他們只有在自己的連隊里才能得到食物。倘若他們掉了隊，就得在跌倒的地面上躺下，直至死去。中國士兵裹在肚子里的是碾光了的白米飯，有時什麼菜都沒有，只有白米飯吃。米碾去穀殼的時候失掉了許多維他命，因此軍隊患着西洋教科書上所有的一切維他命不足而引起的疾病，有些病教科書上都還沒有呢。中國軍隊中的醫藥是原始的。中國約四萬五千人中有醫生一人，美國約八百人中有醫生一人。在抗日戰爭以前的三十年間，在中國政府註冊的醫生只有一萬人，這中間有許多人不但是醫匠，其學識等於藥房夥計。這些「合格」醫生中，在日軍侵入後有一半留在沿海地區，另一半是原在內地以及移到內地的人。自由中國的醫生，差不多全部都在私人掛牌執業，或參加政府衛生機關或民間醫院。中國軍隊三百師中，有能力的內外科醫生大約還不到五百人——假如平均分配，一師不過一個多一點。實際上，就是這少數的好醫生也還是集中在基地醫院和後方收容所內，而前綫整師人都沒有一個够格的醫生。

軍中服務的醫生薪俸低得驚人，他們所得的報酬，要比私人執業或民間醫院的報酬低十來倍；他們工作時，藥品和器械極少；軍中痛苦的驚心觸目，無非耗竭了他們的感情，滅殺了他們自己的心理健康，寧願留在軍中的醫生們，享有着單純的高貴和尊嚴的生活。他們想出權宜之計的應急方法，丟開了亮晶晶的實驗室裏所受的一切訓練，集中精力設法使不治之症有些小的進步。但他們之中，許多人弄得精疲力竭，儘速離開了軍伍。總的結果，就使中國一般管理裹傷站和師部醫院的人，要是在美國的話，連藥房都不願雇他們賣蘇打水的。他們對於生理學和衛生的概念並不比村農為多，他們之所以滲入軍醫處，是因為管理醫院和藥材是貪污的肥缺之一。

軍中病症千奇百怪，最多的是由於挨餓而起的病。由於他們的體格被惡劣的食物、失眠以及多年的前綫生活所腐蝕，浮遊着的任何傳染病都極容易侵染中國士兵。軍中有結核病的人大約要佔百分之十。軍隊宿處的擠迫，營養不良，以及許多人用筷子伸進同一菜碗的習慣，都使得採取預防步驟幾乎成爲不可能。緬甸之戰時，中國集結部隊，有一支部隊從廣東前綫開到貴陽，在貴陽經過體格檢查後，被派到緬北前綫去。一般猜測這是一支精良的部隊，因爲它還有戰鬥力，可以重上前綫。但是在五百英里的行軍途中，這支部隊死了百分之三十的人，留下來的『健康者』，經一個美國醫生檢驗，發現其中有肺癆病的佔百分之十五。

痢疾、瘧疾和疥瘡是次要的災禍。痢疾於一九三九年開始在中國軍隊中日益流行。一九三八年中國軍隊內痢疾共三千宗；一九四〇年，實質上前綫人員和武裝兵士人數仍舊，但痢疾達一萬五千宗——增加了五倍。這一萬五千宗中，下半年佔一萬宗，理由是簡單而直截的：三年來營養不足而消損軍隊的抵抗力，到這時突然顯而易見了。中國士兵平時蓄積的體力已降得這樣低，當痢疾襲擊，而他數日內無法獲取營養的時候，他的生命就會像蠟燭一樣消逝。名單上說他死於痢疾，事實上他死於飢餓。中國醫院裡無法處理來就診的全部病人——這種管理惡劣的機關，是恐怖的、黑暗的、堆聚死屍的所在。在美軍接收以前，怒江附近有一所醫院，翻出一間水泥地板的

特別房間作爲痢疾病房，病人向屎就廁在地上，由醫院勤務員用水沖，沖出去的屎，由附近的豬狼吞虎嚥地吃掉。病人每天可以看到死人被抬出去，埋在醫院牆外的山邊。

瘧疾在戰前流行於華南。黃河的汎濫，戰爭開初兩年間軍隊的調動，以及難民的動盪，使瘧疾傳播到極北之處，而使蚊蟲所帶的寄生物，摧殘整個中國。夏盡秋來的時候，士兵們在廣西帶着瘧菌而死去，爛掉。在山西的山嶺裏，士兵們在深秋由於瘧疾而發着抖。受瘧疾之害最深的部隊，是駐在怒江山峽間的部隊。爲了保衛昆明及其高原，使日軍不能沿滇緬路攻上去，怒江前線自一九四二年起就不得不守。

怒江峽谷是橫貫雲南西境的黑疤疤。怒江嘔吐似地從極高之處湧入底下五千尺之處，匯成很淺的河流。羅氏基金委員會認爲該區是全世界三個最壞的瘧區之一。惡毒凶猛的瘧疾，掃蕩着怒江峽谷裏人烟稀少的豐沃的草地。一九四三年春，華軍三個師衝到怒江峽谷裏，阻擋自緬甸入境的日軍。其中一師人開到江邊時有七千人，三星期後，能夠站起來打仗的只剩四千人。有名的八十八師有一營人一個月之內患瘧疾者，五百人中佔二百六十人。重慶統帥部得知此種情況，態度是出奇地冷淡。只有當時不甚重慶所喜愛的平民宋子文氏有一點勇氣把這事提起委員長的注意。在美軍在該區內負起醫藥事權之前，部隊沒有蚊帳。庫房裏存着九千萬粒奎寧丸，但中國軍部堅持要囤積起來以防可能的『緊急用場』。美國人抱怨中國部隊有昏睡病。但美軍夜裏睡覺是有蚊帳的，中國士兵許多人蹲在驅蚊的烟火旁邊直到天亮，直到帶着瘧菌的蚊蟲在太陽度下消失——到那時候，中國兵才休息。

據估計，中國軍隊裡有一半的人，生着維他命不足和骯髒所引起的疥瘡。疥瘡嚴重者不僅手上，腿上和身上癢痛，而且腫脹的臉上也極癢而流着膿汁。軍隊冷天發給棉制服，士兵從秋到春日夜穿着全套棉制服，沒有替換。中國軍隊宿營時並無熱水澡可洗，也不發給肥皂。

腳氣病是又一種維他命缺乏的病症。你可以把大拇指深深地捺入生腳氣病的中國兵的腫脹的腿裡，十分鐘之

後，這個拇指印痕還是很清楚的。拿些人來作試驗品，打了維他命B針，這病竟可以霍然而愈，但整個而言，軍隊裏並沒有維他命。腿長長的瘡潰爛着；當士兵們穿着草鞋跋涉長途的時候，瘡口裏的膿血從踝骨上一滴滴地流下來，和路上的灰塵和蒼蠅黏合起來。

雖然軍隊中主要的災難是結核病、痢疾、瘧疾和維他命缺乏症，其他許多疾病也十分猖獗。傷寒、感冒、重復性的熱病以及蛔蟲等，都致人於死地。只有性病是顯著地稀少。這一部份由於中國軍隊缺乏嫖妓女的錢和精力，一部份也由於缺乏機會，那可能是因為中國的道德和西洋軍隊的道德不同。

中國的醫藥方面，正和其他一切東西一樣，受到供應不足的障礙。每月數千噸藥，就可以抑止中國軍隊中的疾病，但直至戰爭最後時期，外國來的藥品每月只有十四噸，加上美國所訓練的特別部隊的若干藥品。中國自己製造的預防霍亂的疫苗，軍醫居然能使霍亂在部隊裡不致猖獗。如果在戰爭最後數年間亞洲的霍亂病支配了中國的語，中國人口可能減少三分之一。

傷兵所受的待遇，自然和病兵一樣壞。戰場上倒下的士兵，要一直躺着，等候担架兵——每運兩人——來發現他。担架兵翻山越嶺地把他抬到師部所在地，要費一整天工夫。在師部，要是他運氣好，可能在穀倉或廟宇裏找到一個異懂醫藥的人，此人可能把他受傷後一直破裂着的血管紮住，或者把竹頭做成的夾板，把他在担架上搖晃了老半天的打斷了的肢體夾起來，然後再往後送。假如他那時還活着，人們就把他抬着，通過隔離中國整個前線的荒僻地帶。到達交通方便的地帶，他可能搭上一輛卡車，在四天至一星期之後，這才第一次見到一個够格的醫生，結果是易於斷言的。肚子或頭部受傷就一定死，傷口稍染細菌，就生壞疽。

批評華軍對病號傷兵的待遇是很容易的，但如果把一切慘狀，全部歸咎於冷淡的忽視，也不公平的。有着極少數的心腸硬直的人，例如軍醫署的羅李却（譯音）醫生以及紅十字會的林可勝醫生，他們曾為援助傷兵而奮鬥。

，各戰區的報告到來時，他們自己也感到痛苦。但他們什麼都不能做。他們一方面被這無知和封建的國家的殘酷現實所包圍，另一方面被貧污所包圍，并且缺乏在上者的支助。

在過着中世紀生活的軍隊中，無法教授基本的衛生常識。兵士們終生都看草藥醫生，衛生對於他們是神秘的，他們相信着符咒和古老的方子。醫藥人員要兵士只喝開水，但他們口一渴，就喝稻田裏的污水。醫藥人員要求隔離病號，但前線兵士都從同一個罐子裏夾東西吃。醫藥人員設法使每人都有一个急救包，其中包含繃帶之類，但領到急救包的人却把紗布藥棉用來擦拭槍筒。

合格的技術人員或有訓練的人員是找不到的。在戰時，中國的醫科學校並未準備造就質量上台乎軍隊需要的醫生。這些學校每年只能教好四五百個學生，而這些學生，由於實驗工具之有限，教科書之缺乏以及和西洋的研究工作毫無接觸，人們不能希望他們是真正良好的醫生。能够找到的藥品和救護車遠落在需要之後。華軍的戰畧，需要整個前線成爲糜爛地帶，這樣來使日軍被迫和中國步兵站在同樣的地位上，步行作戰。前線地帶沒有公路，傷兵得由其他的兵士或農民抬到後方。即使有公路，救護車也很少，歐洲美軍救護車五輛一天所載入院傷兵的數目，在中國就要二千名担架人員才能應付得了。

中國陸軍並無真正的軍事傳統。總司令蔣介石畢業於保定軍校第一期，該校創辦迄今不過四十年，該校之設立，是滿清守舊官僚對現代戰爭的第一次讓步——這是中國二千年軍事史上擺脫太古戰法的第一次。從社會學的觀點看，中國陸軍是雜湊品。參謀本部人員所受的訓練是不同的；參謀本部是一個中年人胡亂湊合起來的團體，其中人員數十年來曾經互相作戰和憎恨過。它是以人事關係和各省政治緊張情況爲基礎而發布命令的，有時自己也覺得命令下去未必有人服從。配置軍隊時，它不僅想到軍需供應和敵軍情況，而且也考慮到國內的反叛和自己

內部的安全。政府一直把最精良的部隊二十個師抽在抗日戰爭之外，以封鎖北方的共產黨人。

華軍內部的貪污，好像心臟裏生了癆，四披百骸都受感染。戰爭將近結束時，差不多每一師每一軍都是受個別待遇的。每個師長領到一筆錢後，就隨意撥一點出來作為軍醫、餉銀、菜蔬以及作戰意外事項的開支。在通貨膨脹日益厲害的時候，軍官們也許覺得比起國內任何集團來，自己站在貪污的最好的戰畧地位上。譬如，一個師長領到了一萬人的餉銀和軍需品，應該層層發給他的部下。但在名冊上有一萬人的時候，實際上也許只有九千人——或七千，或五千人！名冊上的兵力和實際兵力的差數，就可以衡量一個指揮官塞入腰內的錢究有幾何。不僅如此，他給活着的兵士吃得愈少，他的利潤愈多。揩油之弊，在中國軍隊裏不脛而走。薪餉表是虛報的。米賬是虛報的。這弊病弄得這樣彰明昭著，以致將軍們認為貪污是自己的權利。每師應有一萬人左右，但很少有一個師在六千人以上——而且光是補充病兵死兵，也得經常徵調新兵入伍。至一九四三年，有些部隊每師官兵少至二千人。

中國軍官們對待士兵好像對待畜牲。在官長的奇癖怪想之下，士兵可以被拷打，被殺掉，責罰的方法中包括割掉耳朵和鞭笞。訓練班裏的美軍人員抱着嫌惡之感，常可看到士兵被罰以赤裸的膝蓋，跪在石子很多的操場上，兩手反綁着，晒在炙人的太陽下，直至昏倒為止。士兵不僅是軍官的私人僕役，也是軍官太太和家屬的私人僕役。事實上，士兵如獲得機會成爲軍官太太的僕人，就交了好運了；他可以在不知不覺之中脫掉制服，換上白色的僕役短衫，又變成一個平民。部隊行軍時若經過其中很多士兵的家鄉地區，是很危險的，因爲那些人這就會走入山中，一去不返。有一支八百人的部隊從華北甘肅出發，行軍到昆明去入美軍辦的訓練班，在路上有兩百人病死，三百人開了小差。另有一師人從華北向南行軍——也許是快樂的，也許是不快樂的，要看各人的觀點如何而定——經過四川。該師大多數士兵原來是從四川徵出來的。該師出發時七千人，到達目的地時只有三千人，因爲

整排整連的人失蹤回家了。

對於中國若干高級軍官，最客氣的說法，也得說他們是不够格的。他們除了偷竊部下的食物和錢款，漠視他們的疾病，殘酷地毆打違背紀律的人以外，自己也是很壞的領導者。軍官的參謀工作是沒有效率的。他們報告上級的，不是實際情況，而是上級所樂於知道的事情。在重慶，總部把這些報告認爲是事實，根據這些報告而作決定；於是錯誤重重，自上至下鑄成大錯。還在日軍手裡的城鎮，報告上說已經收復了；戰場上每一退却，總把敵軍的損失過度誇張，直到有一時期，按照重慶的估計，日軍是早已全部消滅乾淨了。中國陸軍的軍事原則是一團混亂的東西，官階的徽章是日本式的，鵝步是德國式的，空軍戰術是蘇聯式的，後方勤務是中國式的，後來又急忙忙加上了美國式的技術。中國人甚至歸功於中世紀，以解釋他們所做的若干事情。譬如，在一個宿營地，有一位美國獸醫設法勸說中國人在夜裡不要把牲口的鼻子綁在柱上，而讓它們躺下休息，中國人解釋道，在忽必烈時代，約耶蘇降生後一二五〇年左右，習慣是讓駝着東西的牲口夜裏躺下的，但當時有一晚，許多牲口躺着睡熟了，山上掉下一大塊大雪，這些牲口就都埋在下面壓死了。從這忽必烈的時代之後，中國軍隊一直在夜裏把馬頭繫在很高的地方。

中國陸軍是一支步兵隊。訓練班的美國軍官天天教以美國本國的分散以及向敵軍前進時須把肚子貼在地上的理論。怒江之戰開始時，這些美國軍官站在瞭望哨裏，看到中國軍官們令兵士站得腰背筆直地去對付山上日軍的據點，非常驚駭。從某些中國指揮官看起來，拿破侖式的衝鋒還是很好的原則。在戰場上見到過中國兵士的人，誰也不會懷疑到他們的勇敢，但指揮官這樣無益地浪費他們的勇敢，使旁觀者爲之傷心。中國保守秘密的觀念也是同樣地薄弱。注意間諜和洩漏情報事宜的國家警察機構是極其龐大的。但各地都有日本奸細活躍。有一個戰區司令長官承認，他曾經拜訪過和他對敵的日軍司令官，因爲那司令官是他留日時期的老同學。許多個別的人來往於

重慶官員和南京日偽政府的官員之間。例如，當B-29空中堡壘還是最高秘密，而華西正在計劃建造基地之際，消息早就漏入當時還在日軍佔領下的上海。日本佔領區濱海某城有個營造商，聽朋友說美國人要造巨大的基地以轟炸日本，就從日本方面一路旅行到中國方面，到達正在建造基地的華西。他承造了一個基地，工程完畢之後，又帶着他的知識和利潤，回到日軍佔領區。

在所有這些之外，中國軍隊還有許多缺乏效率之處，值得批評，但更值得憐憫。一切壞事情，惡事情，一部份的原因是由於中國當時的被圍狀態，也由於美國政策更應負責的若干缺點。現代世界中，那一國都沒有像滇緬路割斷後的中國那樣被封鎖過。該路截斷後，中國能夠開行的卡車約一萬五千輛；過了三年，只剩下五千輛光景。這是悲劇。這就是說，軍隊無法從一個前線調到另一前線以應付威脅，各戰區的司令官變成了當地的君主，依靠着自己的資源，而不依靠中央政府的供給。

整個作戰力量是在癱瘓狀態中。有人在一九四三年夏研究了一個月，發現中國最忙的一條公路上所走的車輛，平均每天只有一二三輛。這個數字包括來程和回程的吉普車、卡車、公共汽車、商車和軍車。據同樣的調查，重慶通出去的三條大動脈似的公路中的一條，平均每天來程和回程車輛總共祇六十輛。中國軍人的想法反映着這種一般情況。中國的將軍們不願作戰了，除非上面加以無法忍受的壓迫，他們是不願化費彈藥或汽油的。他們情願等閒着，直等到別的甚麼人替他們取得勝利的時候為止。

在高級軍官中，甚至也有幾個人是結實而勇敢的——如衛立煌，他的度量 and 忍耐最後贏得了怒江前線的勝利；陳誠，在担任軍政部的時候，終於開始清掃重慶臭氣沖天的馬廐；李宗仁，是嚴厲的，棕色的廣西將領；孫立人，在史迪威領導下在緬甸學好了他的本行。散佈在整個綿長的戰線上，也有若干團長和師長出人頭地，好像站立在泥沼似的中國陸軍之中的誠實的孤島。爲了保護自己的部下，他們身受苦痛和怨恨之深，是任何外國人所吃

不消的。這些指揮官中，有的人和部下士兵一同挨餓，一同死在敵人的炮火之下。可是這樣的人爲數極少，好的混在壞的裡面，總結果還是醜惡一團。

這支軍隊，居然擋住了日軍六年，這是它的奇事之中最值得注意的事。要它在作戰中取得真正的勝利，未免是奢望。它最大的勝利，是在於活著，站住，耐得住它自己的政府和社會瓦解的壓力。許多人受不了這壓力；數十萬人投降了日本，附和傀儡汪精衛；更有千千萬萬的人參加了中共或投降了中共。遍佈華軍內部的殘酷和痛苦，不僅使高級軍官和參謀人員墮落，也使一般士兵變壞。士兵被看成餓殍求飯吃的狗，他所受待遇如此，就設法從比他更弱的人——農民那兒盡量攫取東西，這樣來解決自己內心的不滿。

一九四三年，有一位年輕的中國記者奉派至鄂西，對「鄂西大捷」作一報告。中國報紙上是把這次「大捷」吹成爲可和斯大林格勒之役相等的勝利的。他在此役結束很久之後寫下一篇通訊，這篇文章未得刊出，是幻想破滅和失望的範本。這位記者並未發現勝利，却發現此役華軍損失了七萬至八萬人，敵軍損失了三千至四千人。更驚人的，是他發現人民是冷淡的。他的通訊說：

在政治上，爲什麼農民成爲我們的敵人呢？因爲我們自己把他們推到敵軍方面去。在敵軍到達澧縣和津市之前，形勢危急時，當地駐軍下令人民疏散，每家只准留下一人。兩天以後，又有一道命令叫老百姓全體撤退，一個人也不准留，如有違背，以漢奸論罪。老百姓走了之後，（中國）駐軍就在全城搶掠，把搶到的東西搬走。年紀太老不能離家的以及不願離家的人，全給殺掉。有時連房子也一起燒掉。我到津市的時候，駐軍搶來的老百姓的衣服仍在市中出售。我和老百姓談過話。開頭，他們什麼都不肯告訴我。後來我提起重慶，說我是來視察的，他們就左顧右盼，看到沒有人在旁邊，其中一個人就把四個指頭放在桌上，然後再把手翻轉來。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要說的是（中國）四十四軍把全城搶光了。他低聲對我說，駐軍曾經強姦、

搶劫、放火、殺人。老百姓知道軍隊搶光了該城後，就想回家，但軍隊不准他們過去，要過去必須出錢。每人得繳獻五百元至一千元。八十七軍也是如此。

在前綫旅行的時候，許多人告訴我，他們覺得敵軍到來時不會有什麼擾亂。這使我很詫異。老百姓從什麼地方得到這種消息，是值得加以調查的。事實上，敵軍進佔時，並未擾民。他們在任何地方過路，都只要求茶水。於是大家都說敵軍比國軍好了。他們說起國軍時，覺得自己是第三者，彷彿那不是他們自己的軍隊。敵軍撤退時，却大規模地燒殺，使他們懊悔都來不及了。敵人對中國人民，是異常奸猾詭詐的。

第十章 史迪威的戰爭

美國政府於一九四二年春設立中緬印戰區。中緬印統帥部是神話似的東西；美國人常說，你得有一個魔術球和一本『愛麗思漫遊奇境記』，才能懂得它。中緬印戰區的瘋狂和不愉快的怪誕之事，是連好萊塢的老闆都不敢攝成電影的。這里印度王公、舞女、軍閥、吃人生番、森林、沙漠、酒徒、間諜——什麼都有。美國飛行員會坐着 P 40 式驅逐機去掃射敵軍的大象。中國的蓋世太保曾在我們自己的總部里查出一個漂亮的日本女間諜。日本間諜曾在加爾各答大街上刺殺了一個美國情報官員。中國軍閥們會引導美國軍官去享受鴉片的樂趣；美國工程師們曾用鴉片來診治病倒了的象，也用鴉片作工資來償付當地工人，豹和老虎咬死過美國兵。中國狂叫着需要飛機的時候，停在印度的 B 17 式飛機的放氣管內，鳥兒築了窠。印度王宮殿內的銀地板上，人們跳着現代舞。美國間諜翻過喜馬拉雅山的小道，到拉薩去，爲了獲得西藏的友誼，和達賴喇嘛談判。美國海軍在蒙古沙漠的邊緣上，訓練了一支騎兵；美海軍也把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技術，教給了中國可怕的特務人員。美國專家們教給中國一切東西，自洋芋的種法起，至人工傳種的最新方法止。

中緬印區的政治，是算術、人事、共產主義、獨裁專制主義、貪污、帝國主義、廢話和悲慘的無法可施的荒誕的混合物。美國政策在世界任何地方，從沒有遭逢過這樣奇妙地湊在一起的許多角色。這中間包括甘地和尼赫魯，英國皇室蒙巴頓爵士，劣等詩人和沙漠戰士魏菲爾爵士，中國軍隊總司令蔣介石及其柔嫩的太太蔣夫人；次一等的人物，則有雲南省主席獨眼龍龍雲以及漂亮的黑眼睛的中共周恩來將軍等。美國人對付這些人時，也同樣地花樣百出，而且不免感染到了同樣的陰謀和傾軋之風。這是一個分裂而不愉快的統帥部。

中緬印戰區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要使中國繼續作戰，使它在對日最後一戰時，成爲砧板，而能讓盟軍之錘，

把敵軍打得粉碎。該戰區的職務是要供應中國的軍需，重新訓練、重新裝備、重新整編中國的部隊，而且送他們去再和日本作戰。被派從事此項工作的美軍，約有二十五萬人；曾化掉幾十萬萬金元；曾損失數千生命。這是一個緊要任務。和美國作戰努力的其他方面比起來，人們對於這戰區的功勞認識較不清楚，所給的榮譽較少，資助較少，鼓勵較少。

在美國軍事優先的表上，中緬印戰區的優先權和加勒比海島的優先權相等。中緬印戰區，任務重大，但只有很少一點點工具來執行這任務。美國兵以直率的政治現實性，了解自己是在一個守勢戰鬥里為人作嫁；除了第十四航空隊極少幾個戰鬥人員是例外，他們自己為自己的戰畧和戰爭而打着仗；一般美軍只覺得自己是政治上的附屬物。在軍事方面，中緬印戰區不能和歐洲和太平洋上的偉大戰爭相比，這是真的；該戰區的重要性，首先是政治的，是在於西洋文明這是一回來到亞洲，作為盟邦而和亞洲人為了共同的目標而並肩作戰。如果奉派作此項工作的美國人的努力，已開始了偉大的十字軍運動，把美國自由、民主和工作效率的理想，介紹到亞洲混亂的政治中間，那麼，他們所遭受的痛苦和不愉快，也就不是白費的了。但是，高高在上的人們，拉住了負責指揮官的手腳，使他無法應付這個局面。

政治上的責任，正像同樣多的軍事責任一樣，被放在一個人的肩膀上，人們希望這個人用一條鞋帶造成奇蹟。史迪威將軍不是平庸的軍人。他是西點軍校畢業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助功卓著，在二次大戰之間的時期，他成爲美國陸軍中步兵戰術的偉大專家之一。他的職務，使他往來於中美兩國之間達二十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被派赴北平學習中國語言，他中國話終於說得很流利，而且成爲中國軍事的專家。中日戰爭在一九三七年爆發時，他在華北當美國武官，他親自考察了這戰爭的初期情況，直至一九三九年相持局面爲止。所有這些，都是很普通的事情。

但是史迪威具有職業軍人中另一個稀有的品質——遠見。他能够在戰鬥的爛泥和污穢中抬起眼睛，瞭望着天邊。他知道戰爭是什麼一回事。他所接到的字句粗率而浮泛的命令，要他把中國軍隊重新訓練，這很容易被解釋爲單調的例行公事，大可不必煩心，而取得榮譽和快樂。然而，史迪威不僅從指令之中看到了自己的責任，而且從全美國人民的觀點上看到了自己的責任：要全力以赴地，民主地作戰，絕不容忍貪污腐化、口是心非或虛偽巧妙的外交詞令。

史迪威部下的交際宣傳處人員的工作都很壞。他們認爲這個老頭兒是一個痛快而可愛的人物，要使美國人明白，只要把他的綽號『醋老頭兒』宣揚一下就够了。他們說他是一個暴躁的哲學家，一個具有列薄的美國機智的人，第一流的戰士。他們幾乎把他的精神之中的溫暖和慈愛完全掩過不談。史迪威性格的主要點，是在於他瞭解每一個人的尊嚴和價值。他並不是從複雜的意識形態方面來瞭解生活，而是從美國自由主義的基本之處來了解生活的。他對於中國農民兵士的了解，要比中國軍官深刻得多。他認爲只有把兵士像一個人那樣看待時，他才能像一個人那樣戰鬥。他對於中國農民兵士的愛情是無限的。他曾經目睹中國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毫無救藥的早期戰鬥，終於信任中國人的勇敢和堅毅，是勝利的樞機。同時，美國軍官中，對於中國軍隊多年的貪污和腐化所造成的一團糟的情形，誰都沒有比他了解得更清楚。

中國軍隊已經退化成爲爛柴似的一羣人，他的整個計劃是要使這支部隊能在平等的條件下對付日軍，並且加以摧毀。史迪威在中國所受的教育，開始於珍珠港事變二十年以前他最初的在華任務之中。一步一步的，他起先把中國軍人作爲個別人而研究，起先注意着把個別人物組織在一個戰鬥單位裏的問題，隨後，他明白，要軍事上有所變化，必須急劇地改革中國政治和行政的中心。在他就任中緬印戰區司令之後不久，他了解，不論美國答應的援助也好，紙面上的勝利的改革文章也好，加強個別的部隊也好，得到個別戰役的勝利也好，都不能使中國

重新獲得生命。現代化的軍隊，只能生存於現代化的國家內，而他認為，只有美國的政策積極地在重慶贊助民主和效率，才能產生這樣現代化的國家。當史迪威事件由於這樣的信念而被形成之時，許多人對待史迪威好像他是中華民國的敵人似的；然而在緬甸的美國兵，知道這樣看法是非常錯誤的。他們對史迪威的不滿，是由於一個完全不同的理由——因為他們覺得他是一個『溫柔的愛人』，覺得他在叢林之中愛他部下的中國軍隊，要比愛他自己的美軍來得多。

在中緬印戰區內，史迪威是最偉大和最能激勵人心的人物。他的誠實好像一塊石頭；他在戰鬥中的勇敢和徹底，是完整而毫無問題的；他的單純，諷刺着希望他在扮演一個角色的浮華的人們的氣氛。但是，史迪威也有他的缺點——他的缺點是從他的美德之中跳出來的。他對於偽君子和表裏不一致的人的輕蔑，在外交場合中總不善於掩飾。他對於低微的人，是單純而客氣的，但他尖利的舌頭，却像沙皮紙一樣，把倨傲的人的神經過敏的痛處，擦得體無完膚。他對待蔣介石氏好像對待其他軍人一樣——有充份的禮貌和尊敬，但並沒有繁文縟禮或鞠躬之類——他們兩人的性格於是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史迪威待他部下的忠誠，是盡人皆知的。他自己是一個光輝的戰鬥軍人，他的戰鬥副手也是第一流的；可是不喜歡紙上文章。做他的參謀工作的人們，因此對他十分粗暴。他把年老，可靠而久已沒有用處的軍人留在部隊裏，這些人成了一種障礙。中緬印戰區從喀拉蚩延伸到西安，這中間的距離，好像聖地亞哥到紐約那麼長，在這樣廣大而複雜的一個戰區中，良好的行政工作，是必要的。史迪威辦公室裏某些參謀人員的馬馬虎虎的工作，使他經常受到批評。

有一次一個美國軍官嘲笑道：『要解釋中緬印戰區的情形，即使說明一些比較簡單工作關係吧，你也得需要』

一張三度空間的組織系統表，配上電線以及五種顏色不同的緞帶。』史迪威將軍帶着三頂帽子，他是中緬印戰區的總司令；由於這樣，他對華盛頓陸軍部負責，並且指揮中緬印戰區內一切美軍。可是在中國，他也是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的參謀長；在這個職務上，史迪威是對蔣負責的。在印度，他是一九四三年夏設立的東南亞盟軍總部的副司令；這樣，他也直接處在英國海軍上將蒙巴頓爵士之下。中國戰區和東南亞戰區的分界線是不大清楚的。美國斯特拉梅耶少將是史迪威部下的空軍軍官；他指揮着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隊以及在中國的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的），但他同時也對蒙巴頓爵士負責，因為他是東南亞統帥部的戰畧空軍司令官。

在中國，當然，蔣介石有他自己的參謀長——何應欽。何應欽是中國軍隊的參謀長，而史迪威應該是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在印度，蒙巴頓爵士只是東南亞的指揮官，他的指揮區域包括錫蘭及尚未克復的地區；實際上，他以印度為根據地，從印度抽取力量，並且在印度配置他的部隊——可是他在印度沒有指揮權。印度是由英印軍總司令奧欽來克爵士獨立指揮的。中緬印戰區被在緬日軍的鋏子割裂為二。空運部隊就在這鋏子上面飛行，形成了印度和中國這兩個分離的區域之間的樞紐。這個空運部隊和史迪威，蔣介石和蒙巴頓毫無關係，是由華盛頓指揮的；這個部隊自己以為屬於國際性的指揮部，戰區司令部不能干涉。在一九四四年，B20空中堡壘的第二十轟炸機隊進入了中緬印戰區，這個轟炸隊是一個巨大的豬似的組織，消耗着大量的物品和汽油；這支部隊除了華盛頓的亞諾德將軍之外，不受任何人管制。假如以上所說還不够明白的話，那是由於戰場上誰都沒有十分明白過。這許多份子，誰都不會和諧地湊合在一起。史迪威要做的事只有一樁，就是戰鬥。這是戰爭——而他不愿意錯過打擊敵人的任何時間和機會，不管他在什麼地方，也不管他手頭有多少東西。對日軍作戰是史迪威固執着的觀念。緬甸的重新收復以及中國封鎖線的破壞，佔據了他的所有思想和精力。但是英國人、中國人以及美軍之中的若干人。都反對在緬甸進攻。

主要的反對者是英國人。印度是他們整個帝國系統的基石。英國在亞洲之戰的目標，第一是保持在印度的統治權。第二是收復被日軍強奪去的殖民地。英國人看來，中國似乎是各方面都很遙遠的地方。由於對日作戰主要是美國的責任，他們覺得對日戰界也該讓美國處理；如果美國的政治和軍事計劃需要打破中國的封鎖線，英國人覺得不同意似乎無禮。可是他們只不過同意而已。並沒有給予充份的合作。

英國在印度有很大的資源。他們有一支英印軍，估計達一百萬人。還有皇家空軍的很大部隊，以及比中國大得不可比擬的工業組織。然而，印度政府多半的精力並沒有放在從事戰爭方面，却用來維持英國的統治。印度可以省出來從事反對軸心國的戰爭的軍事力量，已經調去對德作戰。因為在歐洲，印度軍不至於受危險思想的感染。印度的英國人，正像中國的蔣介石一樣，把大部份的力量放在後面維持內部的穩定。對於真正相信他們是在從事反抗軸心的真正偉大戰爭的英國軍隊、軍官以及印度的某些官員而言，這個斷語也許似乎太兇。在某些方面，印度政府和美國陸軍的合作是值得稱贊的。不過英國人在那裏面工作的殖民地制度，更確實地，是他們整個教養，使得他們不可能忠誠合作。

史迪威需要英國的幫助，來利用印度，作為他衝入緬甸叢林的根據地。然而，緬甸和馬來亞的事變，一直使英國人處在恐懼的狀態中。邱吉爾覺得緬甸是不適宜於白人的地方——瘧疾太厲害，天氣太使人疲倦。英國人不懂只有一隊中國衛兵以及幾師印度部隊的史迪威，何以能够在日軍如此輕易地勝利的區域內，希望獲得進展。在他們人力物力沒有絕對優勢的時候，他們不願意在一個失掉了的殖民地內開始任何戰鬥，而史迪威希望在兵力相當或較少時進行戰鬥。史迪威和英國統帥部爭辯了兩年之久，他要設法刺激他們行動起來，而雙方的脾氣鬧到了決裂的程度。

在政治上，英國的利益也和中美兩國的利益背道而馳。英國希望收復緬甸的不是東方的中國人，也不是屬外

的美國人。他們要緬甸重新作他們的殖民地。爲了重行建立他們的威信，緬甸須由英軍拿槍過去撤退時帶着的旗子重新佔領，是至關重要的了。史迪威的政治顧問們以及他的戰區里的戰時情報局很願意在他計劃收復的地區內提高爲自由而戰的呼聲；他們知道這是做不到的，他們很不愉快，因爲他們不能使美國在亞洲的作戰動機弄得清楚和清潔。宣傳如果以自由觀念——這次戰爭其實原來是假定爭取自由的——爲基礎，則將直接打擊英國的利益。英國人是在作兩個不同的戰爭。在歐洲，他們揭示人類的自由和消滅納粹奴隸制度的一切光榮；在亞洲，則主張保持現狀，保持帝國，保持殖民主義。

中國人何以反對史迪威計劃，是不容易分析的，因爲理論上，中國人希望把日本的封鎖線粉碎，越快越好；他們寧乎願意在緬甸作戰——但不希望自己所化的代價太高，如果他們只消簽訂了文件和同意了盟邦的決定，就能够看到封鎖線打通，他們是雙手贊成的。但當實現戰畧時需要具體的工作和有利的合作，就另有枝節了。蔣十分願意讓史迪威帶着隔絕在印度的中國部隊隨使幹什麼；這些部隊反正是由外國供養及裝備的。至於要中國自己實行那個戰畧，那就要有目下而上的改革——而改革就會威脅到中國軍閥政治的微妙的平衡。中國人認爲美國加入戰爭已經註定了日本的厄運。正如有一個美國的捉狹鬼所說，「美國的珍珠港事變日，就是中國的停戰日」。中國人覺得他們只要等待，可以等到敵軍在美國的實力之前崩潰。

反對史迪威計劃的第三方面，是美軍內部。可以作爲代表的，是一個和史迪威同樣地爽利，同樣地抱有決心，同樣地很受人稱讚也很爲人痛恨的人。此人就是陳納德，一個很特別的航空員。陳納德完全地、毫無保留地主張空軍高於一切。由於他一再毫不遲疑地表露這樣的信念，他被迫離開了美國陸軍，於一九三六年來到中國。他注意觀察並分析了日本空軍對中國和蘇聯空軍早期作戰的情況。一九四一年，他把幾架二流的「C」機帶到亞洲，並且從美國帶來一批不守紀律的，勇敢善戰的海陸軍飛行人員，組織了「美國志願隊」。他把這個志願隊鍛鍊成

空戰史上最奇特的戰鬥部隊之一，名爲飛虎隊。日軍攻襲珍珠港的時候，他已有戰鬥準備。在整個太平洋上其他盟國空軍在日本零式機之前望風披靡的時候，陳納德的部下天天毫無慈悲地把空中的日本人順利擊退。中緬印戰區成立後，陳納德又穿上了制服，成爲准將，負責指揮中國空中戰術部隊，該隊後來變成第十四航空隊。

陳納德認爲日軍能够、並且一定可以被空軍所擊敗。他並不把中國看成地面部隊對日作戰的基地，而看成爲空襲日本心臟地帶和海上交通線的巨大的空軍踏脚石。他希望他的美國空軍在華東安設基地，從沿海地區出動空襲敵軍的船隻和港口。他覺得緬甸的戰鬥是浪費時間；假如他能切斷日本的海洋交通線，日本在緬甸的駐軍就會由於飢餓而衰頹下去。從陣路打通固然不壞，但依然是奢侈之舉；美國所有的供應品和努力，應該集中在空運物資入中國這一偉大的任務上；空運的物資首先應給十四航空隊，其剩餘者，則交給中國人，讓他們隨便使用。陳納德相信，一旦有了足夠的空軍，他可以使華東的日軍無法進攻他的基地，因爲第十四航空隊可以作爲疲憊的中國步兵的砲隊和得力的掩護隊。

另一方面，史迪威認爲空軍是從屬於整個戰畧的。他堅持說，中國要沒有強大的陸軍，在華東設立空襲日本的空軍基地是守不住的。只有經過滇緬路運入供應品，把中國部隊裝備起來，中國部隊才會強大。因此，滇緬路應該有最高的優先權——這是阻遏日軍對我們空軍攻擊的先決條件。陳納德和史迪威之間的失和動搖了駐華全體美軍。你要就是史迪威的人，要就是陳納德的人；要對兩個人同樣地友善，就等於走繩索一樣地難辦。這兩個人都是活躍和酸辣的戰士。兩個人的部下都不好，他們意識到了這個反目狀態，就欣欣然以許多閑言碎語，助長這兩個指揮官對彼此的惡感。在本戰區所有高級人員中，只有「梅利爾突擊隊」的梅利爾少將曾設法彌補這個罅隙。

當時在中國一切互相衝突的意見，戰畧和野心的焦點，是「駝峰」。要確切地明白中國這跑馬場上任何賭徒

的快樂或不快樂程度，你就得去探悉他最近從駝峰那邊收到了多少噸東西。飛越駝峰的不可思議的航空線，在兩年半之間一直是中國和美國以及其他盟邦接觸的唯一路徑。所謂駝峰，就是自阿薩密至雲南高原的喜馬拉雅山的支脈。一九四二年春天起，運輸機開始飛越駝峰，每月載貨八十噸；到戰爭結束時每月達八萬噸。這中間駝峰會使人們發瘋，殺掉他們，使他們因熱帶的害病而一蹶不振，把他們送回美國，過渡衰弱的餘生。美軍中有的人把它叫作「天上的地獄」。這確實是世界上最危險、可怕和野蠻的空中運輸。沒有武裝的運輸機，要在二萬呎高度上不管日本空軍、熱帶的雨季以及西藏的冰雪如何，通過五百哩無人跡的山嶺和叢莽地帶。「駝峰」指揮部有幾個月內損失的人和飛機，要比直接作戰而由它供應的十四航空隊所損失的還多。一九四三年以前，它曾使四個指揮官相繼下台，之後，終於有一位哈定准將來指揮這個空運司令部，他的傑出的意志能夠處決各種問題。

駝峰是中國一切政治的鎖鑰。史迪威、陳納德以及中國政府激烈地爭辯着運到的東西應該如何分配的問題。在封鎖的大部份時間內，載運量平均每月不到五千噸。直至哈定於一九四三年秋天接任時，載運量才開始上升，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超過了一萬噸，至一九四四年到達每月二萬噸。在戰爭的數學內，甚至每月一萬噸也算不了什麼，第八航空隊從英國大舉出擊德國兩次所消耗的東西，要比整整一個月運入中國的東西多。駝峰物品的這三個競爭者——史迪威、陳納德和中國政府——彷彿是在圍城之內被困而挨着餓的人們。運入的全部供應品都還不夠三人中任何一個人的需要；分成三份，就僅只是苟延殘喘的口糧了。這三個人一次又一次地向華盛頓呼籲，反對他們的上級、部下或同僚的不公平；供應品分配的爭吵，甚至上達白宮。陳納德需要物資越多越好，他要供應華中的前進基地，他的部下正在殲滅着日本的船艦。史迪威需要物資越多越好，他要供應地上部隊，以重開滇緬路，使中國軍隊恢復生命力。中國政府也需要物資，以使它的兵工廠以及民間經濟在最低限度的效率之下繼續工作。美國政府會一再答應飛越駝峰噸數加多，以應付中國的需要。但是駝峰航空人員儘管如何緊張，他們死得儘

管如何英勇，都從沒有能够使山那邊的被圍駐軍滿足。作為整個戰區的總司令，史迪威担负着分配供應品的最後責任，誰的要求不能滿足時，誰就咒罵他——從要求着啤酒和婦女服務隊的普通士兵起，直至要求鋼和卡車的中國參謀本部止，都咒罵他。

亞洲戰畧原來是在珍珠港事變後一星期內，從羅斯福——邱吉爾白宮會議裡頭產生出來的。當時盟國打算守住新加坡荷印一線，並且經由滇緬路把供應品送入中國，使恢復作戰。一九四二年春東南亞盟軍整個陣綫的崩潰，並沒有改變過這個大陸基本戰畧，僅只推延了它。後來日軍切斷了滇緬路，於是在援華計劃開始實施之前，必須把該路車行打開。

當蔣介石氏獲得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部總司令這一個尊貴的銜頭時，他要求來一個美國人當他的參謀長。美國把當時在加里福尼亞州指揮着一個軍團的史迪威將軍挑出來，送到亞洲担任蔣的參謀長，並指揮中緬印戰區內的一切美國部隊。緬甸之役中史迪威身陷重圍，步行行車走到了印度。他在這次行軍中，想到了其後兩年的計劃，他在一九四二年夏天把這計劃增訂完成。

第一步是要訓練從緬逃到印度的中國殘餘部隊。日軍在中國側翼安設了緬甸前綫的藩籬。這些部隊應該成為刺破藩籬的先鋒，在緬甸北部離開日軍供應基地最遠的一點上進攻。在昆明，在中國內部，應為中國人設立另一個訓練班，由美國人教授基本的技術，並組織一支中國部隊，從國內打到緬甸去。這兩支部隊應以鉗形態勢進攻，一支從阿薩密北部的雷多出發，另一支從華西的怒江出發；兩支部隊會合時，中國的封鎖綫就衝破了。這兩個行動是要配合起來，符合於一個長期計劃的。訓練中國人的第三個中心，應在桂林設立。這個訓練班不像其他兩個那樣生薑精美的果實，因為它缺少器械和人員，但它可把美國的方法教授給東綫上大批的步兵，這三支部隊以

X, Y, Z, (Major, Yokoyama) 爲代表名詞，這三個字後來在中印緬戰區中變得非常有名。

這些部隊是史迪威計劃的基礎。他在一九四二年夏天開始訓練在印部隊。在拉姆加，在印度中部炎熱多塵的平原上，到秋天成立了一個訓練學校。美國人把現代化的理論教給中國軍官，並且要他們做砲兵和步兵的實習；他們把通訊工作和獸醫工作教給中國士兵。在印度，中國的軍隊第一次要吃多少東西就有多少，得到的餉銀是硬幣，而且得到鞋子、衣服、醫藥看護，甚至維他命丸。昆明的訓練學校于一九四三年初開學，該校的經費沒有那樣寬裕，該校人員的伙食沒有那麼好，大砲和若干種重要武器也無從獲得供應。桂林的學校直至一九四三年底才開幕，該校不過匆匆忙忙地把美國的作戰方法，教給中國軍官而已。

總戰畧的進度是很簡單的。當緬甸出發的X部隊和中國出發的Y部隊會合，打通了公路之後，這兩支部隊在Z部隊的輔助之下，應向華東的海岸進發。在那邊，他們可以和太平洋上過來打開一個海港的美國海軍會合。於是美國和中國之間通過太平洋的直接交通綫就可以重新建立起來，而日本帝國將被切分爲兩半。各盟國雖然都同意此役的一般計劃，對於如何推進這計劃的一節，却從來沒有一致的意見。史迪威希望拿手頭任何部隊儘快地，儘可能熱切而專心地作戰。他要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在緬甸進攻；英國人逼得他放棄了這個計劃。他在一九四三年春又要進攻，又被壓倒了。他不倦地要求打破日軍對中國的封鎖綫，最後，在一九四三年，他得到了聯合參謀部的認可，該部同意開始作收復緬甸的真正努力。根據開羅會議的計劃，英軍應在緬甸南部海岸登陸，華軍應以Y部隊渡怒江挺進，而史迪威應率領X部隊穿過北緬的叢林，到達公路的會合處。開羅會議之後，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間盟國舉行了德黑蘭會議，在那次會議上，斯大林和美國人堅持英美全軍出動渡過英吉利海峽。這不得不推翻了開羅決議。要歐洲渡海作戰成功，英國就省不出登陸艇來到緬甸作戰。因此，史迪威奉派回到中國通知蔣說，擬議中的英軍在緬甸南登陸之舉是取消了。

蔣氏雖然在開羅提供了諾言，却是一向對緬甸戰事並不十分熱心的。現在蔣就說話了，他說如果英軍不登陸，中國就不在怒江前綫發動攻勢。但關於在印度建立起來的三個師應該如何處置一節，他讓史迪威全權辦理——史迪威要就打，要就不打，要前進，自定進攻目標或停止進攻，都可隨意處理。至於史迪威，如今深信在德里和重慶爭辯或請求都不會再有什麼結果，就決定自己單獨進行緬甸之戰，他就飛到了緬北。一九四四年正月間，他從緬北發動了史詩性的二百哩叢莽地帶的攻勢，直攻到密支那爲止。

這個戰役比之於世界上任何原始性和恐怖的戰爭，毫無遜色。敵人、叢林或疾病，都是毫無慈悲的。在沼澤間的雨水和炎熱之下，中國兵、美國「梅里爾突擊隊」、卡欽族的巡邏隊以及英國的騎兵撲殺日寇或被日寇撲殺，達五個月之久。史迪威穿了骯髒的卡嘎服，噴着香烟，載着一頂低到肩心里的舊式軍帽，幾乎永遠站在聽得見槍炮之聲的地方。從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下旬起至一九四四年五月間止，他除了極少幾天在德里或重慶處理必要的公文以外，始終留在叢林里。至四月間，當這一戰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而將近勝利時，蔣介石就答應渡過怒江的攻勢，以補充緬甸的攻勢。

有的人覺得史迪威應坐在司令部的書桌旁，他的恰當位置應該是在高級的外交圈子以及他的廣大的戰區內錯綜複雜的行政工作中。但史迪威的想法不同。緬甸必須打一仗，而除了他自己以外沒有人打；沒有第二個人具備着他那樣的信念、意志或精力，足以迫使未經考驗的中國師團通過叢林，去擊敗老於行伍的日軍。從他看來，要向全世界証明中國人能打仗並且能够打敗日軍，整個戰區中再沒有比這塊地方更要緊了——那一項作戰努力都沒有粉碎封鎖線那麼重要。

在中國戰爭史上，緬甸之役是傑出的一戰。這是中國軍隊在八年抗日戰爭中攻勢作戰的唯一勝利。

一般駐華美軍對於陸軍上層間關於政策的鬥爭所知甚少，關心得更少。他們吃得壞，睡在臭氣撲滅而老鼠猖

般的中國招待所裡。他們得和炎熱、泥土和疾病奮鬥。誰都不會化工夫去跟他們解釋我們爲什麼而戰。他們所知道的一切，都並不超出日常生活的例行公事——他們痛恨這個。他們把美國政府叫作『朱姆大叔』（註一），把蔣介石叫作『麥克爾傑克』（註二），把孫中山叫作『孫散志山姆』（註三），把所有的中國人都叫作『歪頭雞種』，在日常談話中縮名爲『斯洛貝』（註四）。

所有美軍進入中國的第一站，是雲南的省會昆明。在戰前，昆明甚至比重慶還落後，該城的大街是窄狹的，小巷是污穢的；該城是全國鴉片烟商的強固據點之一。直至戰爭開始時，該城的娼妓被圍在一條街上，這條街是兩頭鎖住的；有錢人家則購置少女爲奴隸，操作家事。這個省份是由一位奇怪的人物統治的，他名叫龍雲，他是國民政府的最疏遠和動搖的支持者之一。龍不喜歡蔣介石，而他在該省內的權力如此強大，以致蔣在對日勝利之前，不敢攻擊他。在勝利之後兩個月內，蔣委員長却發動了一個勇猛的襲擊，佔領了龍的省會，而且把體面掃地的龍雲帶到重慶。

戰爭把二十世紀的兩種份子，投進這個中世紀的污水池中；那是來避難的若干最好的大學以及全國最精明的金融和商業投機家。這兩種份子都受到省主席的庇護，在避難的大學方面，那是因爲校中的自由主義教授們，形成了一個反對蔣氏獨裁政權的有節制，然而頗爲喧嘩的反蔣陣線。在投機家方面，是因爲他們完全可以肆無忌憚地

註一：『朱姆』——笨蛋。

註二：『麥克爾』——下疳。『傑克』——人名，即「張三，李四」之意。

註三：『孫散志』——日落。『山姆』——人名，「孫散志山姆」乃仿「孫逸仙」之首而取。

註四：『斯洛貝』——歪斜，懶虫。

進行黑市投機，天天增加着他所統治的城市的財富。在美軍開始侵入昆明時，妓女是從她們的兩頭鎖住的街上解放出來了，吸鴉片成爲地下活動，該城獲得了莊嚴的外表。

美國人到達該城時，通常在城南一個大飛機場降落。這個機場成爲世界上最忙的機場之一，達兩三年之久。該場處理着駝峯運輸線的大部份工作，中國民間航空線的全部工作，中國航空公司的貨運，郵件，以及十四航空隊的戰鬥工作。這是一塊愉快的地方，緊靠着南邊一個長形而碧綠的湖，躺在一個叫做老禿山（譯意）的高聳着的險峻的崖石下面。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軍，來到中國看到的風景，第一是老禿山，離開的時候往後回望，最後也是老禿山。你躺在跑道旁邊的草地上，眺望天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看到各種飛機，從C 54和B 24式起，至L 5和L 4式爲止，混在擁擠不堪的半空中。除了雨季大雨完全停航外，這個機場從沒有一刻鐘沒有飛機馬達的吼叫。

距機場數哩之內，散佈着供給美軍人員之用的十五個招待所，每個招待所有五幢至十幢房屋，駐華美軍七萬人中，大約有一半人曾經在昆明招待所裡住過較長或較短的時期。這些招待所，是由中國政府經營的，中國政府設立了一個特別的供應部，專門招呼並供養美國人。按照中國標準，這些招待所是雅緻的模範，是暖烘的，是乾燥的，而且中國人認爲食物是超等的。中國作最大的努力，把他們認爲美國人喜歡的雞蛋、鷄、豬肉和蔬菜供給美國人。從宿舍裏的大部份中國侍僕和守衛房屋的中國兵看起來，甚至美國人桌上的湯汁，都可以給皇帝吃的。可是一般美軍用不滿的眼色看着他們的食宿情形。一間房子要擠上六個至八個人，睡在雙層牀上；鋼盔，防毒面具，軍用袋等等，在這個小房間的灰塵和混亂之中翻滾着。膳堂裡的餅東西，油膩，以及一般的齷齪使美國人爲之作嘔，可是這些膳堂要比中國軍隊自己的任何膳堂清潔；在膳室吃飯的美國人，在他劃華時期，差不多都害過腹瀉和痢疾之類。在兵營中，美軍大叫着和咒罵着，把自己的怒氣發洩在中國勤務兵的身上，最後有一處美軍司

令部鄭重地貼出了一張告示：「在任何情形之下，美軍人員不得毆打、腳踢或虐待中國人員，蓋本司令部之政策並不如此也」。

在戰前，昆明一向是名勝之區。該城拔海六千呎，大半年中天氣愉快而晴朗，而醉人的太陽和天空，似乎永遠可以引起一種快活的頭眩。美軍白天工作，通常在天黑以後才看到這城市。美國兵每星期總有一兩次須入城內尋找酒、女人和娛樂，或儘可能覺得派司常常進城，一進城，中國的小販和導遊者就把他敲得精光。飯店裡水牛肉的牛排賣五塊美金一客；威士忌酒黑市是美金五百餘元一瓶，幸運的軍官們能够交一些會講英文的大學女生、看護和紅十字會的女孩子。普通兵士們，似乎誰都打算親身體驗一下軍官們所談關於中國婦女的事是不是真的，却不得不嫖妓女，有的人滿足於妓女，有的人不滿足。於是性病百分率奇高。駐昆美軍的娛樂中，包括看電影，賭錢和醉酒。電影往往是舊片子，而且很壞。他們賭起撲克來，賭注有時高至數千數萬元。空軍中有人湊起了一些機件，造成一些小的蒸溜器，從黃糖之中蒸出惡劣的酒汁來，但是大部份人老是喝着中國的茅台，白乾，黃酒和番薯煮的酒。美軍在珍貴的駝峰運輸機內，無法贖出噸位來載運啤酒，燒酒和一般飲料，戰地服務的劇隊，也非常之少，而且路途遙遠，名演員很少到中國來。名演員到來時，除了頗得歡迎的例外如佛根保——奧勃倫劇團等，演員們對於觀眾總不免感到醜惡而想咒罵。

如果昆明的生活是粗暴的話，那末漸漸在全中國設立起來的數十個前哨，生活更為惡劣。Y和Z部隊裡面的美軍人員，分成官兵四五人的小組，分佈在整個南方前線。這些人和中國戰地的團部，師或軍部住在一起。美軍每一個小組包括一個電台，一輛吉普車，幾個士兵，一兩個軍官，以及幾箱乾糧；每組有一個中國譯員，並且通常地有一個中國廚子。他們生活在沒有人跡的農家屋子內、寺院內、稻田中、以及森林的吊床上。他們和中國人一起，在塵土中跋涉，爬過泥濘難行的山間小路，拍打蚊蟲，學着吃米飯和喜歡米飯，彼此之間變得互相憎恨，

或互相憐愛。其中有些人終於了解在一起的中國人，並且對他們懷着真正的愛情；大部份人却並不。

空軍人員在戰場上要比在昆明生活得好得多。陳納德主張分層負責，給他們的部下以自由權。他把華中戰事付托給美國最年輕的將軍之一，此人名叫汶遜，只有二十九歲；他把希爾上校派在他的部隊裡，作為他的代表，此人也只二十九歲。他把攻勢交托給這兩個年輕人，都是頗有成績的戰鬥飛行員，他們使十四航空隊前進部隊的威名，叫敵人聽了求饒。從他們的華東基地出發，他們擊沉了日本船艦五十萬噸以上，並且把長江以南的日本空軍趕出天空之外。

前進部隊的司令部在桂林，這是東方最可愛和最被人詬罵的城市。和昆明一樣，該城也有一批中國自由主義者住在該省軍閥的庇護之下，刺戟蔣介石的中央政府。對有知識的美軍，該城總有高尙的談話；對於比較粗魯的美軍，則有女人。桂林擠塞着各種各樣的漂亮傢伙，胖的、瘦的、高大的、嬌小的、結實的、各式俱全。在日本進佔之後，香港的有名妓女，逃到了內地的本鄉，其中大部份人到了桂林，重操舊業；她們穿着綵緞衣服，有着象牙似的身體，對自己的藝術有着完全的熱誠。該城有兩個妓女，一個是在橋東，因性病率太高，美國人員不准去，另一個區域，就是大街本身，大街上每天夜裏擠滿着少女，直至深夜二三點鐘，都還有着尖聲呼喊，咕咕咕，大笑，和歡樂的交響樂。在這個荒誕不經的城市裡，甚麼地方都沒有廉恥之感。旅館充滿了等候美軍的女人；她們以誠實的熱情，來喜歡美國人；她們學會了美國土話，和美國解剖學上的名詞，而且以銀笛一樣的聲音，講着一切粗話，這使得粗話的骯髒之處大為減色。自然，日本間諜們越來越澈底地滲入了娼妓之中。而美國反間諜人員要在十四航空隊這個主要的戰鬥基地內，阻止情報的洩漏，感到暴躁而無力。

幾乎所有的美國兵和大部份的軍官，都有着一個固執的想法，那就是輕視和不喜歡中國。美軍多在空軍、軍

需處或訓練班內服務。他們極難得看到在前線的中國兵。曾經目睹過中國部隊毫無援助地開去對敵作戰、而且死在步行中的美國人，不超過幾百。他們之中，很少人知道和關心中國農民如何生活，他們只看到中國政府貪污的官吏，和黑市場的投機家。他們認為中國人全都是貪污、沒有效率和靠不住的。他們看到黑市場上堆滿着帶有美國陸軍標識的貨品，他們知道這些貨品可能是美國人冒生命的危險，飛越駝峯運進來，而被違法地放入商場的。他們完全缺乏辨別力，認為中國人民是和中國政府一樣的。他們看到了中國農民和農民兵士的污穢醜態和無知之處，這並沒有激起他們的同情和憐憫，却激起了憎厭之感。美軍住在寂寞和無知的荒原上，離家一萬五千哩；他們把所有的痛苦，都歸咎於四週的中國人。

烟霧騰騰的謠言之海淹沒着美軍官兵。他們把每一次轉告時誇大到十二分的故事，互相傳告。他們真的相信中國人把幾千架飛機藏在山裏頭，雖然中國空軍只有幾百架破舊和無用的飛機，由於缺乏零件而躺在地上。他們相信中國把幾百萬桶作戰的汽油，囤積在北方對付共產黨。他們認真相信給中國政府的一切東西，都給它賣給商業投機家了。每個美軍都認識幾個他所喜歡的中國人；美軍大部份人喜歡中國小孩子；他們喜歡和勤務兵開玩笑；軍官們享有着他們在文明的中國家庭中所找到的誠實的友誼。可是，每個人都把他所認識的幾個中國人作為例外，以不屈不撓的熱心和言辭咒罵着他所看輕的中國人。這種感情是深刻入骨的。在一九四四年大撤退，十四航空隊在葬中的所有基地在日軍的攻勢前紛紛失陷的時候，有一個軍官說，『上帝，在我走開之前，我真想殺掉個把「懶虫」』。

美國人的這種未受教育的態度，是這個具有許多悲劇的國家中最大的悲劇。沒有一個人曾經設法把戰爭解釋給美國兵聽，教訓他們中國人如何，和為什麼是和他們同樣的人。高級的外交使得人們無法給美國兵說，中國人民是比他們更其嫌惡貪污的，因為貪污對他們的影響比較深。最後，也沒有一個人曾經設法把很好的中國人民和

很壞的中國政府加以區別。在緬甸之戰結束時，有一晚有人請一些新聞記者向一羣美國傷病兵講話，那是在密支那的醫院裏。這一席話差不多談了兩個鐘頭。談完之後，有一個傷兵從廳背後走出來時說：『你知道，說中國人好的，這是我第一回聽到呢。』

H.K. \$2.90